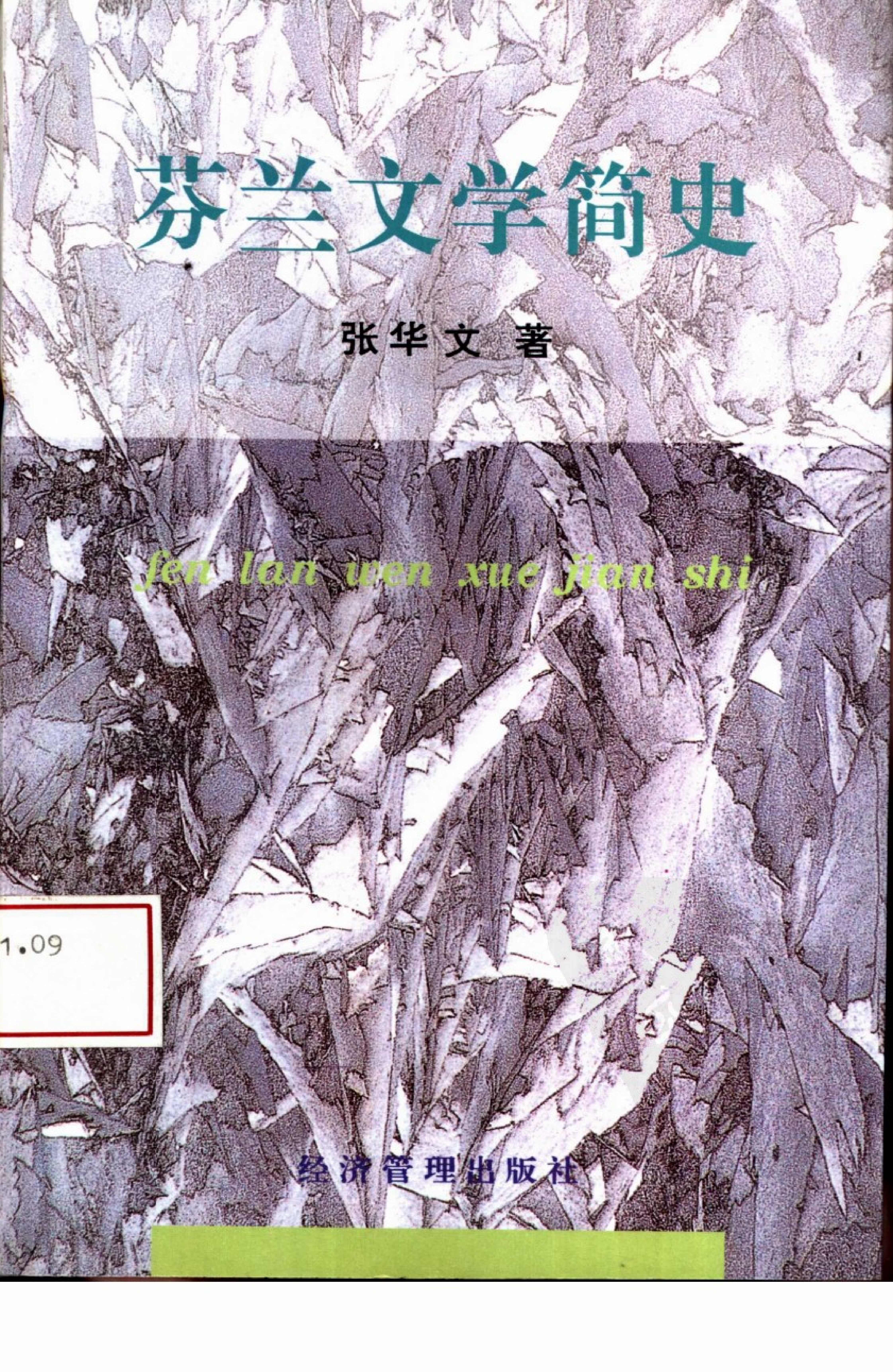

芬兰文学简史
张华文 著
fen lan wen xue jian shi
经济管理出版社

fen lan wen xue jian shi

封面设计：陆雅丽



ISBN7－80118－280－4/F·271

定价:12.00 元

芬兰文学简史

张华文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芬兰文学简史

张华文　著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国马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7 印张　174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80118-280-4/F・271
定价：12.00 元

前 言

几年前我在赫尔辛基参观芬兰国家博物馆时，曾看到陈列在馆内的一幅芬兰画家创作的大型油画。画面上展示一位银装素裹的美丽少女站在波涛汹涌的海岸边，与一只穷凶极恶的巨鹰争夺一部厚厚的宪法，巨鹰张牙舞爪企图从少女怀抱里夺走这部宪法，但勇敢的少女为保卫这部宪法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我想，画家的用意是借这幅油画象征性地反映芬兰独立前的历史。从 12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初，芬兰被瑞典王国吞并了长达 600 多年，而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芬兰宣告独立前，又被沙皇俄国统治了 100 多年。可以说芬兰独立前的历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历史。那时芬兰民族固然弱小，但却勇敢顽强，富有反抗精神，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他们与入侵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如 12 世纪一位叫拉里的芬兰人曾勒死了当时由瑞典国王派驻芬兰的代表亨利克大主教。20 世纪初一位芬兰议员的儿子枪杀了沙俄驻芬兰的总督鲍布里科夫。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

由于上述特殊的历史原因，与北欧及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芬兰的书面文字及世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芬兰的书面文字创始于 16 世纪中叶，当时一位名叫阿格里科拉的芬兰主教首次编写出芬兰文的识字课本，在课本中他首次创造了芬兰书面文字。到 19 世纪初，芬兰文学才摆脱了宗教文学内容的影响，表现出世俗的特点，芬兰民族文学正是从这时才开始产生的。至今在芬兰境内仍有 30 多万瑞典族人集居在西南部较繁华的沿海地区。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文化，结成了自己长年参政的政党

——瑞典人民党。因此,目前芬兰有芬兰语和瑞典语两种国语,芬兰文学也包括芬兰语文学和瑞典语文学。

文学是映照历史的一面镜子。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时间顺序来看，芬兰文学大体上经历了公元 1 世纪至 12 世纪、瑞典王国占领时期、沙皇俄国统治下的自治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及战后时期。公元 1 世纪至 12 世纪的芬兰文学主要为芬兰古代民间诗歌。诗歌当时是口头传诵的，后来由 19 世纪芬兰民俗学家伦洛特搜集整理成一部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它是芬兰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瑞典王国占领时期的芬兰文学基本上是用瑞典语创作的，而且多反映宗教生活的内容，属于宗教文学的范畴。沙皇俄国统治时期的芬兰文学脱离了宗教内容的束缚，具有民族文学的特点，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芬兰文学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子”，冲破了传统文化的桎梏，接受了异域文化的影响，思潮迭起，流派纷呈。战后芬兰文学受欧美一些国家当代文学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些芬兰作家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战时及战后的芬兰文学，由于芬兰资产阶级政府卷入了反苏战争，“反战文学”成为众多芬兰作家作品的基调。从美学角度来讲，芬兰文学又可划分为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浪漫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芬兰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 19 世纪初，分为土尔库和赫尔辛基浪漫主义两个阶段，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民族诗人鲁内贝格、哲学家斯奈尔曼和民俗学家伦洛特为该时期的杰出代表。浪漫主义思潮的出现，使当时仍处于依附地位的芬兰民族开始形成民族意识并产生对独立自由的渴望。芬兰新文学的奠基人基维是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七兄弟》至今仍是芬兰许多作家仿效的楷模。康特和阿霍是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们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

有的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中国新文学的先驱鲁迅和茅盾译介到国内，借以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新浪漫主义文学是欧洲象征主义在芬兰的变种，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开始关注隐喻、象征、语言的节奏、声响和色彩等因素。新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青年诗人，大诗人雷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诗歌创作中集诸多矛盾于一身，堪称芬兰诗坛上一位奇才。新现实主义文学则表现在小说创作方面，这个时期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小说家，其中西伦佩和瓦尔塔里后来引起世人注目。他们在小说创作中开始注重采用象征、意识流和心理现实主义等新的写作技巧。芬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是在二战后出现的。有一些作家受欧美文学中的存在主义、荒诞派小说和新小说的影响，在创作中注重追求形式和进行语言试验。

芬兰文学传播并影响到欧洲大陆始于浪漫主义时期。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种向外影响的程度，从欧洲波及到其他大陆。例如，前面提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诞生，不仅对芬兰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欧洲许多著名学者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德国著名神话学家格林都曾高度评价这部史诗的价值。美国诗人朗费罗在此史诗的影响下，创作出了《海华沙之歌》。世界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对这部史诗感兴趣，其女婿和学生、著名社会活动家拉法格称《卡勒瓦拉》是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是‘人类精神的骄傲和花朵’。目前这部史诗已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并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就在中国影响而言，早在 20 世纪初，茅盾和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就曾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部史诗，茅盾还把鲁内贝格、康特、阿霍和基维等芬兰著名作家和诗人介绍给中国读者。解放后，著名翻译家孙用通过其他文种把这部史诗译成了中文。史诗证明了芬兰人民的伟大

创造力量。

此外，芬兰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的现实主义传统在 20 世纪保持了不间断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这除了芬兰语言特殊（它属于古老的芬兰一乌戈尔语系，除同匈牙利语在语源上相通外，与欧洲国家任何语言毫无共同之处）和处于欧洲边缘地区因素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芬兰作家历经战争磨难，对人类社会存在着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芬兰自 1809 年以来一直受沙俄的统治，“俄国十月革命”后虽然宣告独立，成立了芬兰共和国，但很快陷入了白色近卫军与红色赤卫队之间的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政府又卷入了反苏战争。所有上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均在芬兰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和展现。战后芬兰著名作家林纳所著长篇反战小说《无名战士》，其影响之深远早已超越了国界。60 年代之后，面对超级大国的军事对峙和扩军备战，越南战争、全球环境污染及世界人口迅速膨胀等危及人类生存的关键时刻，芬兰作家更加关心人类命运，增强了与世界交往的全球意识和新型的人道主义观念。这种新的介入性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芬兰受到普遍的提倡和重视。芬兰作家大多数都精通几种语言文字，有的还能用几种不同的文字同时进行创作。他们放眼世界，信息灵通，接受外界事物敏捷，创作视野宽广。他们从不把文学事业推向某种极端或囿于某个狭小的范围。这或许是值得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同行们借鉴的。

作者

1996 年 2 月

目 录

第一章　芬兰古代民间诗歌

（公元 1 世纪至 12 世纪中期）

第一节　芬兰语的形成和发展

芬兰地处北欧，但芬兰语却是欧洲少数几种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之一。根据语言学上的分类，芬兰语与卡累利语、伊卓尔语、维普斯语、沃特语、爱沙尼亚语及立维语等语言同属芬兰一乌戈尔语种的一个小分支，称做波罗的芬兰语群，而匈牙利语言也属于同一语种，但划归乌戈尔语支。芬兰一乌戈尔语种和西伯利亚的萨莫耶德语种统称乌拉尔语系。波罗的芬兰语群诸语言嫡出于早在公元前数千年前就通行于芬兰湾南岸地区的原始芬族母语。在民族迁徙的漫长过程中，原始母语的若干方言分道扬镳，逐渐形成新的语种。

现代芬兰人的祖先在公元 1 世纪左右开始缓慢而持续不断地往芬兰湾北部迁徙，他们所操的各种方言以哈麦方言为主体，语言比较接近，特别是在芬兰沦为瑞典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芬兰人民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之后，语言渐趋统一，终于在 11 世纪至 12 世纪这段时期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语言—— 芬兰语。芬兰语的发展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古芬兰语时期、中古芬兰语时期、近代芬兰语时期和现代芬兰语时期。

公元 1 世纪至 16 世纪 40年代，称为古芬兰语时期。这一时

期，除了在瑞典语和拉丁语文献中引用的一些芬兰地名、姓氏和芬兰语的只言片语外，尚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可供鉴证。

1540 年至 1820 年为中古芬兰语时期。芬兰文学语言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芬兰文学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芬兰文学语言的奠基人是土尔库城的主教——米凯尔·阿格里科拉（1510—1557）。他于 1540 年至 1542 年之间出版的《识字课本》是有史以来用芬兰语写成的第一本读物。后来，他又相继出版了《圣经祈祷书》（1544）和《新约》（1548）的芬兰语译本等。他的全部著作约 2400 页之多。据专家统计，他在作品中共使用了 6000 个单词，其中有 70%的词汇，即 4450 个单词，仍然是现代芬兰语词汇的组成部分。他用芬兰西南部的方言写作，其中又揉合了哈麦方言和卡累利方言的某些成分。这为芬兰文学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后人称他为“芬兰文学之父”。

1820—1870 年为近代芬兰语时期。芬兰语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上规范化和纯洁化，词汇量大大增加，消除了瑞典语的某些影响，并逐渐取代瑞典语而为全国人民所接受，成为民族复兴的主要标志。芬兰语能得到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是颇不容易的，因为在瑞典王国长达 6 个世纪的统治下，芬兰知识分子阶层和官方起初使用拉丁语，后来只能使用瑞典语，只是居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民才操芬兰语。

1808 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瑞典王国发动了战争，瑞典王国以失败告终。从此芬兰归并俄国管辖，芬兰成为一个自治大公国，受到俄国沙皇的监督。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励下，芬兰的知识分子阶层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运动的主旨就在于提倡使用芬兰语，借以唤醒芬兰人民的民族觉醒，发扬光大民族文化传统。他们在摆脱了瑞典王国的长期统治以后，又与俄国日益加强的控制相抗衡。站在运动最前列的是芬兰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约翰·威廉·斯奈尔曼（1806—

1881）和民俗学家兼语言学家埃利亚斯·伦洛特（1802—1844）。斯奈尔曼倡议在各级学校里使用芬兰语，把芬兰语提高到与瑞典语并列的官方语言地位。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期间（1855—1881），斯奈尔曼当上了国会议员和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对芬兰语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伦洛特于1835年编纂出版了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这部史诗赋予人民以民族自豪感，也为世界文坛增添了异彩。伦洛特后来当过赫尔辛基大学芬兰语言文学教授。现代芬兰文学语言事实上是由他创造出来的。

从1870年至今，为现代芬兰语时期。自从1870年以来，芬兰书面语言已经具备了现代发达语言的一切特征和表达手段，足以用来在学术、新闻、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及日常生活等所有重要领域为社会服务。各级学校在19世纪末都用芬兰语进行教学，许多名门望族也操起芬兰语来。芬兰语报纸的水平不断提高，终于能与瑞典语报纸并驾齐驱了。阿列克西斯·基维（1834—1872）创作出不少优秀文学作品，芬兰的民族戏剧正在兴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产生了各种专业和行业的大量新词汇。此外，语言规范化扩大到正字法的范畴，外来语的拼写形式亦固定化。单词有简短化的趋势，用本民族词语及语法结构来取代外来语成分的纯洁化努力仍在进行之中。如同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一样，芬兰语还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节　芬兰古代民歌概述

早在两三千年之前，芬兰的古代民间诗歌就已经产生了。无名诗人在各个时代创作的诗歌沿袭口授，世代相传，有不少民歌流传至今。它像一座沟通古今的大桥，贯穿了芬兰民族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它或反映初民的原始观念，或体现农业文化之前的

渔猎文化，或描绘中世纪的社会风貌，包罗万象，丰富多彩，芬兰古代民歌不仅记叙了古代人民的生活斗争，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寄托了他们的永恒希望和理想，还包含着他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千百年来，民歌起到给人民以教益、娱乐、慰藉和鼓舞的重要作用，对芬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芬兰异教时代的民间诗歌，最早的文字记载见诸于阿格里科拉的著作。由于欧洲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都依傍路德，把民间诗歌视为异端邪说，竭力禁绝，所以人们对民间文学的兴趣直到 17 世纪才以采集民谚的形式重新萌发。18 世纪中叶出现了采风热，芬兰的丹尼尔·尤斯勒尼乌斯（1676—1752）和亨利克·加布里埃尔·波尔坦（1739—1804）均先后采集到一些民歌。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1736—1796）于 1762 年委托传说中的公元 3 世纪爱尔兰吟游诗人峨相之名发表的“古诗”，和德国作家约翰·赫尔德（1744—1803）于 1778—1779 年之间出版的民歌集《各族人民的歌声》把欧洲 19 世纪的采风热推向高潮。以欧洲采风热和本国民族主义运动为背景，当时身为芬兰医生的伦洛特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出版了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又于 1840 年出版了芬兰古代抒情诗集《女五弦琴演奏者》。采风活动常常扩大为全民性的运动，经久不衰，在整个 19 世纪及至当今都从未间断过。采集到的诗歌、故事、轶事、谜语和谚语都保存在 1831 年成立的芬兰文学协会档案馆内。该馆现藏有 250 万份记录手稿。这里珍藏的芬兰古代民歌有 85000 首（约 127 万诗行),已收在 33 卷本《芬兰古代民歌集》（1908—1948)里并刊行于世。

19 世纪采集的民歌实际上指的是卡累利亚地区芬兰民歌。采集区域北起俄罗斯卡累利亚，南至奥努斯、拉多加卡累利亚和芬兰湾东南端的因克里。当时俄罗斯卡累利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渔猎阶段。村民多以捕鱼为生，农业生产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畜牧业也只刚刚进入萌芽状态。而因克里地区已达到

农业文化阶段，村落很大，鳞次栉比，畜牧业也较发达。

芬兰古代民歌形式习惯上称为卡勒瓦拉体。这种叫法与时代顺序不符，因为芬兰古诗形式很可能早在芬兰的上古时代（公元前 2000—500） 末期业已产生；而《卡勒瓦拉》一书迟至 1835 年才问世，此时人们始知有“卡勒瓦拉”一词。卡勒瓦拉体古诗是西波罗的海芬兰各族人民（包括爱沙尼亚人、立维人、沃特人、芬兰人及西卡累利亚人）的口头创作，在东卡累利亚和拉普人中间却未曾流行过。

卡勒瓦拉体古诗形式采用八音节扬抑格，四音步诗行，诗节长短不论。诗节之间没有间隔，不讲究脚韵而注重头韵。文体上尤以对应法为一大特色，即用平行的两行诗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后一行诗中的用词与前一行诗中的用词同义或接近，从而使民歌便于记忆传诵及当众即席演唱。

芬兰古代民歌吟唱起来曲调极为简单，正式的演唱方式却比较独特。据 18 世纪有关记载，男歌手在演唱民歌时是由领唱者和伴唱者两人配合，相对坐在一条板凳上，手拉着手，膝挨着膝，在五弦琴的伴奏下进行，边唱边合着曲调的节拍像拉锯似的前俯后仰。每行诗唱两遍，领唱者先唱第一遍，唱至诗行末尾时，伴唱者即加入演唱并单独重唱一遍，这时领唱者已想好下一诗行，于是又先唱第一遍，依此类推。女歌手的演唱则由合唱队来伴唱；一组女歌手先领唱一行诗，然后合唱队再重唱一遍。

在卡累利亚农村，唱民歌并非职业性活动，因为村中人人都会吟唱，不过每逢盛大的演唱场合，当然还是由村中那些公认的出色歌手来大显身手。许多著名歌手都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如卡累利亚地区杰出的歌手阿尔西帕·佩尔图宁（1769—1841）。伦洛特于 1834 年记录下他吟唱的近 60 首民歌，达 4000 余行诗。又如因克里地区出类拔萃的女歌手拉琳·帕腊斯克（1833—1904），从她口里采集到的民歌不下 32000 诗行。

人们在民歌中歌颂劳动，又在劳动中哼唱民歌。他们一边用小石板研磨谷物，一边吟唱，放牛、挤奶、捕鱼或出门旅行的时候也有唱民歌的习惯。在举行庆典、婚礼或熊肉宴的场合，更要请超群出众的歌手来唱歌助兴。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因克里地区，年轻姑娘经常聚集在村中的秋千场上唱歌，到了星期天晚上则成群结队哼着民歌在村中的大街上悠然漫步。

对于芬兰人民的文化生活，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领域。卡勒瓦拉体民歌曾经发挥过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除了以《卡勒瓦拉》为代表的叙事诗和以《女五弦琴演奏者》为代表的抒情诗之外，适合在婚礼、宴会、喜庆祝典和禳解等场合演唱的仪式诗以及古代的民谚和谜语也都采用了卡勒瓦拉体的古诗形式。

仪式诗中的挽诗别具一格，不采用卡勒瓦拉体。这种诗歌带有“别离诗”的特点，既可用于殡葬，也可用于婚礼，因为新娘离别娘家总不免要伤心落泪，用挽歌来送新娘过门是情有可原的。此外，壮丁到沙俄军队中服役，一去二十载，甚至永无复返之日，用一种叫做出征歌的挽歌来送行也合乎情理。

不采用卡勒瓦拉体的还有押韵民歌（又称雪橇诗），每首歌由若干诗节组成，每节四行，押脚韵。例如：

“每次把白兔捉来玩，
我总要抚摸它的毛。
瞧那 30 岁的大汉，
一见到姑娘还害臊。”

押韵民歌在芬兰民歌传统中尚属后起之秀，是 19 世纪农村青年的口头创作，在跳舞、荡秋千或集体劳动的场合演唱。

芬兰古诗形式直到 17—18 世纪才开始逐渐让位于欧洲传统的分节押韵诗歌形式。但在整个 19 世纪，甚至直到 20 世纪初还

有一些著名诗人乐此不疲。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比，芬兰文学受民间诗歌的影响远为深刻持久，这主要是直到19世纪还有不少充满智慧、想象力和幽默感的民歌完好地在民间口头流传。此外，芬兰人民在历史上虽然是个弱小民族，却不乏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他们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不屈不挠地作过艰苦的斗争，而发扬光大古代民歌传统正是他们的主要斗争手段之一。正因如此，芬兰古代民歌才成为芬兰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为根深叶茂的芬兰文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三节　叙事民歌

芬兰古代民间叙事诗歌按其题材可分为以下几类：(1)神话诗。其内容涉及古代的创世理论、世界的起源及产生经过。(2)海盗诗。其内容多为追求美女或出海劫掠，间或亦有逃往海外的情节。(3)萨满诗。内容多叙述巫师的故事，民间迷信色彩较浓厚，如巫师渡过冥河，下到冥府等。(4)传奇诗。讲述怪兽、妖魔或小孩被杀的故事。(5)基督教圣徒传。(6)歌谣。

专家们认为，像世界的起源、熊的诞生和大橡树的生长等神话诗歌最为芬兰人民所熟悉的题材，应当属于纪元前芬兰人的祖先与爱沙尼亚人及沃特人的祖先分手后的某个时代。海盗诗和萨满诗在爱沙尼亚人及其东邻沃特人的文化中也全然不见踪影，因而有的学者推测，这两类古诗很可能产生于芬兰卡累利亚地区，时间多半是在铁器时代中期（公元400—800）或北欧海盗时期（公元800—1200）。萨满诗中的佼佼者为《勒明盖宁之歌》。海盗诗则以《盗宝磨》最为著名。传奇诗产生于基督教传入芬兰之前后不久时代(1000—1100)，其中最为有名的两篇诗为《勾引维拉莫之女未遂记》和《卡勒瓦之子》。圣徒传及歌谣显然产生于基督教传

入芬兰之后的时代，按其内容、文体及叙述方式可分别纳入芬兰中世纪的各个不同时期。

神　话　诗

神话诗是在部落的庆典、祭祀和传统仪式剧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然而古老的神话题材在芬兰民间诗歌中屡见不鲜。在这类诗歌中，创世奇迹与诗中的主人公万奈摩宁和伊尔玛利宁的奇遇往往联在一起。根据芬兰古代民歌的叙述，世界是这样诞生的：巨鹰在海洋上空翱翔，寻找筑巢的地方，找了许久才看见一座绿草如茵的小岛，便飞下来在海岛的山上产蛋，不料起了一阵大风，鹰蛋滚入海中撞坏了，从里面生出天地、日月和星辰。

“鹰蛋最底下的部分，
变成了低处的地面；
鹰蛋最上面的部分，
化为了高处的蓝天；
鹰蛋蛋黄的上半部，
变成太阳光芒万丈；
鹰蛋蛋白的下半部，
化为太阴月色昏黄；
剩下部分色彩斑驳，
万千星辰点缀天上。”

类似的神话传说在地中海南岸各国以及印度和日本直至整个大洋洲也均有发现。在上述地区以北的东欧、北亚及中亚等地带，甚至在印第安人中间，都流传过关于?鹏的神话传说：洪荒时代的造物英雄在海洋上漂泊的时候用泥土创作了大地，而泥土是由一只水鸟衔出水面的。这两类传说显然是同属一个欧亚神话的两

大分支。

民歌《海底的起源》叙述了万奈摩宁的一次奇遇。敌人一箭把万奈摩尔从鹿背上射下来，他便跳入海中，在海上漂泊了六载，他在海底挖鱼洞，把浅滩和暗礁推出水面。关于这个故事，早有学者将此与印度有关大野猪的神话相提并论。印度神话中的大野猪把海底刨开，把地从深处托到洋面，任其在水上漂浮。

民歌《火的诞生》与咒语有关。巫师们在医治烧伤时要念这种咒语，有时森林失火或发生别的火灾时，他们也边绕圈子边念咒语，施展魔法。这种诗几乎与其他咒语一样，也包含了很多基督教因素，与“极地火种”神话也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伊尔玛利宁以“三根火刑柱的热量”在天上打出火后，火星溅落到海里，被一条鱼吞下。伊尔玛利宁捉了好几次终于将鱼捕获，从鱼肚里救出火种。

民歌《熊的诞生》是在开熊肉宴、猎熊及春天把牛群赶到牧场上这三种场合吟唱的。熊肉宴从异教时代流传下来，是将芬兰语神话诗和宗教仪式合二为一的唯一庆典。这个神话传说有三种说法：其一熊生于丢在水中的羊毛里；其二生于黑暗北方一棵松树的根里；其三生于天上。

“林中老熊何处诞生？
珍贵毛皮哪里成长？
林中老熊蜂蜜满掌，
它在那里出生成长；
月亮背后，太阳身旁，
北斗七星的正中央；
在那光亮星座旁边，
天上众多仙女中间。”

民歌《大橡树》无疑属于爱沙尼亚及芬兰神话题材中最为古老的一类。与古代东方及远古极地的世界树概念如出一辙。该诗的末尾对大橡树的各个组成部分变为何物均作了解释。这首诗在中间部分讲的是橡树长大后被弄倒的故事。橡树长成参天大树后，树叶遮蔽了太阳和月亮，树枝间云雾缭绕。英雄一出现，神话中的危机便迎刃而解，一个小人儿从海浪中飞将出来，砍倒了大橡树。如同有关卵生世界的神话一样，关于参天大树遮天蔽日，树上长满葛藤及大树被砍倒的神话，也有各式各样的变种散见于地中海及太平洋的各个地区。

芬兰古代民间叙事诗中的两大主角万奈摩宁和伊尔玛利宁在每篇诗歌中均被赋予迥然不同的特征，他们的英雄业绩在卡累利亚和芬兰西部的古诗中往往被张冠李戴，相互混淆。万奈摩宁时而以天上造物主的面目出现，时而以巫师的姿态表演。他既可能是功绩卓著的文化英雄，也可能是战无不胜的海上豪杰。他不是情场失意，垂头丧气，就是老态龙钟，成为某个水精或少女揶揄的对象。然而有趣的是，无论各个时期的歌手如何任意塑造万奈摩宁这个形象，他们在描绘万奈摩宁的特征时都强调了一个“老”字，而且多半都提到他是巫师，“无所不知，长生不死”。芬兰著名民族学家马尔蒂·哈维奥（1899—1973）总结了万奈摩宁的主要特征之后，称之为萨满。他认为，流传至今的万奈摩宁传说是处于极地萨满教影响下的渔猎环境下的产物。铁匠伊尔玛利宁与沃特人的天神因玛利相当。民间叙事诗中的伊尔玛利宁是天国的木匠，是宝磨和五弦琴的制造者。首先取火的是他，第一个盖起打铁作坊的也是他。伊尔玛利宁俨然成了文化英雄和锻冶之神，与希腊神话中的火与锻冶之神赫菲斯托斯无异。古诗中描述万奈摩宁漂洋过海，险象丛生；演奏五弦琴、感动鸟兽；盗取宝磨，惊心动魄。这类奇遇显然都与瑞典的古诗传说密切相关。在这些以勇士奇遇为题材的诗歌中，整个世界成了竞技场。英雄必

逢对手，相争互斗，彼此为敌。卡累利亚歌手佩尔图宁吟唱的《三宝磨房》一诗中叙述拉帕莱宁是万奈摩宁的冤家对头，他用弓箭把万奈摩宁射下马、使之坠入海中。万奈摩宁在海上漂泊了6年，终于登上北国波赫尤拉的海岸。波赫尤拉的女领主听见万奈摩宁的哭声跑到岸边，许诺一俟他制成宝磨就帮助他重返家园。万奈摩宁漏风说只有铁匠伊尔玛利宁会做宝磨。伊尔玛利宁来到波赫尤拉，用天鹅羽毛、大麦粒、细羊毛、不孕母牛的奶和纺锤残片造成宝磨，为此得以娶北国女领主之女为妻。宝磨为波赫尤拉磨出大宗财宝。万奈摩宁眼红起来，立意夺取宝磨，便与同伙乘船抵达波赫尤拉，用歌声把北国人送入梦乡，趁机盗走宝磨。北国女巫醒来后发现失去宝磨，便穷追不舍。万奈摩宁将一块石头投进海里，石头化为悬崖峭壁，敌船撞上去，顿成碎片。北国女巫变作巨鹰扑向万奈摩宁，一场恶斗开始了，宝磨破碎，沉入海底。像《三宝磨房》之类的民歌取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萨加（传说）。海洋彼岸的神话国波赫尤拉相当于萨加中提到的波特纳、诺波腾、哈弗斯波腾或特罗勒波腾等地，那里盘踞着一位名叫居格尔的由鸟侍卫的巫师，他拥有某些法宝并且占有一名妙龄婢女。在冰岛的萨加和卡累利亚的“宝磨”诗中，民间传说的特点与现实主义的细节描述揉合在一起，这些诗歌提供了了解北欧早期航海技术、武器制造及使用方面的精确资料。至于神磨的象征意义，众说纷纭。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宝磨可能是祭祀用的崇拜物。这种神物据说可以保证丰收，还可以保佑猎人和渔夫。在古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拉普人的传说中都有过类似的东西。

在涉及神话题材的诗歌中，主人公并不总是庄重而刻板的文化英雄。有一首关于万奈摩宁航海弹琴的诗不仅记述了他的丰功伟绩，还表现了他的七情六欲。此诗以小舟和五弦琴的起源传说为素材，把情节描绘得既细致，又富于戏剧性，代表了卡勒瓦拉体叙事诗的最高成就。民歌《万奈摩宁泛舟抚琴记》绘声绘色地

叙述了主人公的经历。万奈摩宁看见别的船在打完了仗之后都满载金钱返航，自己的小船却搁在岸边开始腐朽，蚯蚓在船底做了窝，鸟雀在船间筑了巢，便愤愤不平地把小船推下水，跟同伴们一起上船划桨。小船后来触到一条大狗鱼的脊背。万奈摩宁捕获了狗鱼，用其颚骨制成五弦琴。琴上的钉子是用鱼牙做的，琴弦是用凶神希息女儿的几根头发做的。当“手短指细”的万奈摩宁试着弹这把琴时，一试，就弹出美妙动听的音乐，招来了鸟兽鱼虫和水妖林精，他自己也感动得潸然泪下。无疑，这首民歌是希腊神话中俄耳浦斯传说的翻版，其特点是描述细腻、生动，充满活力，并富有清新感和生活情趣。诗中的人物、鸟兽和精灵和睦相处。有关弹琴的情节是全诗的高潮，暗喻人类初次为自己的创造能力感到惊喜，初次获得美的享受，初次体验到灵感的冲动。

海　盗　诗

海盗诗。产生于12、13世纪，北欧海盗越过芬兰湾对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各公国领土发动袭击。芬兰人也步其后尘，从事海上冒险事业。他们的冒险活动在叙事诗歌中也得到反映。民诗《阿赫底与居里琦之歌》只有残篇传世，但从中仍可窥见其主题：男人对冒险、战争和海洋的向往，家室之累不足以阻拦他们，他们的口号是“宁喝海水，不饮家酿”。从此诗的一个片断得知，阿赫底的朋友杜里年纪轻轻就已结婚，小两口日子过得挺和美，但他一听说阿赫底要去打仗，甚至连衣服也来不及穿整齐，便匆忙一起出征了。《高戈蔑宁之歌》也与海洋有关。诗中展示了海盗们举行冒险、酒宴和决斗的场面。

最后一个插曲及描述高戈蔑宁在一个夏夜里霸占了全岛的女子，因而使岛上的男人起了报复之心。上述反映海盗生活的诗篇所关切的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对早期的诗歌传统乃是一大革新。创世古诗中的远古神话时代和“宝磨”诗中童话般的

幻想世界在这些诗歌中都不复存在了。在早期的诗歌中，主人公大都是鲁莽而冷漠的盖世英雄，妇女只扮演着牛马工具般的角色。然而在海盗诗中，人物描写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言语、有情感、有行动的妇女形象也出现了。性爱问题也闯入了海盗诗，阿赫底和居里琦的婚姻纠葛就是一个具体说明。从残篇中得知，阿赫底历尽艰辛终于获得美丽的海岛姑娘居里琦。新娘在花烛之夜挨了阿赫底的打，因而伺机报复，欺骗了丈夫。不过，居里琦又竭力拉拢住阿赫底，不让他属于别的女人。这些诗歌作者往往从男性立场出发，轻浮而庸俗地处理爱情题材。例如，在《求婚》一诗中，夙愿得偿的男主人公是这样凯旋而归的：

“一手牵着马的缰绳，
一手揪住少女胸襟，
一脚踩着少女大腿，
一脚踏着雪橇滑板。”

与否定情欲的歌谣和传奇诗不同，海盗诗把爱情当作感官的享乐来描写的，因而没有丝毫伤感情调。在这些诗歌中，真实人物的心理刻画与实际的种族环境描写互为补充，诗人们仿佛很体谅后世的人种学家，在诗歌中准确如实地描绘了古代芬兰人的衣着、家畜、代步工具、渔猎器具、金银首饰、桑拿浴习俗、仆役的劳碌等。诗中采用大量对话形式，这也许是与早期诗歌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对话的内容五花八门，男女主人公有撒谎的， 有吵架的，有策划阴谋的，有相互指使的，也有顶撞争辩的。一问一答的对话常常有三次反复，答话者头两遍均拒绝请求或托词搪塞，第三遍才作出对方期待的答复。例如，在《赛歌》 一诗中，拉普青年尤卡海宁为了赎身，先是许诺给黄金，继而答应送一匹骏马，最后才答应将自己的妹妹献给万奈摩宁。

萨　满　诗

萨满诗歌中的主人公虽然不像创世史诗中的文化英雄那样有创新之举，也不像海盗诗的主人公那样从海外掠回财宝和女人，但却能从冥府带回古老的咒语。他们的对手都是一些死人或其他部落的萨满。民诗《万奈摩宁下冥府》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这位巫师过冥河，下到冥府，又化为蛇身钻过网眼，回到人间的故事。这些事情对于处在鬼魂附身状态的萨满们来说是可以在想象之中做到的。萨满教最重要的仪式即为跳神，萨满跳神时灵魂变成动物到处漫游，甚至下到阴间，带回要打听的消息。

民诗《勒明盖宁之歌》的主人公也是一位萨满英雄。他法力无边，所向披靡。他一念咒语，羔羊和松鸡就会乖乖钻进被链套拴住的野兽嘴里。他到火热的瀑布旁一念咒，水上就会出现一艘桤木舟，上面还载着一个桤木精，如有必要，他可以念咒把冰湖移到陆地上来，自己则变成野鸭钻到冰层底下去。总之，萨满诗虽然提供了民间迷信传说的有力证据，但作为文学作品却难以与海盗诗相媲美。

传　奇　诗

基督教在芬兰、卡累利亚和因克里的传播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从 12 世纪开始，直到 14 世纪初才大体完成，但迟至 16 世纪异教仍没有完全绝迹。传教士们在昔日异教徒崇拜偶像的地点修建教堂，主持原有的仪式，但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逐渐搀入新的内容。新旧信仰之间的冲突对原有传统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由于婚礼、葬礼和熊肉宴是由家族成员自行举办的，而且“偶像崇拜”的成分在这类场合也并不十分显眼，所以婚礼教、挽歌和熊肉宴祭文得以幸免于基督教的影响。此外，农妇看守麦田时哼的民谣，行旅休息时吟的小曲，孩童玩耍时唱的

儿歌，主教和教士对这些也都不屑一顾。例如民诗《勒明盖宁之死》一诗就体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首诗脱胎于上文提到的《勒明盖宁之歌》。勒明盖宁在赴宴途中遇到鬼怪，后来便在宴会上被杀害。当然，他所遇到的都是在萨满的幻觉诗中或中世纪魔幻文学里常见的鬼怪。勒明盖宁的母亲闻讯后匆忙而至，用耙子在冥河里打捞尸首，虽然捞起，但因泡得太久，无法让其起死回生。此诗的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告诫后代：为人应清白无辜，切勿犯罪。后来经常有人将此诗与基督和古埃及主神之一的奥西利斯死而复活的神话相比。显而易见，勒明盖宁的劝善规过已经反映出基督教的伦理观。像民诗《勒明盖宁之死》一样，《造物主航海记》一诗所依据的也是古代传说。此诗系诗人根据《万奈摩宁泛舟抚琴记》着意加工而成，具有明显的基督教特点及倾向。诗中的高潮部分叙述小舟在“波平如镜的海洋”上触了礁，原来是碰到了海怪图尔索。造物主揪住海怪的耳朵，厉声责问它是否有倾覆小舟的企图，它供认不讳。造物主将其抛回海中，令其永远不能冒出海面。海怪不敢违抗，从此再也未从水中浮起。诗人的目的在于颂扬基督教上帝的伟业，并把海怪这一异教迷信的产物贬低到无能以至可笑的地步。民诗《万奈摩宁的判决》则直接攻击了异教信仰和异教英雄。玛利亚塔（印圣母玛利亚）两周岁大的儿子对万奈摩宁的判决嗤之以鼻，反而劝他趁早扬帆启程，到无边无垠的大海上去航行，与高深莫测的旋风去搏斗。《勾引维拉莫之女未遂记》一诗中的万奈摩宁也遭到了同样的侮慢。年迈的主人公妄图勾引维拉莫之女，结果枉费心机，反被这个水精嘲弄了一番。万奈摩宁在上述最后两首诗中已经不是开天辟地的神人，不是芬兰的俄耳浦斯，也不是法力无边的萨满，而是忍气吞声的老头子，成为妇孺揶揄的对象。

民诗《卡勒瓦之子》叙述的是一个血腥的仇杀故事。卡勒瓦在温达摩家的屋边种了燕麦，温达摩的绵羊把燕麦苗吃掉了，卡

勒瓦家的狗把绵羊咬死，于是温达摩一气之下带领家人把卡勒瓦家的人统统杀光，只有一个小孩幸免于死。这个小孩被卖给一个铁匠当奴仆，替他牧羊。一天，铁匠的女主人在面包中放了一颗石头，致使卡勒瓦之子切面包时把父亲传下的刀子弄断了，盛怒之下，他决定对东家进行狠狠的报复。他把东家的羊群喂了狼和熊；又把野兽赶到主人家，结果一只熊在庭院里把女主人撕成碎片。卡勒瓦之子后来终于把温达摩一家斩尽杀绝，报了血海深仇。

在芬兰文学史上，《卡勒瓦之子》一诗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芬兰古代民诗中只有这一首在题材方面与12—13世纪的冰岛萨加和西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史诗最为接近。伦洛特的组诗《古勒沃》亦取材于此诗。

基督教圣徒传

像欧洲各国的圣徒传诗歌一样，芬兰的圣徒传也可以按题材来分类。描述圣人事迹的属于第一类；传播基督教伦理观念的教诲性故事属于第二类；它通过浅显的例证来说明什么是立身处世的正道，什么是罪恶不义的邪路。除了这两类之外，芬兰的圣徒传大都属于逢年过节应景用的第三类。在第一类圣徒传中穿插了过多的奇迹，像童话般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极尽雕琢矫饰之能事，使人想起中世纪庙宇中五色斑斓的偶像和绚烂多彩的绘画。相形之下，第二类圣徒传就显得更为接近现实生活。

从芬兰天主教时代的圣徒传里可以看出来自瑞典、俄国和西欧国家的影响。当时天主教的势力遍及整个欧洲，各国圣徒传的形式和内容大同小异。在芬兰，由于同时受到卡勒瓦拉体诗歌传统的强大影响，各种圣徒传均带有某些民族特色，例如芬兰的圣母玛利亚要找桑拿浴室生孩子。

《主之歌》是芬兰圣徒传中篇幅最长的一部。这首叙事诗把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来历通俗化了：玛利亚在小山坡上采摘越橘，食

后怀孕，但因林子里的人们不让她进桑拿浴室，所以她只好把婴儿生在马厩里。太阳晒昏了守墓人，把主耶稣从死神手中唤醒；主施计用铁链把恶魔永远缚在岩石上。这首诗几乎完全取材于《新约》、伪经、外国的圣徒传及教会的绘画，尤其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各种圣徒传，其原作者当系拜占庭教会的一名传教士。直到 12 世纪末叶，芬兰西部还有拜占庭教会的许多布道团。无怪乎芬兰语中的教会基本用语，如“十字架”、“牧师”、“异教徒”均为斯拉夫语借词。

《亨利克主教之死》被认为是最具芬兰民族特色的一部圣徒传。主人公亨利克主教是英国人，可能是于 1155 年由瑞典国王派人护送来到芬兰西部地区的。诗中叙述主教在途中来到一个叫拉里的芬兰农民家投宿，因为主人不在家，不便留宿，用罢晚餐就走了，告辞前按规矩付了饭钱。当拉里返家后，他老婆凯尔杜却谎称主教没有付钱就离去。拉里闻之勃然大怒，马上穿上滑雪板就去追赶，终于在结了冰的圭略湖上追上了主教，当场把他勒死。亨利克主教一死，芬兰就出了一连串奇闻怪事。这首诗的作者既熟悉天主教圣徒传的一般格局和与亨利克主教有关的教会及民间口头传说，也娴于卡勒瓦拉体古诗形式及斯堪的纳维亚骑士诗的程式。诗中人名地名特别多，这说明作者不愿编造故事，而甘当纪实的史家。

芬兰中世纪天主教圣徒传洋溢着对穷人的深切同情，这与格调一致的欧洲圣徒传大相径庭。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在芬兰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倒是有关贫而清高、为富不仁的说教更为深人人心。可以设想，中世纪宗教性民歌中所表现的基督教精神从多明我会修士等托钵僧的思想意识中吸取养分。这种无产者基督教信仰在《爱沙尼亚仆人与东家》一诗中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来叙述一主一仆的遭遇。衣衫褴褛的仆人冻死街头，众天使把他带回天国，让他坐银椅，还用银杯斟满蜂蜜和烈酒献上。

仆人蒙此厚遇不解其故，询问是承何人恩典。天使答道，做仆人辛苦够了，生前只能以火解渴，所以现在才有痛饮玉液琼浆的福气。天使还说那阔气东家将要死在家里，在锦缎被褥中断气，他死后也会来到天国，不过要坐火椅，他的杯中则将盛满火焰和焦油，怪只怪他生前喝够了佳酿美酒。全诗的社会涵义在诗的末尾昭然若揭：

“刁钻东家跌跌撞撞，
身影投在碎石路上，
腋下夹着上好布匹，
手上拿着漂亮细呢，
褡裢塞满花花白银，
钱袋装足灿灿黄金。”
“穷伙计，快来我跟前，
我要给你大把工钱，
快来拿，拿去，穷伙计！”
“不要你的,混帐东西！”
“拿去,快来拿，穷伙计，
不是粗呢，这是细呢，
外加十码鲜艳布料！”
“混帐东家，我都不要，
谁叫你生前不给我。
我在世间为你干活，
工钱本应那时给我……”

东家妄想用布料权充欠付的工钱，借以讨好仆人，结果未能得逞。这首诗在实行过农奴制的芬兰湾南岸地区曾经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马德琳之歌》一诗堪称芬兰中世纪创造性翻译文学的杰作。诗中除女主人公玛利亚·马德琳的姓名和身世尚与《圣经》中的记载相符之外，其余部分均系文学创作的产物。这首诗对马德琳的淫乱没有作过多的渲染，这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圣徒传是迥然有异的（基督教徒历史认为马德琳曾沦为娼妇，后来才悔过自新）。诗中通过马德琳与耶稣的对话间接地反映出芬兰贫农与瑞典贵族之间的矛盾。这种艺术手法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圣徒传中是未曾采用过的。前面提及的这两首诗可以称为无产者基督教诗歌，在这一类诗歌中无钱无势的贫民胜过了有钱有势的贵族。

歌　谣

继圣徒传之后，歌谣或称伴舞歌这种世俗文艺形式也于13世纪传至北欧。在丹属法罗群岛，歌谣至今还被用来为排舞和圈舞伴唱。两行或四行一组的叙事诗由一两名独唱者演唱，抒情性迭句由舞蹈者合唱。芬兰的歌谣多半是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歌谣演变而来，但摈弃了原有的曲调、格律、迭句以至分节，而遵循着卡勒瓦拉体古诗的格式。歌谣以其戏剧性及性爱主题而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叙事诗。妇女成为歌谣里的中心人物，这一点尤为突出。逼真的妇女形象和性爱题材在海盗诗中虽已出现，反映的却是男性的观点、感受和生活情趣，而歌谣中描写的是艳遇及情杀，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摧毁一切、不可抗拒的命运。歌谣里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公式化的人物，无非名门骑士和钟情闺秀之类。这类故事多以诗中人物的暴死收场：或者是贞洁的少女杀死企图玷污她的陌生人；或者是哥哥诱奸胞妹，乱伦行径暴露后后者以自杀了其一生；或者是素抱独身主义的牧师妄想把年轻的处女搞到手，结果姑娘悬梁自尽，牧师自己也中剑身亡；或者是姑娘念咒，风暴骤起，卷走了负心郎；或者是年纪很轻的王孙公子获悉爱妻亡故而自寻短见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芬兰歌谣中所包含的往往

是性爱方面的戏剧冲突，神话传说的成分极其有限。

芬兰歌谣中的人物固然动辄诉诸暴力，仇杀不休，但叙述方式却较为含蓄，较少血腥味，这很可能是由于歌唱者多系少女组成，而在演唱前此歌谣又均经过受教会势力影响很深的知识界名流检查所致。事实上，对杀人细节描写的反感也明显表现在芬兰其他叙事诗中，这一点与东西欧的传统大不相同。例如，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对凶杀具体过程特有的那种浓厚兴趣在芬兰的叙事诗中是不存在的。在芬兰歌谣宝库中没有御用歌谣，这是芬兰歌谣的又一大特点。贵族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富丽堂皇的场面在芬兰歌谣中很少出现，因此专家们干脆称之为平民歌谣或农民歌谣。

在艺术上最有特色和最有价值的一首芬兰歌谣叫《安尼凯宁之歌》。歌谣中的女主人公安尼凯宁是中世纪芬兰首都土尔库城的一位姑娘，他受到一名年轻的德国商人的勾引。但是按着当时德国人的法律，是严格禁止与异国女子通婚的，于是这个德国年轻小伙子在起航返国时抛下了这个姑娘。姑娘恼羞成怒，祈求上帝令狂风暴雨自天而降，结果姑娘如愿以偿，年轻商人遭到灭顶之灾。安尼凯宁得知情人淹死，顿感幸灾乐祸。这首歌谣的作者把人物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还流露出一种幽默感，令人读后在喟叹世风日下之余又发出开心的笑声。很可能正是这位替上当女子鸣不平的歌谣作者创作另一首《龙与女郎》的民谣体讽刺诗。在这首诗里一切都颠倒过来，龙成了主人公，成了女郎的庇护者，两个强盗的角色则是由女郎的未婚夫和国王扮演的。诗中叙述一群姑娘正准备把负心的未婚夫吊起来时，国王来了，他见此状怒不可遏，遂下令把其中的女主犯扔进龙口，多亏这条龙有一副菩萨心肠，不愿吞下姑娘，倒要吃掉未婚夫和国王。以上两首歌谣的作者堪称语言艺术大师和卡勒瓦拉诗体的大胆革新者， 这两首诗中的对偶句和复杂句型比比皆是，这在其他叙事诗中是颇为罕见的。与此同时，诗中亦不乏与卡勒瓦拉诗体对偶句型大相径庭

的句型结构。这两首民谣在造词押韵方面刻意求之，与某种抒情诗相似。在《龙与女郎》中幽默和讽刺首次进入芬兰文学。可想而知，在土尔库城这个羊圈中，这位中世纪的诗人是怎样的一只黑绵羊，他又是在何等热烈的赞叹与何等露骨的蔑视中高举叛逆大旗，向势力强大的传统诗歌形式和道德规范挑战的。

芬兰的民歌在中世纪末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以《埃琳娜之死》最为突出，堪称芬兰歌谣中的瑰宝。全诗三百行，分为五个部分，各个部分的大意如下：(1)贵族克劳斯·库尔基向年轻的埃琳娜小姐求婚。埃琳娜的母亲和她本人疑虑重重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因为她们知道，克劳斯拥有一个名叫基尔斯蒂的女管家。(2)女管家基尔斯蒂与埃琳娜在水边洗衣时吵过架，当埃琳娜怀孕后，基尔斯蒂图报复，诬告埃琳娜对丈夫不忠，与长工乌奥列夫私通。于是基尔斯蒂和克劳斯串通一起，克劳斯谎称到芬兰北部地区去处理诉讼事务而离家出走。(3)基尔斯蒂在家设宴款待乌奥列夫，用计把他骗到埃琳娜的卧室，然后引克劳斯去捉奸。克劳斯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放火把房子烧毁。(4)埃琳娜替新生的男婴求情，克劳斯说那是奥拉维的儿子。埃琳娜的母亲来央告也无济于事。阴险毒辣的基尔斯蒂怂恿克劳斯放火。(5)克劳斯坐在马厩的门槛上抽泣，耶稣乔装一老者从他面前走过。克劳斯向耶稣诉苦说自己把家室及牛马都烧为灰烬。耶稣告诉他，埃琳娜带着孩子和长工一起进了天堂，他克劳斯和基尔斯蒂该下地狱。

民谣《埃琳娜之死》不仅具有戏剧性情节，而且的确是一部脚本，在该诗的手稿上标明了人物先后出场的次序。情节如此丰富的民歌，如果不是借助文字的记录，显然是不可产生的，也不可能保存下来。诗人既取材于北欧及本国歌谣宝库，也取材于史实。芬兰历史上曾有个叫克劳斯·杰克内的南方贵族于1383—1390年之间在海麦地区当过法官，他将名叫埃琳娜的原配夫人活活烧死，另娶名叫克利斯蒂的女子为妻。歌谣作者情况不详，但

从其精巧的戏剧构思、生动的环境描写及丰富的人物感情描写来看，一定是一位博学多闻之士。此诗结构和笔法与一般流行的歌谣相去甚远，但其主题却不外乎爱情、死亡、骑士的自豪和女性的水性杨花之类，而这正是歌谣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　卡勒瓦拉体抒情民歌

民间抒情歌的发展史在芬兰国内至今仍未理出头绪。专家们只能根据诗歌的内容进行分类，大致分为哀歌、情歌、怨恨歌和婚嫁歌几大类。各个时期的诗歌都有不同的题材，产生的时代也均不可考。

哀　歌

忧郁、孤寂和苦闷构成了大多数芬兰抒情民歌的基调，从《生不逢辰》一诗可以听到诗人悲观厌世的哀叹：

“早知如今,我的亲娘，
怀我生我，我的太阳，
不幸儿子的哺育者，
倒霉子女的抚养者，
何必当初，拥抱情郎，
紧搂爱人如痴如狂，
不如拥抱肮脏枯树，
把潮湿的树枝搂住。

早知如今，我的亲娘，
不如把碎石洗干净，
用襁褓来包扎木材，

用摇篮来装盛泥块，
何必替我洗净身体，
把我放入小襁褓中，
轻柔抚爱，把我娇惯，
让我尝尽世间辛酸。

早知如今，我的亲娘，
不如烧掉我的摇篮，
把它狠狠投入火炭，
让我葬身火海之中，
何必把那摇篮摇动，
让我如今无限忧伤，
命途多舛，终日彷徨。”

这首诗从风格和基调来看，与挽歌十分接近，显然是最古老的抒情民歌之一，从爱沙尼亚直至北卡累利亚，流传甚广，挽歌仅次于拉普人的无词歌，是北欧最原始的一种诗歌，其特点是在诗的开头用昵称或浑名来称呼一个人或动物，而《生不逢辰》一诗正好具备了这一特点。诗中表现出强烈的自卑感，对生母的怨艾和对自己厄运的悲叹，这种“但愿早已不在人世”之类的痛惜之情与新娘的婚礼挽歌如出一辙。与芬兰抒情民歌中无数其他哀歌相比，《生不逢辰》一诗显得尤为浑厚有力，新颖别致。

还有一首抒情民歌《我是无家可归的鸟》，诗人通过自己与小鸟的对比，哀叹自己的不幸遭遇：

“松鸡有自己的家，
燕雀有自己的窝，
麻雀有自己的宿营地，

金翅鸟有自己的栖身所。
我是无家可归的松鸡，
我是无窝的燕雀，
我是无宿营地的麻雀，
我是无栖身之所的金翅鸟。”

面对自由飞翔在大自然界中的鸟类，诗人深叹自己命运的不佳，自己的生活处境甚至连一只小鸟都不如，这是何等悲惨的状况！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极度悲观的气氛和情绪。同时也可以看出诗人对当时世界现状的极度不满。

情　歌

在芬兰古老的抒情民歌中，男女双方坦率表示相互爱慕的诗是颇为罕见的。最早出现的情歌如《雪中的鸦是纯洁的》是男傧相或未婚妻的亲属在婚礼上赞扬未婚妻的，而不是新郎或新娘彼此相互歌咏的诗歌：

“雪中的鸦是纯洁的，
你比鸦更纯洁；
天上的星是明亮的，
你比星更明亮；
海中的浪花是晶莹的，
你比浪花更晶莹；
山坡上的白桦是美丽的，
你比白桦更美丽。”

富有浪漫情调的民歌是在后期进入芬兰抒情诗歌的。在这类诗歌中，多运用一些诸如“我的小心肝”、“我的小宝贝”、“我的

小天使”、“我的小鸟”等词语来表示被爱的对象。

情歌《当我的情人来了》标志着芬兰抒情民歌达到顶峰，从而使芬兰诗歌进入欧洲文坛：

“当我的情人来了，
我要冲出院子去迎接。
尽管前面有毒蛇挡道，
我仍要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尽管前面有张着血口的豺狼，
我仍要和他甜蜜的亲吻；
尽管前面有闪着寒光的大刀，
我仍要和他睡上一觉。”

这首诗把一位久锁深闺的少女渴望爱情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诗歌语言朴实无华，情感浓烈，抒发大胆、坦率。在一位长年生活在被冰雪封锁的北国的少女身上迸发出如此强烈的情感的确是不可思议的。这首民歌发表于 18 世纪，19 世纪初就被译为英、德、法、荷等多种文字，在欧洲广为传播。德国的大诗人歌德亲自把这首诗翻译成德文，从而使芬兰诗歌走向世界。

怨 恨 歌

怨恨歌主要由妇女演唱。妇女承担了各式各样的家务劳动，然而时常遭到男人们的责难：

“男人责骂我什么？
我和其他女人一样：
挤牛奶，烤面包，
看孩子，烧饭菜，

种植庄稼，
还伴你睡觉。”

这类诗歌通常表现出受压迫者的反抗心声。还有一类诗歌反映出嫁妇女返回故乡时的怨恨心情。如一首诗描写一位出嫁女探家时，家里老人吩咐她给妹妹做些燕麦粥充饥，她却因怨恨老人把她嫁给他人而恼怒，故反驳道：

“水已冻成冰，
麦粉也是凉的，
比麦粉更凉的，
却是做粥人的心。”

更多的怨恨歌是抒发对公婆，妯娌及男主人的不满情绪。有的村落的妇女更不满自己所处的奴隶地位：

“我们是别人的奴隶，
遵照别人的命令行事。
我们穿的是破烂的衣衫，
我们吃的是发霉的面包，
我们睡的是冰凉的床铺。”

歌者对自己的悲惨处境提出强烈的控诉。因为怨恨歌一般是处在被奴役地位的“我”或“我们”表示反抗情绪的诗篇，所以有些芬兰学者把此类诗歌称之为反抗歌。

婚　嫁　歌

一般婚嫁歌涉及到男女双方及其家属。新娘告别生她养她的家乡出走，难免有依恋之情。母亲对女儿的出嫁，多有劝谕之意。新郎对新娘的驾到，有喜悦之情。母亲对儿子的亲事，也多有教育之词。这在婚嫁歌中都有所描述。然而其中劝谕新娘和教育新郎的歌尤为广大人民所喜爱。这些诗歌在艺术手法上多采用对偶法或渐进法。所谓对偶法，即在相邻的两行诗中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例如：

“对这姑娘需要教育，
对这新娘需要训诲；
有谁来训诲女郎，
教育姑娘的又有谁？
你得尽你的本分，
你得小心地来往；
不像在父亲的故乡，
不像在母亲的地上。”

所谓渐进法，就是通过对偶法来加强语气，并进一步来发展原来的意思。例如：

“你得领你的小鸽子，
到五谷丰登的山坡，
或者领她到谷仓里，
帮她去拿裸麦和大麦，
给她烘大块的面包，
给她酿最好的美酒，

小麦的面包为她烘，
做饼的面包替她揉。
亲郎，亲爱的小宝贝。”

第二章　瑞典占领时期的文学

（公元12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

第一节　历史和文化背景

瑞典占领时期从1155年瑞典对芬兰发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一直到1809年瑞典和俄国共同签订的哈米纳和约为止①，长达600多年。其间芬兰人民经受了巨大的磨难：瑞典连年发动的对外扩张战争，罗马天主教势力的不断渗透和巩固，土地所有制的改变，都加重了芬兰人民的负担，使他们长期流离失所，忍饥受饿，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只是到了16世纪，芬兰的经济和文化状况才开始好转。

瑞典占领时期的芬兰历史是根据瑞典王国的历史来划分的，一般分为五个重要时期：(1)十字军东征及瑞典占领初期（1155—1323)。(2)北欧联盟时期(1324—1523)。(3)宗教改革时期(1524—1617)。(4)鼎盛时期（1618—1721)。(5)自由时期（1722—1809）在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瑞典在芬兰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天主教势力得到加强。瑞典在芬兰实行了政教合一，主教既是教区的首领，也是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从14世纪70年代至16世纪

①哈米纳和约系指1809年9月瑞典王国和沙皇俄国在哈米纳共同签订的和平条约。其中规定瑞典向俄国割让包括整个芬兰在内的全部东段领土。

末芬兰的主教都是由芬兰人来担任的，这对促进芬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瑞典入侵时，芬兰民族已经形成几大部落，除西南部芬兰人的部落之外，还有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海曼莱宁部落和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卡累利亚部落。后来由迁居在东西部落之间荒原地区的新移民组成了萨沃勒宁部落。这几大部落划地为牢，各行其政，并以特有的生活方式从事农业或畜牧业生产，因而形成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方言。特别在芬兰的西部和东部地区，此种差别是相当大的，这甚至从 20 世纪一些芬兰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

中世纪时期瑞典王国在对外政策上取得了两项重要成就：其一是 1323 年瑞（典）俄（国）双方共同签署的《榛岛协定》；其二是 1397 年瑞（典）丹（麦）两国共同协商组成的北欧联盟。在《榛岛协定》中瑞俄双方明确划分了边境界线，但是瑞典王国却不守信用，继续大规模地向东扩张，致使东部边境经常发生流血冲突和战争，给芬兰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不安。瑞丹两国结成的联盟由丹麦女王统一领导，旨在抵御外来反抗和进行对外扩张，主要矛头针对德国和俄国。这个联盟历经近两个世纪，从 14 世纪末开始生效，至 16 世纪方告结束。在此期间芬兰人民实际上也处在丹麦王国的统治之下。

宗教改革运动是在北欧联盟解体之后由瑞典国王古斯塔·瓦萨开始推行的。其目的是限制和削弱罗马天主教的势力，推行德国人马丁·路德创建的新教。在这一期间，罗马天主教的一切财产均归君主所有，王国开始控制教会的活动，僧侣的权势大大缩小，而贵族势力日益壮大。同时在宗教改革末期出现了地主阶层。此时拉丁文在教会的统治地位逐渐削弱，芬兰文的翻译工作开始进行，这对发展芬兰文化事业是大有好处的。瑞典国王在 1581 年宣布芬兰成为大公国，这在芬兰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它标志

着芬兰向独立自主的国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此芬兰人民对宗主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就连芬兰的贵族政治也富有爱国色彩，如 16 世纪末在西基斯蒙德担任瑞典国王期间，芬兰贵族更多的是倾向波兰而不是瑞典，他们与瑞典统治集团多次发生矛盾。因而瑞典统治集团恼羞成怒，一手导演了 1596—1597 年的“棍棒战争”，消灭了部分芬兰贵族势力。

在鼎盛时期，瑞典统治集团的权力更加集中，贵族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农民更依附于贵族阶层。虽然 1617 年仍然承袭了北欧联盟时期制定的由皇室、僧侣、贵族和地主所组成的议会制，但是贵族拥有更大的特权。例如，16 世纪初国家 96% 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但是到 17 世纪中叶贵族则控制了 50% 的土地，致使许多农民沦为赤贫，无法维持生计，由于瑞典统治集团的权力更加集中，使得芬兰更加依附于宗主国。经过连年的对外扩张战争，芬兰大公国的地域确实向东延伸了，然而也加重了芬兰人民的负担。

1640 年在芬兰成立了第一所高等学府——土尔库学院。最初这个学院完全由瑞典人操纵，学院的教员和学生也都是由瑞典选派来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已成为培养芬兰优秀人才的场所，芬兰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在这所学院学习过。无疑，这所学院对发展芬兰文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自由时期系指瑞典国王的权力转移到议会，贵族的特权已经从顶峰向下衰落，基督教地位得到加强，资产阶级开始兴起。在此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三世曾发动过两次对俄战争(1742—1743 年之战和 1788—1790 年之战），但是均以失败告终。这标志着瑞典王国称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其侵略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一般说来，18 世纪对芬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特别是在波萨时期。这时由于瑞典国王古斯塔三世及其皇室崇尚法国文化艺术，并且沟通了芬兰与欧洲文化直接接触的渠道，致使欧洲文化

艺术源源流入芬兰境内。

当然，纵观瑞典占领时期的芬兰历史，其经济和文化状况的确是不景气的，而芬兰的文学状况更是如此。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一些国家在文学创作上果实累累，是丰收的岁月。而这时的芬兰文学园地则呈现出一派荒芜景象。实际上只是到了 18 世纪末芬兰文学创作事业才开始兴起。在此之前芬兰文学创作领域没有一个专业作家，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寥若晨星。 16—18 世纪的芬兰文学作品不过为后世的一些芬兰人文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芬兰文学与西方一些国家文学相比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发展较晚。19 世纪才产生了第一批真正的古典文学作家，因此 19 世纪对芬兰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2)当时用芬兰文和瑞典文两种语言进行文学写作，中世纪时期还用拉丁文进行文学写作。瑞典文是宗主国的语言文字，它发展较早也比较完善，而芬兰文字发展缓慢且使用较晚。因此，在官方机构和知识界，瑞典文成为通用的语言文字，从而在这段历史上造成芬兰和瑞典拥有一些共同的作家，这些作家在两国的文学史上都可能程度不同地加以介绍。(3)芬兰文学艺术风格的形成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和发扬了芬兰古老民间诗歌的优良传统；二是借鉴了西欧和北欧一些著名作家的写作艺术手法；三是受俄国文学中一些文学大师的影响。

在瑞典占领时期，芬兰从事文学写作和欣赏文学作品的大都是一些皇室贵族和僧侣等社会上层人士，且出版的作品相当少。据统计，在长达 600 多年的时间里一共出版了芬兰文的印刷品 1950 件，其中书籍 1500册。可见用芬兰文发表的文学作品微乎其微，且 80%以上均是宗教文学。文学体裁只限于诗歌和散文，至于戏剧和小说等文学形式当时仍未出现。文学题材范围也颇为狭窄；绝大多数来源于圣经的故事。只有极少数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芬兰

社会状况及其出现的一些矛盾。有一小部分哀歌诉说了战争给芬兰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偶而有些诗歌作者在欢度节日的晚会上即席赋诗来抒发个人对时局的观感，但是这些诗歌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启迪后人。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多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土尔库学院、教区和贵族宫廷。1770 年在土尔库学院诞生了第一个芬兰文学组织《朝霞协会》，它的曙光迅速照遍了芬兰大地。教区成为芬兰诗歌播种的圣地。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几乎所有用芬兰文写作的诗人都是神学界人士，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也是由神职人员或通过贵族宫廷传播到芬兰国内来的。当时在芬兰拥有一批崇尚法国浪漫派文学的人士。18 世纪末在土尔库学院也涌现出一些推崇康德哲学的学者。

总之，瑞典占领时期的芬兰文学大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中世纪阶段，当时出版的文学作品为数寥寥；宗教改革阶段，以阿格里科拉为首的芬兰民族文学开始创建；土尔库学院创建初期，即 17 世纪瑞典语诗歌蓬勃发展；18 世纪具有民族特色的芬兰语诗歌破土而出，且人文科学著作开始出版。

第二节　中世纪的文学

在芬兰最早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几乎都与宗教有关。只是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及宗教改革致使中世纪的一些文字材料所剩无几。

瑞典王国对芬兰进行十字军入侵的同时便委派英国出生的亨利克担任第一任驻芬兰大主教。他在土尔库就职不久就在此地设立了大教区、教会学校和 6 所修道院，并且开创了宗教文学，旨在对芬兰人民进行精神奴役。

芬兰最早出现的一部宗教文学作品是 13 世纪 90 年代用拉丁文出版的《亨利克传记》。其内容叙述主教一生的主要功绩和生活

经历，同时也反映出其时代的一些特征。因此，这部作品既是一本个人传记，也是一本芬兰中世纪历史教科书。这本传记最初只是在圣餐仪式上宣布和用于布道。

芬兰第一位宗教文学作家是约斯·布德(1437—1491)。他出生在芬兰北部地区，在纳塔里修道院任职，用瑞典文写作。他的代表作品是《约斯·布德集》,其内容丰富多彩,既包括神学理论、神话和圣徒传奇，也包括生动有趣的传说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这部作品富有文采，语言生动活泼。此外，约斯·布德还以翻译圣经而享有盛誉。

中世纪芬兰最优秀的一部宗教文学作品是拉丁文版诗集《敬神歌》。这部诗集是由亚科·芬诺于1582年编选的,其中包括100首诗歌。这些诗歌绝大部分产生于天主教盛行时期。1616年这部诗集由芬兰著名赞美诗创作者海明基·玛斯库拉宁编译成芬兰文，从而赋予这部诗集以新的时代特色。这部作品作为教堂做礼拜和学校演唱材料一直在芬兰流传了几个世纪。

诗集《敬神歌》中的诗歌作者都已失传，绝大多数无从考证。但是从其中十多首典型的离合诗①中可以判断出作者的名字。例如，诗集中《唱给亨利克的歌》这首诗可能是由14世纪末享有盛名的主教拉瓦德第二写的。

诗集《敬神歌》是由不同题材汇合而成的。它的前半部分内容主要反映耶稣诞生的遇难的历史，有圣诞节颂歌、圣母玛丽娅颂歌，其后半部分内容包罗万象：有些诗歌反映出中世纪芬兰人民对人生的艰难和空虚的感叹；有些诗歌反映青年学生的欢乐和忧伤；有些诗歌叙述了芬兰中世纪的历史大事件。从该诗集中不难发现，有的诗歌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或者模仿了外国诗歌的格式和内容，这种诗歌很可能出自芬兰传教士或留学生之手。

①离合诗系指由几个诗句头一个词的首字母或最后一个词的尾字母能组合成词的一种诗体。

诗集《敬神歌》是在西方传统诗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融各种题材与体裁于一体，其艺术水平是很高的。它是中世纪拉丁文诗歌的集锦，享有国际声誉，并经历了几个世纪。

中世纪宗教文学作品中还包括一部分用拉丁文抒写的散文。其中比较优秀的散文集有土尔库大教堂 1474 年编出的《黑皮书》。它记叙了芬兰中世纪的大事件。另一部散文集是由主教帕瓦里·尤斯特（1516—1576）整理出版的《芬兰主教传记》。这部散文集后来由 18 世纪芬兰启蒙大师波萨改名为《1784—1800 芬兰主教编年史》。它于 1956 年翻译成芬兰文。

除宗教文学作品外，中世纪芬兰还出现过为数很少的骑士诗歌。其中最优秀的诗歌是《埃琳娜之死》。它采用五幕话剧的形式，叙述了美丽少女埃琳娜在花园散步，与英俊的贵族少年克劳斯·库尔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遂结为夫妇。然而，克劳斯·库尔基的女管家对埃琳娜成为贵族庄园的主妇大为恼火，从中干扰和破坏。有一天，大管家悄悄地告诉库尔基，诬告埃琳娜与长工乌奥列夫通奸。库尔基听后恼羞成怒，一气之下焚烧了整个庄园，埃琳娜也被活活烧死。事后这位贵族少年才弄清事实真象，追悔莫及，遂自杀身死。这首诗歌富有戏剧性，情节生动，语言流畅，是中世纪文学中的宝贵遗产。

第三节 16 世纪的文学

最早用芬兰文发表的文学作品产生在宗教改革时期。这次宗教改革正好适应了以造反起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瓦萨的政治需求，因此，宗教改革运动迅速在瑞典一芬兰得到推广和执行。其结果削弱了天主教的权力，同时强调了民族语言的重要意义。也只有在这时芬兰文的圣经翻译工作才能着手进行，并得以出版发行芬兰文版的宗教文学作品。

M. 阿格里科拉

第一位用芬兰文进行圣经翻译工作的是当时在德国维滕贝格大学学习的芬兰学生米凯尔·阿格里科拉(1510—1557)。他是宗教改革创始人马丁·路德的得意门生，亲自在这位新教大师的教诲下进修神学，并取得神学学位。阿格里科拉出生在乌西玛省东部佩尔纳亚地区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早年在维堡读书，后随其教师迁到土尔库。他最初担任土尔库主教的录事，后来升为神甫，1536—1539年间去德国进修神学。回国后他先后任土尔库教会学校校长，土尔库教区副主教、代理主教，到1554年才正式被任命为土尔库路德教区的主教。1557年他作为瑞典王国的代表前去莫斯科参加瑞俄之间的和谈，在归国途中不幸身染重病，病逝在俄芬边境线上，阿格里科拉为人勤奋好学，其短暂的一生为了芬兰的民族事业做出了光辉的业绩，特别是在创造芬兰书面文字和创建芬兰民族文学方面，更是成绩卓然。因此，后人誉他为芬兰书面文字和民族文学的开山鼻祖。

阿格里科拉作为宗教改革家积极地在芬兰推广新教。他性格敦厚，处事稳健，从不采用大刀阔斧和急风暴雨的手段，而是运用温和的循循诱导的方式去进行。在芬兰长达十几年的宗教改革中从未发生过流血事件，其功绩首先应归功于他。他在任土尔库教会学校校长期间力求遵照人道主义精神改革教育事业，把学生培养成出色的路德教徒。他担任芬兰新教首领之后也极力提高神职人员的文化水平。

阿格里科拉作为芬兰书面文字和民族文学的开山鼻祖在芬兰文化领域做的完全是开拓性的工作。在他之前芬兰文化园地一片荒芜，是他披荆斩棘，辛勤耕耘，在这块不毛之地撒下了生气勃勃的芬兰民族文化的种子。他不惜披星戴月五六载，终于在1542年编制出一套芬兰语字母，出版了普及读物《识字课本》，这是历

史上第一部芬兰语教科书，其中包括简单的教义问答和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约在 1544 年他编写了《宗教入门》一书，用自己创造的文字简要介绍了圣经中的一些故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1545—1547 年这三年中他还专门为神职人员写了一本《圣经祈祷书》。1548 年他完成了《新约》的芬兰文翻译工作。他在此书的前面亲自以诗歌的形式用芬兰文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该序言堪称一篇艺术价值很高的优秀散文诗作。阿格里科拉晚年除忙于宗教和政务工作外，还着手进行《旧约》的芬兰文翻译，可惜未竟其业便与世长辞。

J. 苏奥玛拉宁和 H. 玛斯库拉宁

后来继承阿格里科拉事业的有两位赞美诗创作者。一是《敬神者》的编选者亚科 · 苏奥玛拉宁，一是海明基 · 玛斯库拉宁。苏奥玛拉宁早年毕业于德国维滕贝格和罗斯托夫大学，后来任土尔库教会学校校长。他于 1583 年用芬兰文发表了《赞美诗选》。这部诗选包含 101 首诗歌，其中绝大多数诗都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只有十来首诗是作者自己创作的。其中较为优秀的诗章有《晨歌》和《旅人之歌》。另一名赞美诗创作者是《敬神歌》的芬兰文译者海明基 · 玛斯库拉宁（1550—1619）。他在 1605 年创作出第一部芬兰文版的《赞美诗集》，大约发表于 1611—1614 年之间。这部诗集含有 240 首诗歌。严格说来，苏奥玛拉宁和玛斯库拉宁都不是诗人，但是他俩都创作出较好的诗歌。前者创作的诗歌缺乏艺术特色，但寓意较为深刻；后者讲究遣词造句，追求诗歌的语言效果，然而内容平淡，往往流入空泛。两相比较，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E. 索洛拉宁

此外，这个时期还产生了一位芬兰文的散文学家埃利基 · 索

洛拉宁（1545—1625）。他出身于莱蒂拉地区一个神职人员家庭，曾留学国外获得学位。1583 年被任命为土尔库主教，一直供职到 1625 年去世。索洛拉宁的大半生都是在兵慌马乱的动荡岁月度过的，只是到了晚年才立志于写作。他积几十年的主教经历写出了长达 2000 页分上下两册的《布道集》（1621—1625）一书。在这部具有巴洛克艺术风格的散文集中，作者提到了 80 位著名哲学家和作家的名字及其名言，阐述了文化史上重要时期的基本状况和思想潮流。作者广采博引，论说了关于宇宙自然现象、异教徒、天主教、宗教改革、圣餐仪式上的争议、教会学校、教堂和神甫、不同教风和民风、社会和国家等问题。这是一部知识性很强的读物，它的出版对后世影响很大。

第四节 17 世纪的文学

瑞典语诗歌的兴起和芬兰语诗歌的缓慢发展是 17 世纪芬兰文学的显著特点。

17 世纪是瑞典语诗歌发展时期。在 16 世纪阿格里科拉时代，瑞典语诗歌仅处于萌芽状态，然而进入 17 世纪以后,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1640 年成立了土尔库学院，该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是从瑞典选派来的，因此，在芬兰国土上培育了瑞典语诗歌诞生的土壤；另一方面瑞典文已成为芬兰官方机构和知识阶层的通用语言。此外，1642 年在土尔库学院建起了印刷所，给瑞典语诗歌的出版提供了方便条件。

S. 弗尔西乌斯

最早出现的瑞典语诗人是西里德 · 弗尔西乌斯（1550—1624)。他出生在赫尔辛基，本来是一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其代表作是于 1611 年完成的《物理学》一书。当时自然科学和文

化艺术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弗尔西乌斯在该书的结尾部分写了23节赞美大自然的诗歌，因而也一举成为引人注目的诗人。他在这首诗中高度赞扬了造物主的伟大功绩 造物主创造了土、水、气、火四大人生要素，创造了物体的形状，创造了海洋、天空和地球的一切生命，包括人类本身。他在诗中触及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未曾深入的领域，有其独到之处，因而取得了较高的评价。另外，弗尔西乌斯还创作和翻译了一些宗教文学作品。

J. 弗赖斯

17世纪最著名的瑞典语诗人当属亚科布·弗赖斯(1691—1729)，他出生在芬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维堡，曾在土尔库学院就读。他在战争年代移居瑞典，直至逝世。然而诗人在瑞典生活期间经常写诗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他是一位爱国诗人。

弗赖斯创作的诗歌主要含有两个主题：一是表达战争引起人们的厌倦和苦闷心情；一是抒发诗人自己一生的痛苦经历。诗人偶而也写一些迎合统治者口味的诗歌，如1715年写的歌颂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从土尔其凯旋归来的著名诗篇《狂欢歌》等，但是类似这样的诗歌数量很少。他一生创作出大量诗歌。共汇编成两部诗集：一是1726年出版的《宗教和世俗诗歌集》；一是1728年出版的《诗歌集》。

弗赖斯创作的诗歌绝大部分格调低沉、忧伤，充满悲观的情绪。疾病、死亡、笃信上帝是他诗歌中常用的题材。诗人虽然年复一年的抒发对春天的赞美之情，对大自然风光的无限倾慕，然而就在这赞美和倾慕的同时，诗人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总是希望赶快离开这人世间的纷扰，返回到天国的宁静殿堂。死亡对诗人来说并不可惧，它只是意味着肉体的消亡，而灵魂则将从世俗生活的痛苦中得到解放。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吟唱的：

“死亡不能摧毁我们，
为拯救我们的灵魂，
死亡只是肉体消失，
而灵魂却得到解放。”

弗赖斯是第一位出生在芬兰的有独特风格的瑞典语诗人。他创作的诗歌内容丰富，含意深远，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处在异族铁蹄下的芬兰人民的不满情绪。诗人讴歌“死亡”，实质上是对统治者反抗的一种表达方式，具体表现出芬兰民族的“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崇高气节，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弗赖斯 1726 年发表的《教谕诗集》至今仍打动着芬兰读者的心。虽然这本集子不及法国哲理诗文那样尖刻有力，但是它能使人想起中古神话哲理诗文和布莱克箴言的寓言深奥和精练优美：

“我没有发现任何新生事物；一切周而复始，来去匆匆，无踪无影。从夏至秋，从秋至冬，从冬至春。岁月流逝，但一切都依然故我。”

“太阳的升落，溪水的流动，人类的繁衍何处是起点，何处是终点，无从查寻。”

“三个人不期而遇并且相互感到惊奇：一人双目失明,一人没有鼻子，一人是歪嘴。双目失明的人请求没有鼻子的讲话要清楚；没有鼻子的人请求歪嘴要开怀大笑；歪嘴的人请求双目失明的观察要精确。三人各有缺陷，却都给对方出难题。”

17 世纪芬兰语诗歌破土而出。但是由于芬兰文字的出现较晚致使诗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只有极少数诗人能够突破语言文字

上的障碍创作出具有一定格式和韵律的诗篇；而且这些诗歌，仅仅包括宗教诗歌和应景诗作。只是到了这一世纪末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仿照芬兰民间诗歌格律而创作的新的世俗诗歌才开始大量出现。

17 世纪上半叶，芬兰语诗歌创作只是处在摸索阶段，即“实验诗歌时期”。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芬兰语诗歌作者是芬兰北部拉毕地区的神父卡普莱尔·图德鲁斯(1638—1705)。他创作的诗歌《献给农民的诗》(1730)受到普遍欢迎。这首诗共分 28 节，使用四音步脚韵。作者在该诗中风趣而幽默地描绘出农民日常劳作的情景，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气氛，是上乘之作。

17 世纪两位著名的芬兰语诗人是约翰·卡亚努斯和玛特亚斯·萨拉姆尼乌斯。

J. 卡亚努斯

约翰·卡亚努斯（1655—1681）出生在帕尔达姆的一牧师家庭，毕业于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1679 年用拉丁文发表了毕业论文《世界的心脏》，1680 年在土尔库学院任副教授。在教学期间，他因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创作了许多“祝歌”而一举成名。但是他在芬兰文学史上只留下一首芬兰语诗歌《世界在消亡中》，这首诗在作者去世后的 1683 年才得以出版。从该诗的题材范围、格律或韵律来考察，可以发现作者是模仿瑞典诗人卢西多尔的《墓歌》而写成的。当然他不是机械地模拟，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加大了诗的容量，成为独具一格的芬兰巴洛克式的诗篇。这首诗与其他芬兰语诗歌相比，有其独到之处：一是感情强烈，二是语言完美。它可以说是瑞典占领时期芬兰语诗歌的佼佼者。诗人在该诗中宣扬了宇宙间万物都要消亡的基督思想，不仅地球上的人类将消亡，甚至天上的星辰、地下的海洋、地面上的一切树木花草、昆虫鸟兽都要消亡殆尽，只有上帝是永存的。他劝告人们听从上帝意

志的安排，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要悲观失望，要“去拥抱上帝”。

M. 萨拉姆尼乌斯

玛特亚斯·萨拉姆尼乌斯（？—1691）是芬兰第一位以本民族语言写诗歌颂耶稣的诗人。他于1690年创作的著名诗篇《耶稣颂》震惊当时芬兰文坛。全诗长达2000多行，共分29首歌，具体描述了耶稣诞生、生活的历程和遇难的历史，塑造出完整的救世主耶稣的形象，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诗歌语言朴实无华，简练扼要。作者采用了记实的写作手法，很少有夸张的成分。这首长诗流传了200年，其间共出版过16次之多，可见它对芬兰人民影响至深。它是继《识字课本》、《教义问答》、《赞美诗歌》和《圣经》之后芬兰人民最受欢迎的读物。

第五节　18世纪的文学

18世纪是芬兰启蒙文学的开端，在这一时期主要包括尤斯莱尼乌斯、波萨和弗朗兹三位启蒙文学大师。

D. 尤斯莱尼乌斯

达尼埃尔·尤斯莱尼乌斯（1676—1752）是芬兰启蒙文学的创始人。他出生在芬兰拉乌卡教区的一个牧师家庭，1691年入土尔库学院学习，其间因家道中落，经济困难，曾几度辍学。他于1700年发表的毕业论文《土尔库今昔》标志着芬兰文化运动的开端。他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长篇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芬兰是一个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国家，芬兰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能歌善舞的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和道德修养；文中特别着重指出芬兰古老的民间诗歌艺术达到世界水平。这是一首芬兰颂歌，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祖国及其民族的深深热爱之情。这在当时不啻是吹

响了震撼人心的号角，使处在异族统治下的芬兰人民如大梦初醒，擦亮了眼睛，清醒了头脑，鼓起了勇气，振奋起精神，为了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斗争。

尤斯莱尼乌斯的第二篇论文《芬兰人的自卫》（1703）是第一篇论文《土尔库今昔》的续篇，也是对首篇的完善和补充。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道"：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而生，而是为了祖国，为了双亲和朋友"。这就表明作者要全力以赴来保卫芬兰民族不受外来的侮辱和侵犯，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

这篇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进一步阐述了芬兰大地能够生产出满足人民日常需要的一切财富。第二部分驳斥了那种认为芬兰人民软弱无能无所作为的无耻滥言。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历史上一些在军事、政治和文化科学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芬兰著名人物的光辉业绩，并且具体描述了芬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以上是我所表示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种感情是最纯洁、最高尚的。我关心的是芬兰民族的命运。我虽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却是属于高尚的芬兰民族中的一个成员。"

尤斯莱尼乌斯晚年还编写了一部《芬兰、拉丁、瑞典语字典》（1745）。这是他长时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晶。它是第一部芬兰语字典，其中包含有16000多个芬兰词汇。这部字典出版的意义不可低估，它对后来普及芬兰人民的文化教育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促进芬兰文学和语言文字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尤斯莱尼乌斯在芬兰大地播下了民族启蒙的种子，它预示着芬兰爱国主义和新文化运动将蓬勃开展起来。

H. 波萨

亨利克·波萨（1739—1804）是芬兰启蒙文学最典型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他对芬兰民间诗歌、语言和历史均有很深的造诣，成

绩卓著，是一代骄子。他出生在芬兰北部波赫亚地区的一个神父家庭，1760 年毕业于土尔库学院。他一生均在土尔库学院工作，先后担任芬兰文学和语言的讲师、图书馆馆员和大学教授。

波萨在文学领域突出成就是于 1776—1778 年之间完成的文学理论著作《论芬兰诗歌》。这是他长期从事搜集和研究芬兰民间诗歌工作的重大成果，也是芬兰历史上第一本文学理论专著。他在该书中详细论述了芬兰民间诗歌的形式、内容及其艺术特色，为后代文学理论工作者开创了一条研究民间诗歌的道路。另外，他还用瑞典文和拉丁文创作了一些新诗。这些诗歌大多数描绘芬兰美丽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有的诗也颂扬了英雄人物和爱情。他的诗歌语言流畅，音乐感强，为后代诗人提供了范例。

波萨在语言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在多篇论文中以大量的历史材料论证了芬兰语归属芬兰一乌戈尔语系，推翻了前人认为它属于希伯莱一古希腊语系的论点。波萨还精通匈牙利语，研究匈牙利文与芬兰文之间的近亲关系。晚年他着手编写芬兰语词典，最后终未竟其业便与世长辞，只为后代人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学资料。

波萨一生的主要功绩表现在历史研究方面。首先他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对芬兰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剥去其中的不实之词，并且在大量真实材料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撰写。他的主要历史著作是在 1784—1800 年间撰写的《芬兰主教编年史》。该书共分 56 章，反映了芬兰中世纪的全貌，是一部芬兰中世纪的历史教科书。因为波萨在史学研究上功绩卓越，所以后人誉之为“芬兰历史之父”。

此外，波萨在晚年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知识界著名人士一起成立了芬兰第一个文学组织《朝霞协会》。其目的动员全国所有知识分子致力于对广大芬兰民众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工作。这个组织坚持了将近 10 年(历史上称之为‘波萨时期’)。在此期间，他创办了芬兰第一份瑞典文报纸。该报仿照英国周报，共分文学

艺术、史地、语言研究、经济等专栏。它的诞生无疑为提高芬兰人民的文化科学知识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加速了芬兰文版报纸的诞生。1776 年一名叫安蒂·里塞里乌斯的芬兰牧师开始创办每月出版两次的芬兰文报纸。该报的主要教育对象是芬兰农民，其内容主要刊载有关农业的文章。当然，成立组织，创办报纸，这在当时也是轰动全国的大事，其影响是颇为深远的，特别对促进芬兰民族的觉醒，其意义就更为巨大。

波萨是芬兰启蒙运动中的一员主将。他的哲学观点最初倾向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后来接受了洛克的经验论。他在诗歌研究方面倾向赫尔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较之赫尔德保守。他对当时萌芽中的浪漫主义抱有偏见，对流行于土尔库学院的康德哲学亦采取了疏远态度。但是波萨本人却创作出一些歌颂英雄和爱情的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诗篇，因而被后人推崇为芬兰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F. 弗朗兹

弗朗斯·弗朗兹(1772—1847) 是芬兰诗坛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出生在奥卢城一个商人家庭。在母亲的薰陶下，他幼年时代就对芬兰民间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民歌也促使他智育的发展。他 13 岁考入土尔库学院，17 岁获得学位，21 岁任学院讲师，很快又晋升为教授。他于 1811 年侨居瑞典，直到逝世。

弗朗兹一生用瑞典文写诗，但采用了芬兰民歌的形式，奏出了芬兰民族的主旋律。他创作的诗歌格调清新，感情浓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芬兰的自然风貌，特别是内地湖泊的优美景色常常构成诗人触景生情的基础和引亢高歌的源泉。他在诗歌中经常把描绘瑰丽多姿的大自然风光和抒发诗人内心独特的感受巧妙地融为一体，以达到主客观的高度统一，从而迸发出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弗朗兹主张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反对机械地

摹仿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观点，追求个性解放。这种崭新的文艺思想培育了一批爱国主义诗人，为芬兰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从理论上铺平了道路。

弗朗兹早期发表引人注目的诗《人的面孔》就给芬兰文坛带来了一股新的生气：他冲破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所宣扬的“神主宰一切”的唯心主义的旧思想观念，赞美人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后来他又相继发表了《老兵》（1793）、《新的伊甸园》（1794）、《芬兰的沃野》（1800）和《拉毕之夜》（1802）等诗歌。在这些诗歌中，弗朗兹以饱蘸激情的彩笔，热情地绘制了一幅幅春意盎然的图画，意境深远，格调高昂，颇具感染力。他在《芬兰的沃野》一诗中讴歌了芬兰的大好河山并向人民展示出美好的前景。诗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芬兰一定会摆脱统治者的枷锁，变得像英国那样繁荣富强。在《老兵》这首诗中，诗人具体描述了一位守卫着萨依玛岛的年老士兵；他在岛上只身一人，无依无靠，抗严寒，战冰雪，忍饥受饿，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几十年如一日，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双鬓已染上雪霜，美髯飘拂，手握长枪，巍然屹立在这孤岛上。他双目炯炯，凝视着远方，随时准备抵抗外来侵略者。诗人在该诗中刻画了一个感人的艺术形象。这实际上象征着芬兰民族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斗志。《老兵》这首诗是芬兰文库中的一件珍品，至今仍对芬兰人民有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弗朗兹是芬兰浪漫主义文学的开拓者。在他的影响下，一批芬兰文坛的后起之秀很快成长起来。但是诗人在1811年移居瑞典后，给他的心灵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也使他的诗歌创作逐渐改变了方向。他在侨居瑞典期间虽然也创作出一些诗歌和剧本，然而大都选用历史题材，缺乏生气，多属平庸之作。

第三章　自治时期的文学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

第一节　历史和文化背景

1809 年春天，俄瑞战争还没有停火，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第一在芬兰波尔沃召开了议会。他在议会上宣布瑞典统治芬兰的时代已经结束，应允芬兰保留以前的社会结构、特权和一切法律规章制度，并特别指出，芬兰“享有国家的尊严”。当时俄国面临不可一世的法国暴君拿破仑的威胁，迅速而果断地稳住芬兰“大公国”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实践证明，当拿破仑对俄发动战争时，芬兰经受了考验。对其新的主子惟命是从，俯首贴耳。就连后来的波兰战争（1830、1867）和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5）期间，芬兰仍保持了稳定局面，成为沙俄这个动乱大家庭中的“一个听话的孩子”。因此芬兰也得到俄国沙皇的最高奖赏 芬兰在整个 19 世纪均享有特权，成立了自己的政权，收复了俄国占领近百年的维堡省，修建了铁路，成立了中央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实际上芬兰在社会制度、法律、经济、文化、语言和宗教诸方面都取得了自治权。只有军事和外交始终受到俄国的控制。

俄国占领时期芬兰国内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1812 年芬兰首都从土尔库迁移到赫尔辛基。1828 年土尔库学院也迁到赫尔辛基并改名为赫尔辛基大学。在 1830—1840 年之间芬兰开始实行国家

工业化建设。1856 年萨依玛运河的建成疏通了由芬兰内河通往波罗的海的水路，为进行海外贸易打开了通途。 1858 年芬兰成立了第一所芬兰语的尤瓦斯库莱中学。1862 年建成由赫尔辛基至海麦林纳的铁路。1870 年由赫尔辛基至彼得堡的列车开始通行。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芬兰哲学家斯奈尔曼当选为议会领导人，加之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登基后对芬兰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政策，致使芬兰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全面好转，特别是 1863 年芬兰议会通过了“新语言法”，确定芬兰语为正式官方语言后，它与瑞典语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1866 年制定了“国民教育法”,从而建立了芬兰语的教育行政机构，为普及和提高芬兰民族的文化水平创造了有利前提。1869 年制定了“新教法”,为芬兰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在芬兰经济领域出现了由 19 世纪初一些英法经济学家主张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剥削和掠夺的经济理论“自由放任主义”,它刺激了芬兰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新的工种开始产生。例如，从前芬兰森林仅仅提供燃料，而这时锯木业和木材加工业相继成立，并把产品远销到欧洲和俄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很快。

在政治生活领域，原先由贵族、僧侣、资产阶级和地主四个阶层组成的议会形式再也不能反映芬兰人民内部真正的力量对比。该时期党派划分已经提到议会日程。19 世纪 60 年代最早出现的党派划分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即产生了芬兰人民党和瑞典人民党，介乎两党之间又产生了自由民主党。当时芬兰人民党的领袖是历史学家和作家于尔约一科斯基宁（1830—1903），瑞典人民党领袖是语言学家和教授阿·弗列乌德查尔(1836—1911)，自由民主党领袖是议员列奥·麦琪琳教授。第二次党派划分是以观点不同为依据的，如在芬兰人民党内部分裂出来新的“青年芬兰人民党”。它反对保守,力主革新,对传统的宗教爱国主义持批判态度；

同时创办了《日报》和《青年芬兰》报刊。该党派的骨干力量都是青年作家，他们后来成为 19 世纪 80 年代芬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 90 年代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主力军。第三次党派划分是以阶级立场不同为依据的。如伴随着芬兰工业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工人队伍日益壮大，最初为了调解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纠纷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但随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1903 年在工人运动委员会基础上产生了芬兰社会民主党。它代表着工人的利益，为北欧最先进的党派组织。1906 年农民也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农民党，其领导人是作家桑德里 • 阿尔基奥。

19 世纪末，正当芬兰社会急剧变革时期，沙皇俄国加剧了对芬兰的控制。沙皇亚历山大第三 1890 年宣布芬兰邮政部门纳入俄国邮政当局领导。特别是尼古拉二世上台之后于 1899 年发表了“二月宣言”，旨在取消芬兰百余年来享有的独立自主的特权，企图使芬兰永远隶属于宗主国统治之下，并规定俄语为统一的语言，这激起芬兰人民的强烈不满。“300 万忠于沙皇的芬兰人民几周之内开始厌恶他了’①。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了 1905 年的芬兰总罢工运动。

俄国占领芬兰时期一直延续到 1917 年。但实际上自 1899 年以来沙皇就已经失去了对芬兰的控制能力。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芬兰开始有步骤地致力于建设符合本民族利益的独立国家。

1808—1809 年俄瑞战争结束后芬兰的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异常迅速。战争结束后还不到 10 年，在土尔库便成立了一个文化组织，这个组织创办了两种报刊《犁》和《泰担女神》。后来一个名叫沃帕科的芬兰人用本民族文字出版发行了《土尔库周报》，这是最早出现的芬兰文版的报纸。此外，土尔库学院青年讲师阿尔维

①引自芬兰历史学家尤蒂卡拉语。

德逊还创办了两种瑞典文版的报刊。后来文学史家把这一阶段称为“土尔库浪漫主义时期”。这是芬兰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芬兰浪漫主义文学与北欧其他国家浪漫主义文学不同，它以积极浪漫主义为主，是芬兰民族意识高涨时期的产物，主要是描写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要求突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其艺术特色注重对大自然景物的描写，但经常与诗人爱国之情融合在一起。诗人对民歌和民间传统发生极大兴趣，往往从民间创作中吸收营养，喜欢采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模仿富有感召力的民间诗歌格律来进行创作。诗歌是浪漫主义者惯用的文学类型。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在社会动荡和变革中加强了其历史感和民族意识，表现出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关注。

土尔库浪漫主义时期没有持续多久就遭到挫折。该时期激进的代表人物阿尔维德逊被迫逃离芬兰去瑞典定居。土尔库发生严重火灾后土尔库学院迁移到赫尔辛基。真正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芬兰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该时期的核心组织是“星期六晚会”。它的主要成员是一些进步的青年作家。他们反对保守，追求个性解放，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比较自由的文化氛围。“星期六晚会”中年龄最大的是哲学家吞斯特洛姆，他是黑格尔哲学的崇拜者，其影响很大。其他一些年轻的成员，如鲁内贝格、斯奈尔曼、托佩利乌斯、伦洛特等后来都成为芬兰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由于“星期六晚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1831 年成立了芬兰文学协会。它首先出版了伦洛特编写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1832 年创办了瑞典文版的《赫尔辛基新闻》，第一任主编是鲁内贝格。后来由于“星期六晚会”中的主要成员相继离开赫尔辛基：伦洛特移居卡尼亚地区，鲁内贝格去波尔沃定居，斯奈尔曼去国外旅行，该组织被迫解散，从而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宣告结束。

土尔库及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发表的多是瑞典文版的文学

作品。而芬兰文版的文学作品从 19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发行，最初仅限于一些诗歌，后来才出版了基维等人的戏剧和小说。 1866 年创办了芬兰文版的《文学月刊》，一直到 1880 年这个刊物才由《捍卫者》取代。

芬兰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样涉及到戏剧领域。1872 年由芬兰作家和评论家帕格波姆（1843—1906）倡议成立了芬兰剧院。1902 年改为芬兰国家剧院。1894 年建立了芬兰一瑞典专业剧团，1898 年该剧团改为现代化的瑞典语剧院。

芬兰文学受到了欧洲新思潮的影响。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达尔文主义和宗教批判学就流传到芬兰，在芬兰文化界扎下了根基。青年芬兰人民党的口舌《日报》和《青年芬兰》承担了宣扬这一新思潮的主要任务。《日报》和《青年芬兰》的编辑都属于非官方的文学沙龙“ 耶乃弗尔特学校 ”的成员。该组织的发起人是出生在彼得堡的伊丽莎白 · 耶乃弗尔特(1839—1929) ,她是芬兰省长兼议员耶乃弗尔特的夫人，酷爱文学。在这个文学沙龙里培育了一批重要的芬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一些人后来成为芬兰新浪漫主义文学的骨干力量。他们于 1897 年组成专业文学团体—— 芬兰作家联盟。

芬兰自治时期的文化和文学事业发展是相当快的。其标志之一是出现了农民文学和工人文学，特别是农民诗歌和工人戏剧引人注目，受到好评。其标志之二是芬兰文版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从 1809—1855 年出版了 425 本，相当于整个瑞典占领时期的 4 倍；1856—1865 年发行了 487 本；1866—1875 年发行了 574 本；1876—1885 年发行了 1299 本。其标志之三是芬兰文学出版社相继战立：1872 年成立了古麦鲁斯出版社，1878 年成立了索德斯特洛姆出版社，1890 年成立了奥他瓦出版社。其标志之四是 19 世纪末芬兰文版的世界名著，如世界文学大师易卜生、狄更斯、托尔斯泰、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在芬兰国内得到发行。

第二节　土尔库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

土尔库浪漫主义者

宗主国的改换对一个弱小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大事件，但在当时的芬兰文学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其原因就是芬兰文学的发展缓慢，它还不能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只是有一些现象表明了大国的更迭。当时有一些作家离开芬兰去瑞典定居，如 19 世纪初重要的瑞典语诗人弗朗兹及年轻知识界的激进派代表人物阿尔维德逊。有一些知识分子仰望东方，并迁到彼得堡供职，如著名的民俗学家和语言学家斯约格伦（1794—1855）。他作为芬兰一乌戈尔语系的研究者在彼得堡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并用德语撰写了量多质优的科学论文，成为彼得堡颇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更多的知识界人士则留在芬兰国内供职，他们对新的主子采取尊重的态度。最典型的人物是农民诗人彼得·瓦纳宁（1764—1846）。他以前作为议员曾在瑞典议会赋诗歌颂国王古斯塔·阿道夫四世，而如今又在波尔沃议会上赋诗颂扬沙皇亚历山大第一。当时其他众多的芬兰文人均采取了同样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以新的方式对芬兰文学艺术和语言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更严肃的讨论和研究。自从芬兰著名瑞典语诗人弗朗兹移居瑞典之后，给土尔库文化生活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空白，一些大学生也转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读书，该大学对芬兰民间诗歌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基础。土尔库的一些年轻的文人志士为了遵循芬兰爱国诗人波萨和弗朗兹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为发展芬兰的文学艺术事业，促进芬兰民族的觉醒，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个组织并出版发行了文学报刊，宣传对社会和传统文学艺术的叛逆精神。这个组织所代表的文学艺术理论主张被称为“土尔库浪漫主义”。虽然在该组织范

围内没有出现杰出的代表人物，然而却为后来的人才辈出撒下了优良的种子。

土尔库浪漫主义者既从国内波萨等人的爱国篇章中受到启迪，也直接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理论著作中找到借鉴。此外，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的芬兰大学生们也把瑞典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精髓化为己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当时在该校学习的芬兰青年诗人阿·依·阿尔维德逊（1791—1858）。他在诗歌创作中极力追随瑞典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激进派。当他返回土尔库后自己创办报纸，撰写社论。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新生的力量将要得到成长。"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要求芬兰广大知识分子为振兴祖国而忘我的工作，最后他这样写道："我们不是瑞典人，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俄国人，我们永远是芬兰人。"阿尔维德逊的富有政治色彩的爱国主义言论遭到俄国当局的反对，他创办的报刊被查封，他本人也于 1822 年被大学永远开除。在突如其来的强大政治压力下，青年诗人被迫于 1823 年逃往瑞典定居。后来他在瑞典担任皇宫图书馆馆长，但对故国之情一直没有中断。

俄国当局从青年诗人阿尔维德逊的文章中觉察出有游离宗主国的政治目的，因而对芬兰文人更加严格控制。当时土尔库浪漫主义者不得不采取更谨慎的宣传方式，他们把严肃的政治问题隐藏在文化问题的背后，以更隐蔽的形式来抒发爱国之情。当时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述芬兰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文章，如哲学家滕斯特洛姆（1787—1858）发表的《关于芬兰文学和语言发展的几个问题》、诗人林深(1785—1848）发表的《关于开拓芬兰民族语言的重要意义》等。也有一些青年文人创作出不少爱情诗歌和幽默诗歌。这些诗歌寓意深刻，格调清新活泼，充满了幽默感。如青年诗人阿·帕皮乌斯（1797—1866）创作的诗歌《麻雀》深入浅出，反映了当时众多芬兰文人的心理状态。诗人通过麻雀之口诉说了为什么当严冬来临时，其他鸟类都远渡重洋，飞到异国他

乡去避寒，而唯有它仍留在这冰霜封闭的国度安居。诗人以隐喻的艺术手法反映了芬兰众多的爱国文人在俄国占领期间，仍留在国内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信心和决心。

J. 尤太尼和 K. 科伦德

亚科·尤太尼（1781—1855）属于土尔库浪漫主义时期的第一位芬兰语诗人，长期在维堡从事创作事业。他出生于海曼省哈图拉地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00年入土尔库学院学习，但因家境贫寒中途几经辍学，至1810年才完成学业。1812年在维堡谋到一个公证人的职务，直到去世。

诗人尤太尼在其一生中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思想：一个人一生要为公共利益多做工作。他认为，公共利益就是发展芬兰的文学艺术事业，唤起民众的觉醒。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异国的文字，是人民的冰霜；／本国的文字，是人民的阳光。"他一生坚持用本民族语言创作诗歌。他的第一部诗集《诗选》（1810）是受芬兰前辈诗人波萨和弗朗兹的影响在大学期间写成的。这部诗集共包括21首诗歌，尽管艺术上显得粗糙，然而诗人直抒胸臆，流露出纯真的爱国主义思想。诗人一生创作甚丰，共有9部文学作品出版，其中以道德教诲诗歌为主，如《箴言》、《忠言》、《对儿童教师的劝告》、《论儿童的教育》。这些诗歌言简意赅，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内含不少警句和格言；有歌颂欧洲和平缔造者和民族解放者的诗篇，如《写在亚历山大第一塑像前》和《波赫亚战歌》；有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歌，如《新谚语》。除诗歌创作外，尤太尼还出版了哲学论著《论物质》和《论死亡》，编写了《芬兰语法》，创办了芬兰文化报《来自维堡的使者》。特别是他创作的两部剧本《家族》、《低级趣味》和中篇小说《命名日》，开辟了芬兰文学艺术领域的新篇章，为繁荣芬兰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诗人尤太尼强调文学创作要有目的性。他认为创作的目的在

于有利于人民，因而文学创作要植根于现实生活。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那些仅仅依靠个人想象创作出的诗歌，无论词句如何优美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诗人尤太尼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诗歌主要教育对象是农民，使他们真正懂得芬兰民族并不是弱小的民族，正如他的一首诗的题目所表示的，“我们也要得到尊重”一般说来，尤太尼的诗歌包含两个主题：一是鞭挞权贵者的利己主义；一是批评平民的愚昧无知。他是 1844 年以前第一位用本民族语言撰文斥责异国语言在芬兰占统治地位的不正常现象；同时也是最坚决要求使芬兰语言成为本国官方语言的芬兰诗人。他的这一正义呼声为芬兰语言和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卡莱·科伦德（1796—1875）是尤太尼的学生，也是深受尤太尼教诲的一位爱国诗人。他从童年时代就被尤太尼发现是个不平凡的孩子，尤太尼鼓励他“好好学习本民族语言，将来为本国人民做出一番大事业”。科伦德牢记尤太尼的教导，他虽然出身于瑞典语区域的一个牧师家庭，然而极力摆脱环境的羁绊，努力掌握芬兰语言。他早在大学期间就致力于芬兰民间诗歌的搜集、整理工作。1818 年他用芬兰语整理出第一本《芬兰民间谚语》。1821 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献给芬兰青年人的歌》，向广大芬兰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科伦德 1919 年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期间就计划创办一种文化报，但是 1920 年《土尔库周报》的出版，使他改变了主意，打算出版一本包罗万象而内容丰富多彩的书。他为此全力以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 1831 年出版了首卷本的《芬兰趣谈》（1832 年出版第二卷，1834 年出版第三卷），内容主要介绍国家、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学。由于当时芬兰语言尚处发展阶段，还不够丰富，所以书中存在着一些语句上的毛病。但总的说来这是一部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是一部爱国主义

的教科书，全书字里行间充满了热爱祖国的激情。全书是以诗歌的语言写成的，富有韵律，同样是一部完整的艺术珍品。

科伦德于 1839 年开始任赫尔辛基大学文学与语言教师，后晋升为教授。他在大学任教期间仍热衷于文学创作和文化事业。1840 年为纪念 200 周年校庆他出版了诗集《诗神》。科伦德全凭想象，虚构成篇，全书充满了神话色彩。他在该诗集的前言中说明此举是为了创作一种芬兰神话诗歌。在该书中，科伦德注重语言的锤炼，韵律的运用，故事的布局和安排，人物的形象塑造。它完全是一件艺术品，其内容则显得苍白无力。 1846 年他创办了文化报《芬兰人》,教育对象是知识青年。该报主要刊登一些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等，也发表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因为报纸的内容多是针砭时弊，几经当局查禁，所以次年文化报改名为《芬兰》发行。

诗人科伦德晚年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一生始终在芬兰文学艺术领域拓荒辟地，耕耘播种，与尤太尼一样致力于芬兰语的文学创作事业，以促进芬兰民族的觉醒。创业是艰难的，但是他们师徒两人不畏艰险，迎头而上，这种创业精神是可敬可贺的。

农民诗歌

农民诗歌产生于 17 世纪瑞典统治时期，但是真正繁荣时期始于 19 世纪初。这时农民诗人才受到社会的重视，其创作的诗歌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芬兰著名民间诗人伦洛特曾经搜集和出版过农民诗歌，在他创办的《蜜蜂》报上刊登过 34 首农民诗歌。特别是一个名叫克洛德费尔特的芬兰人于 1889 年出版了一本介绍农民诗人的书《十八位农民诗人》，集中反映了农民诗人及其诗歌的概况。芬兰农民诗人一般都是自学成才的男女青年，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其诗歌题材来源于个人的耳闻目睹。有的歌颂英雄人物，有的讽刺权贵的丑态，更多的是阐述发展芬兰语的重要意义。

特别引人入胜的诗歌题材是咖啡、烟和酒。诗人对此有的赞赏，有的谴责，诙谐幽默，颇受读者欢迎。总的说来，与古代民间诗歌相比，农民诗歌略显逊色。其内容较单薄，艺术较粗糙，留传至今的作品凤毛麟角。最著名的农民诗人是帕沃·科尔赫宁。

伦洛特 1848 年出版了他的诗集。科尔赫宁是以发表揶揄地方警官不法行为的诗歌而步入芬兰诗坛的。他的诗歌尖刻、精练、机智、幽默，往往出奇制胜，令读者拍案叫绝。诗歌内容较为充实，题材范围也较为广泛。如《歌颂芬兰语言》、《给农民》、《今昔》、《献给芬兰文学协会的诗》、《战争》、《土尔库学院的大火》、《黑人》、《死亡》、《婚歌》、《酒歌》等。诗歌语言朴实、流畅，为广大农民所喜爱，有的诗歌至今仍具有感召力。

农民诗歌在芬兰文学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它回响着一个阶级的声音，代表着一个阶级的世界观，反映了一个阶级的审美情趣，为芬兰文学艺术增添了新的色彩。

第三节　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

1822 年秋天，当青年进步诗人阿尔维德逊被土尔库学院除名才几个月，其后继者鲁内贝格、斯奈尔曼和伦洛特一周之内先后踏入这所高等学府的大门。后来这 3 位青年学生形成了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的中坚力量，并且发展成为芬兰 19 世纪文学艺术领域的中流砥柱。他们为 20 世纪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J. 鲁内贝格

约翰·鲁内贝格（1804—1877）是著名瑞典语爱国诗人。他出生在皮耶塔尔萨里一个穷苦的海员家庭。他先后在奥卢和瓦萨读完小学和中学，1822 年秋考入土尔库学院学习。在大学期间，为

了解决膳食问题他不得不兼任乡村家庭教师两年，这对青年诗人的成长非常有利。他熟谙了乡间的风土人情，领略了乡间充满诗情画意的大自然风光，特别是乡间居民所具有的刚毅、粗犷、勇敢、豪爽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形成他诗歌创作的源泉。他大学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并留在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罗马文学，同时兼任中学教师和报纸编辑。鲁内贝格和他的妻子——女作家丝洛姆都热衷于社交生活，他们的家庭经常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文人志士活动的场所，形成名噪一时的文艺沙龙——“星期六晚会”，它是赫尔辛基浪漫主义的一个主要发源地。后来由于来自当局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鲁内贝格于1837年移居到波尔沃城任中学校长，20年后专职从事诗歌创作。1863年他因狩猎致残，长期卧床，直至去世。

鲁内贝格1830年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这一年他的第一部《抒情诗选》问世。他在这部诗集中采用民间诗歌的格调，以充满激情的笔触细心描绘了祖国大自然风貌。诗人触景生情，尽情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眷恋。诗歌感情浓烈，富有田园风味。他的第二部《抒情诗选》发表于1834年，其中绝大部分是爱情诗篇。诗人以不同的艺术手法，勾勒出迥然不同的爱情之花：有初恋时的含情脉脉，也有少女的春心萌动，有爱情的追逐和欢乐，也有爱情的苦闷和波折。这些诗篇语言朴实，感情真挚，短小精悍，耐人寻味。他的第三部《抒情诗选》产生于1843年。这部诗集与前两部不同，缺乏生活气息，富有传奇色彩。其中有一部分是诗人的翻译诗歌。在这部诗集中有一首题为《教堂》的诗反映出诗人泛神论的宗教观。其内容是，有一老者不喜欢乘车前去教堂，而想乘船前往。途中因大雾迷失了方向，孤身一人登上了一个小岛。老者突然发现岛上阳光普照，鸟语花香，呈现出一派大好春光，于是他认为这就是上帝生存的地方。鲁内贝格作为一个抒情诗人受前辈诗人弗朗兹的影响很深，同时得益于瑞典浪漫派诗歌的精髓。

国内民间诗歌的格调在他的抒情诗歌创作中也经常被采用。

鲁内贝格是叙事诗歌的创作能手。叙事诗是他一生诗歌创作中的精华部分。其著名叙事诗篇有《麋猎者》（1832）、《哈娜》（1836）、《圣诞节的夜晚》（1841）、《娜达莎》（1841）、《弗亚拉尔国王》（1844）和《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Ⅰ.1848，Ⅱ.1860）。《麋猎者》叙述猎人玛蒂与大庄园主的女佣人海娜爱恋的故事。诗人怀着真挚的感情为劳动人民的爱情唱出了一曲激动人心的赞歌，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居住在海麦北部地区人民生活的全貌，颇具现实主义色彩。《哈娜》是一部青春之歌。诗人成功地塑造了少女哈娜的艺术形象。仲夏节的夜晚，乡间牧师的女儿哈娜在家中邂逅了从大学来这里度假的表兄，春心萌动，一见钟情，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于是两个年轻人整日在美丽的乡间田野互相追逐嘻闹，陶醉在初恋的甜蜜之中。诗人以乡村大自然风光为背景，烘托出年轻恋人的纯真美好的感情。这首诗也表达出诗人自己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圣诞节之夜》是一首英雄的赞歌。它描述圣诞节的晚上，庄园主一家人怀着不安的心情期待儿子从前线归来。这位年轻的军官真的回来了，同时带来了战友——老英雄皮斯托尔之子在前线阵亡的不幸消息。皮斯托尔当年在战场上因伤致残，现居住在花园内的一间小屋里。当他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后非常镇静，脸上露出一种坚毅的神情。诗人从老英雄皮斯托尔身上，反映出芬兰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和大义凛然的气节。诗人在上述三部叙事诗中采用六步韵诗句的形式，从不同的阶级层次，突出了主题，也客观地展现出当时农村阶级社会的全貌。《娜达莎》是一部浪漫色彩较浓的传奇叙事诗篇，取材于俄国童话。它讲的是两个王子同时爱着一个侍女的故事。讽刺和挖苦了俄国沙皇内幕的丑恶行径。诗歌幽默、尖刻、动人心弦。《弗亚拉尔国王》叙述年老的国王弗亚拉尔打算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的王国。他蔑视上帝，声称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一大业。因

此遭到上帝的惩罚，致使他的儿女相互残杀而死。国王通过血的教训终于认识到上帝比自己更伟大。诗人在这首诗里，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采用象征艺术手法，借古喻今，寓意相当深刻，说明谁要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则一事无成。

叙事诗《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标志着鲁内贝格的诗歌创作已进入到完全崭新的阶段。全诗分上下两册，充分展现出1808—1809年瑞俄战争期间芬兰人民的光辉业绩。上册发表于欧洲爆发大革命的1848年，从而提高了鲁内贝格作为一个爱国诗人的地位。诗人在这长篇诗歌中塑造了一群既平凡又伟大的军人形象和平民形象。他们有的是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员，有的是普通的列兵，有的是肩荷辎重的民工，有的是家庭妇女和儿童。在祖国大难当头之际，为了捍卫祖国的独立和尊严，他们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诗人饱含着爱国激情，高度赞扬了芬兰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忘我牺牲的革命情操。这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时至今日它仍鼓舞着芬兰人民胜利前进。

鲁内贝格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抒情歌手，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叙事能手。他创作的诗歌堪称芬兰瑞典语诗歌的典范，是欧洲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富有现实主义色彩。诗歌的语言和格调具有民间诗歌的风味。鲁内贝格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诗歌往往描绘出一个理想的世界。他认为世界和人类应该是十全十美的，这也暴露出诗人的偏颇之处。尽管如此，鲁内贝格是芬兰诗歌界的先驱和导师，他的燃烧着爱国热情的光辉诗篇是芬兰诗坛永放异彩的瑰宝，永远成为芬兰人民前进的动力。芬兰人民为了对他永世不忘，把他的诞辰日——2月5日定为芬兰“诗人节”。

1820年以青年诗人阿尔维德逊为首发动的第一次民族觉醒运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因而很快被政府当局镇压下去。从此，芬兰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政府当局这一粗暴行径却受到芬

兰政界和知识界高层人士的喝彩，因为他们对芬兰民族及其文化发展向来持蔑视态度。瑞典语仍像以前那样在芬兰居于统治地位。由于当时适逢欧洲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政府当局对此惊恐万分，进一步对芬兰人民进行控制，限制他们的出版言论自由，1829年政府颁布实施的《出版检查法》就是极好的证明。此法的制定使芬兰文版的报刊和书籍出版中断了好几年。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芬兰人民要求自由独立的革命意志是摧不垮的。当时有些爱国人士仍然著书立说，伸张正义，艰难地从事着促进民族觉醒的工作。在这些爱国的人士当中，斯奈尔曼的名字当属首位。

J.斯奈尔曼

约翰·斯奈尔曼（1806—1881）是芬兰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他出生于瑞典首府斯德哥尔摩一个芬兰族船长家庭。1813年随其父母移居到芬兰的科科拉地区。1822年入土尔库学院哲学系学习，1835年任该院哲学系讲师，1837—1838年因他在教学中提倡学术自由与学院当局发生矛盾从而被迫离校。1839—1842年，他先后去瑞典、丹麦和德国进行考察。在国外3年考察期间，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同时找到了差距。他对芬兰社会现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1840年他从瑞典致国内一友人的长信中写道：绝大多数芬兰人民处在愚昧状态，瑞典知识界人士从不关心他们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芬兰民族实际上被置于坟墓之中”。后来他在庆祝赫尔辛基大学创建200周年时又指出“你们的庆贺只能说是在坟墓中手舞足蹈，于国家无任何利益可言。”他认为在这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处在危机的时刻，要以实际行动来唤起民族的觉醒，从而振兴祖国，使之走上康庄大道。

斯奈尔曼一生实现了这一诺言。他为了唤起民众的觉醒，身处逆境，置自己生死于不顾，于1839年主办《斑蝥》报刊，1844年创办周报《农民之友》和《萨依玛》，1847年主编《大众文艺

报》，1855 年出版《文艺报》。这些报刊政治色彩较强，他在其中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由他亲自撰写的报刊评论，观点明确，措词激烈，针砭时弊，不留情面，因而其报刊屡遭当局查封。他竭力主张芬兰语言应该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语言，芬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在人民精神生活领域，文学当属首位，所以他在报刊上大声疾呼发展芬兰民族的文学艺术事业。他指出，所谓民族文学首先应当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创作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能够促进本民族觉醒的文学。他强烈谴责政府当局和瑞典族的知识阶层不关心芬兰民族痛痒的恶劣行径。同时严厉批评了芬兰一些新闻报刊对芬兰民众所表现的爱国举动置若罔闻、不予支持的错误态度。此外，斯奈尔曼在报刊上还撰写了旨在改善芬兰教育状况、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改革土地所有制、发展国民经济、加速工业生产和消灭社会贫困现象等一系列促进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文章。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登基之后对芬兰采取了明智政策，斯奈尔曼获得了更大的活动自由。他于 1856 年被晋升为大学教授，1863 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在他的直接干预下，国会于同年通过了《国家语言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认芬兰语成为国家正式通用语言，与瑞典语处于平等的地位。从此废除了 1850 年制定的《语言法》①。这为发展芬兰民族的文学艺术事业开了绿灯，其意义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斯奈尔曼作为一名政治家，他为促进芬兰民族的觉醒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就是当 1868 年因年迈辞去议员职务之后，他仍然关心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他的心目中只有祖国和人民。斯奈尔曼作为一名哲学家，以 3 部宏伟的著作《伦理学》、《法律学》和《国家学》奠定了其在芬兰理论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哲学思想基础

①原《语言法》规定，芬兰语只能用于印刷有关宗教和经济内容的文章。

来源于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其核心是无论强大的或弱小的民族，都要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安排生活和建设事业。斯奈尔曼作为一名作家，在 1830—1840 年之间发表过 4 部长篇小说，内容都是关于婚姻道德方面的问题。1844—1846 年在《萨依玛》报刊上发表了 10 部中短篇小说，内容冲击了家庭范围，表现出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情感。他是芬兰第一个以 1808—1809 年芬兰战争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其作品富有现实主义色彩。但总的说来，他创作的小说在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较小。斯奈尔曼一生首先是一位勇猛的斗士，是一位冷静机智、讲究策略的斗士，是一位战果辉煌的斗士。芬兰人民为了表彰他的不朽功绩，把他的诞辰 5 月 12 日定为"斯奈尔曼日"。

E. 伦洛特与《卡勒瓦拉》

埃利亚斯·伦洛特(1802—1884)是芬兰 19 世纪文学中的佼佼者，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编纂者，芬兰文学语言的革新家。他是继阿格里科拉之后对芬兰文学贡献最大的学者。他本人也是致力于芬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乌西玛省西部萨玛地区一个贫穷的乡村裁缝家庭。他家的庭院坐落在绿荫环抱的小湖岸边，诗人自幼受着这美丽自然风光的陶冶，赋予他一种特殊的灵感。他聪敏过人，喜欢读书，但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后来他到海麦林纳一家药店当学徒工，并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攫取知识，终于 1822 年秋考入土尔库学院。他在该院深得药物学教授托格伦的关怀，任其家庭教师多年。1832 年他大学毕业取得药物学博士学位，同年被任命为卡亚尼地区的医务总管。但是伦洛特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特别是在大学期间，对前人尤太尼的诗歌和托佩利乌斯的论文更是爱不释手。再加上当时风行的浪漫主义潮流使他很快就转移了视线，卷入到民间诗歌的搜集和研究方面来。他认为前人遗留下来的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应当

继承下来并留传于后代，因此他从 1828 年就开始采集民间诗歌。1833 年他编成《万奈摩宁歌集》，含有 16 首诗歌。1835 年汇成《卡勒瓦拉》上、下两集，共含 32 首诗歌。1849 年新版本的《卡勒瓦拉》得以出版，这是最完善的版本，其中包括 50 首诗歌，共 22795 行。芬兰民族史诗的出版是伦洛特一生中的最大功绩，从此芬兰文学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此外，他于 1840 年编选了抒情诗集《康泰莱女歌手》,内有 650 首抒情诗歌，其内容主要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的生活和对时世艰难的感叹之情，诗歌语言朴实无华，感情真挚，乡土气息很浓。1842 年他出版了《芬兰民间谚语》，1844 年出版了《芬兰民间谜语》，1880 年出版了《芬兰民间咒语》，同年他的语言科研成果《芬兰一瑞典语词典》也相继问世，全书 20 万字。1853 年伦洛特晋升为大学芬兰语言学教授。

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是芬兰文学中的纪念碑，对芬兰文学艺术和语言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芬兰文学和艺术的源泉。同时，它是世界文坛上的一朵奇葩，有别于欧洲的英雄史诗。就其思想内容而言，欧洲英雄史诗多是颂扬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王侯将相，而《卡勒瓦拉》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出身低微的普通劳动者。就其艺术技巧而论，欧洲英雄史诗展现的多是宏伟巨大的住所和刀光剑影的沙场，而《卡勒瓦拉》展现的多是普通人的劳动场面。这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又赋予了人物事件以幻想或神话的成分，从而表现出民间故事和民间诗歌的特有境界。此外，在《卡勒瓦拉》中还采用了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其中对偶法和渐进法是最惯用的两种。

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中心内容反映了卡勒瓦部族和波赫约拉部族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争夺能制造谷物、盐和金钱的“宝磨”，亦称“魔磨”。诗中卡勒瓦象征着光明、劳动、美丽和欢乐，而波赫约拉则象征着黑暗、邪恶、阴险和贪婪。最后是真、善、美战胜了假、丑、恶。如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一样，这

部芬兰民族史诗也反映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与世界文学史中别的民族史诗相比,《卡勒瓦拉》所反映的社会制度更为古老，是氏族制度尚待瓦解的时代。这是因为居住在北卡累利亚荒原上的古人与世界全然隔绝，长期生活在原始公社制的社会中。虽然此时在芬兰的一些地区已过渡到封建社会，《卡勒瓦拉》中的社会乃是真正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既无剥削者，也无被剥削者，没有贵族，也没有军队，奴俾十分罕见。恩格斯认为，处于蒙昧与文明之间的社会是以铁制刀枪与铁犁、铁斧并用为其特征的，而这种情况恰与《卡勒瓦拉》中所描绘的社会相符合。从这部史诗中可以感觉出当时人们对铁器和技术的向往。制造宝磨也无非说明当时人们梦想发明可以减轻重体力劳动的种种机器而已。

《卡勒瓦拉》中的人物都刻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这与童话般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人物都具有异乎寻常的能力，做的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然而与普通人一样，也受到七情六欲的驱使。人们或者把理想寄托在他们身上，或者把他们的某些所作所为当作前车之鉴。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这部史诗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倾向。民间诗人们运用史诗中惯用的手法突出了主要人物最显著的外部特征和内心特征。例如，把万奈摩宁尊为“持重的长者”，把伊尔玛利宁尊为“能工巧匠”，把勒明盖宁说成是“好高骛远的鲁莽汉”。其实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分别是工人、农民和猎手。

万奈摩宁自始至终是这部史诗中的中心人物，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并怀着特殊的感情精心塑造了他的形象。他的诞生和最初的作为被民间歌手镀上了一层神话世界的奇光异彩，但随着史诗故事情节的开展，他被赋予了愈来愈浓重的凡人形象，并且逐渐上升到部族首领的理想高度。老成持重的万奈摩宁具有多重个性，他集男子汉大丈夫的诸多特征于一身。他勤劳，样样活儿都会干，

诸如植树、伐木、耕耘、播种、打猎、捕鱼、造船、航海、治病、用桦木制琴等无不娴熟，得心应手。他干事审慎而执着。他远见卓识，谆谆善诱，他告诫青年人不可当金银财宝的俘虏。他是勇猛的斗士，且足智多谋，在逆境中从不惊慌失措。此外，他还有一颗多愁善感和善良的心，即使在他砍伐森林时也不会忘记留下一株桦树，让唱歌的鸟雀有一个栖身之所。万奈摩宁还有爱美的癖性。他是真正的艺术家，能弹拨一手好琴，唱起歌来也令人心醉神迷。最感人的乃是他的爱国情操：当他置身于北国的波赫约拉时，曾因思念故土而潸然泪下。当女霸主娄黑以财宝和盛宴为诱饵竭力挽留他时，他却推辞道：

> “木屐下踩着的清水，
> 只要在自己的故乡，
> 也比在陌生的国家，
> 金杯里的蜜酒更佳。”

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造福故乡的人民，都体现了人民对文明、对美、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富足、对仁爱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因此，整部史诗的寓意正是通过他的形象而表达出来的。

伊尔玛宁是技术高超的铁匠兼木匠。他不仅造就了上苍的穹隆，还得心应手地打制出犁铧和镰刀以及女人戴的戒指和女人的全像。他毕生的得意之作是能为人民创造财富的“宝磨”。他为人拘谨，不善言谈，缺乏万奈摩宁那样的足智多谋和创业精神，然而在工作中却能吃苦耐劳，在斗争中也很勇猛慓悍。通过伊尔玛宁的形象，人民对精湛的技艺的赞叹之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勒明盖宁是一个“鲁莽、英俊、好高骛远”的“调皮鬼”，芬兰人民生活情趣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他由于自幼受到母亲的爱，没有养成严于律己、稳重行事的习惯，然而都不乏青春的活力、冒险欲和好胜心。他行动快捷，头脑敏锐。

他能说会道，挖苦起人来唇枪舌剑，像舞刀斗剑那样厉害。他热血沸腾，在恋爱问题上难免有些轻浮。他有一点成就便喜欢自吹自擂，缺乏谦逊的品质。

史诗中对男性人物形象描绘得细致入微，面面俱到。相形之下，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刻画就显得有些单薄，略有逊色。“牙齿不全的北国丑老妖怪”娄黑在史诗中扮演了重要的反面角色。她是黑暗王国中黑心肠的女霸主，贪婪、阴险、利欲和权欲薰心。她表面一套，背地一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实乃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勒明盖宁的母亲象征着母爱的无穷力量。她对轻浮的儿子关怀备至，总是忧心忡忡地警告儿子，出门在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然而当儿子由于冒险蛮干而送了命的时候，她又不遗余力地使之复活。古代歌手通过这个女性的鲜明形象表达了人们对母亲的深挚敬意之情。

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是古代芬兰全体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结晶。它以其夸张的手法，交织着现实和想象，唱出了和平的人民的声音。诗人伦洛特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多次深入到民间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从古代留传下来的众多的口头文学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代表作品汇编成册。这部史诗的艺术和精神力量永远是鼓舞芬兰人民前进的动力。

鲁内贝克·斯奈尔曼和伦洛特在芬兰文学史的地位和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土尔库浪漫主义文学路线，形成赫尔辛基浪漫主义的核心力量。鲁内贝格的诗歌继承了弗朗兹的诗歌传统，斯奈尔曼的哲学理论完善了阿尔维德逊的民族纲领，而伦洛特则坚持了科伦德和腾斯特洛姆对芬兰民间诗歌的搜采和研究工作。这3位文学巨匠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结成密友，从不动摇和退缩，不屈不挠地为芬兰民族文学的兴起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的这一伟业后来由比他们年轻20岁的托佩利乌斯一直延续到1898年。可以这样说，上述3位文学巨匠的工作一直延至到19世

纪末，他们共同创造的精神遗产将永放光辉，为 20 世纪芬兰民族文学的勃兴开拓出一条光明大道。

S.托佩利乌斯

萨卡里 · 托佩利乌斯（1818—1898）是诗人和历史学家，出生于新卡勒比地区一个书香门第，其父老托佩利乌斯是芬兰著名民间诗歌搜集家。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840 年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荣获学士学位，曾担任《赫尔辛基报》编辑。 1854 年升为赫尔辛基大学历史学教授。 1875—1878 年被任命该大学校长。他早在大学读书期间就深受爱国诗人鲁内贝格和文艺沙龙“星期六晚会”的影响，创作出一些爱国诗歌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这标志着他文学艺术生涯的开端。

托佩乌利斯一生涉猎广泛，多才多艺。他既创作诗歌、小说、戏剧和童话，也编写历史、地理等教科书籍。但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表现在创作童话和历史小说方面。托佩乌利斯曾荣获“童话巨匠”之称，一生共创作出十几部童话集。这些童话成为 100 多年来芬兰儿童读物书库中的传世之宝，同时在北欧诸国也享有崇高的声誉，其中心内容宣扬爱国主义和社会公德。特别是他的《童话集》（1847—1852，分 4 集出版）和《献给孩子们的礼物》（1865—1896，分 8 集出版）对陶冶儿童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颇受儿童与家长们的欢迎。托佩乌利斯是芬兰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最有名的长篇历史小说《一个军医的身世》（1853—1867） 在读者中享有盛誉。它通过两个家庭几代人的经历，详细展现出俄瑞 30 年战争中的芬兰历史画卷。小说中不乏有虚构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真实历史的纪录。这是一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辉映的艺术作品，其格调深沉、冷峻，鼓动人心。此外，托佩乌利斯的诗歌创作遵循弗朗兹和鲁内贝格的抒情诗歌路线，但比前者的抒情诗歌色彩更绚丽、更明朗。

他的著名抒情诗歌集是《徐尔薇娅之歌》和《石南花》（1845—1854），其中多首描绘大自然风光的诗被谱成歌曲演唱。最有历史价值的是那些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如《再见吧，奥卢河》寄托着诗人渴望祖国解放之情，还有以非常理智的现实态度评论时代历史事件的诗歌。他的剧作多采用历史题材，但赋予浪漫主义色彩。特别是他创作的剧本《卡尔国王巡猎记》，后被作曲家帕西乌斯谱成芬兰第一部歌剧而上演。托佩利乌斯还是一位出色的新闻战士，他经常以犀利的笔锋针砭社会的弊端，其激进的立场在当时也颇为罕见。他所写的一些富有哲理文采的篇章为世人所瞩目，具有斯奈尔曼的文风。所以后人称他为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少壮派的代表人物确实不算过誉。

第四节　芬兰语文学的崛起

芬兰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一些大师们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用瑞典文创作的。鲁内贝格和托佩利乌斯一生都用瑞典文写作；斯奈尔曼尽管热衷于芬兰语的文学事业，但还是主要以瑞典文著文推动这项工作；伦洛特确是用芬兰文编写了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然而在其一生作品中仍有一部分是用瑞典文发表的。实际上，瑞典文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仍是芬兰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主要工具。只是到1863年新的《国家语言法》颁布之后，才给芬兰语言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芬兰语在政府机构、司法部门和中小学校逐渐得到应用和推广，开始渗透到各个文化生活领域。例如，1863年在尤万斯库莱成立了第一所旨在培养芬兰语中小学教员的芬兰语师范专科学校；在大学里开始用芬兰文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当然，在芬兰推广应用芬兰文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关于语言和文化教育的激烈论战。但是它最终在芬兰人民党领袖、《芬兰文学季刊》主编和历史学家于尔约·科

斯基宁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从此，现代化的芬兰文版的报纸开始印刷。同时，以帕格波姆教授为首筹建了芬兰语剧院。芬兰文版的小说、诗歌和剧本大量涌现，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与当时出版的瑞典语文学作品相比毫无逊色。这些芬兰语的文学作品仍未超出浪漫主义的范畴，其中不乏有现实主义色彩较浓的作品，但数量很少。所以有的芬兰学者称 1860—1880 年这一时期为后期浪漫主义时期。总的说来，19 世纪 60 年代在芬兰文学史上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领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芬兰新文学的开端。在这期间涌现出一批颇有才华的新文学的闯将，其中享有盛誉的有奥克萨宁、克伦和基维。

A. 奥克萨宁

奥克萨宁(1826—1889) 诗人、教授，笔名为阿尔奎斯特。他被认为是芬兰抒情诗歌艺术的真正创始人。他出生于库比奥城，是一位贫穷女工和贵族青年军官的私生子。他在赫尔辛基大学读书期间，适逢赫尔辛基浪漫主义时期大师斯奈尔曼创办的《萨依玛报》在知识界广为流传，他受其影响，积极参加了爱国主义的活动。他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他的笔名代表诗人，他的原名代表学者。

奥克萨宁作为诗人，一生创作和翻译了 100 多首诗歌，后集结为《火花》上下两卷，分别于 1860 年和 1868 年出版。他自认为创作诗歌是他的副业，“只是一种试验品”，以此来证实用芬兰文同样能够创作出古典的和新型的优秀诗篇。他创作的主要诗篇有《芬兰颂》、《战争进行曲》和《萨沃人之歌》。《芬兰颂》气宇轩昂，意境深远，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战争进行曲》气势恢宏，铿锵有力，富有斗争精神；《萨沃人之歌》则舒缓轻松、耐人寻味，饱含田园情调。诗人采用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来讴歌生育和养育他的祖国和人民，刚柔并举，浓淡相间，颇具感染力。诗

人在诗歌中多注重语言的锤炼、结构的调整、音律的运用，并好用脚韵，为芬兰诗歌语言艺术的发展开创了新路。

奥克萨宁作为学者，对芬兰语言、民间诗歌和诗歌艺术有较深的研究。他继伦洛特之后曾任芬兰语言和文学教授，后期任赫尔辛基大学校长。他曾深入到俄国西伯利亚一带，对居住在那里的芬兰族人民进行调查研究。他研究过爱沙尼亚文学，研究过芬兰文和匈牙利文之间的近亲关系。他在自己创办的《语言》杂志上发表过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他一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成绩显著。但是，他为人自负，性格高傲、偏执，“是一位好斗的园丁”。他在人生观和文学观方面与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志士不同，因而对当时涌现出来的文学新秀基维不欣赏，批评其作品粗制滥造，艺术不真实，语言不洗练，人物形象性格不鲜明等。然而就是这个基维，他的处女剧作《库勒沃》却荣获芬兰文学协会颁发的奖金。这给奥克萨宁在文学批评方面造成终生的遗憾。

总之，奥克萨宁是芬兰后期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特别崇拜爱国诗人鲁内贝格，早在中学时代就翻译过他的诗篇。所以他自己创作的诗篇也富有爱国主义激情，格调新颖，对后代影响较大。他在文学和语言研究方面也颇有见地。虽然如上所述有过较大的失误，但他为芬兰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作为一个“好争辩的和颇为自负的文学评论家”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芬兰人民的记忆中。

J. 克伦

尤利乌斯·克伦（1835—1888）抒情诗人、教授。出生在维堡，父母均系德国人。他在维堡上学期间就对芬兰语言和文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后来放弃德语的学习，专攻芬兰语言和文学，同时加入了芬兰国籍。他的家庭成员后来都成为芬兰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大儿子卡尔·克伦为著名的民俗学家，二儿子伊尔玛尔·

克伦为著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大女儿海米·克伦、二女儿阿依诺·卡拉斯和三女儿阿乌妮·克伦都是作家。

1860年是芬兰诗坛丰收的岁月。鲁内贝格长篇叙事诗《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续集和奥克萨宁诗集《火花》第一卷都在这一年问世。而克伦也在同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草莓和越橘》，从此奠定了他的诗人地位。1866年他在芬兰刚刚创办的《芬兰文学季刊》上发表了用芬兰语精心创作的诗歌集《一串珍珠》，更崭露出他作为诗人的独特才华。几乎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由作家埃洛·萨麦洛宁于1852年倡导搜集的《芬兰人民的传说和故事》。克伦一生最主要的作品是在他去世后于1897年出版的《诗选》,它标志着诗人的思想和艺术日臻成熟。克伦与奥克萨宁一样，首先是一位爱国诗人，但他创作的诗歌比奥克萨宁的诗歌具有更浓郁的情感，其表现手法也较新颖。他的诗歌主题往往是讴歌祖国秀丽的自然风貌及爱情。其诗歌还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富有幽默感，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克伦为人朴实，谦逊，在诗歌中常常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麻雀，期待着百灵鸟的到来。

奥克萨宁和克伦爱国诗歌的继承者是诗人帕沃·卡亚德(1846—1919)。他为人朴实,寡言,但创作的诗歌却热情奔放,充满浪漫气息。他的著名诗篇《献给祖国》感情充沛，通篇洋溢着火热的激情，颇具有感召力。其另外两首诗歌《诗歌吟唱者》和《自由的女王》则富有骑士诗歌风味，浪漫色彩极浓。卡亚德的一生并不主要搞创作，而主要从事诗歌和剧本的翻译工作。他是第一个把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成芬兰文的。这部包括36个剧本的翻译集锦对芬兰文学及其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还把芬兰艺术大师鲁内贝格和托佩利乌斯的诗歌从瑞典文翻译成芬兰文，这些诗歌至今仍对芬兰青年起着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

A. 基维

阿列克西斯·基维(1834—1872)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他出生在芬兰乌西玛省的努米耶维地区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乡村裁缝，沉默寡言，喜欢喝酒。母亲是家庭妇女，性情温柔，笃信宗教。基维排行第四，是家庭成员中最小的，深得父母的宠爱。他童年时代就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非凡的记忆力，父母决心把他培养成有文化的人。19 世纪上半叶瑞典语在芬兰仍居统治地位，父亲为了使基维能够上学读书，先送他到一位老海员家里学习了一个时期的瑞典语，然后才到一所民办学校就读。他在学习期间因家境贫寒曾几度辍学，然而凭他良好的天资和坚强的毅力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在 23 岁那年考进了芬兰最高学府赫尔辛基大学。他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名著，深入研究了美学和戏剧理论，同时结识了芬兰文学艺术界的名流，为以后从事文学创作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基维在中学读书时就开始用瑞典文尝试写作。他在大学读书时，正值芬兰知识界展开一场为争取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斗争，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主张广泛使用芬兰语言文字。特别是民间艺术大师伦洛特用芬兰文出版了民间史诗《卡勒瓦拉》后，这一爱国举动对基维影响很深，使他坚定了用本民族文字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他在大学期间，根据史诗《卡勒瓦拉》第 31 节至 36 节的故事编写出五幕话剧《库勒沃》。内容叙述一个名叫库勒沃的青年因与其兄不和而沦为别人家的奴仆。这家的女主人对他百般刁难，甚至在他吃的面包里搀沙子，他不堪忍受，便伺机进行报复。一天他利用放牧的机会故意引狼入室，女主人被贪婪成性的豺狼咬死。事后他感到人命关天，后果严重，遂自杀身死。库勒沃是个奋起反抗的奴仆，他虽然勇敢，但缺乏谋略，终铸成悲剧。这是芬兰的第一部悲剧，剧本结构严谨，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物

形象鲜明生动、栩栩如生。整个剧目充溢着浪漫主义情调，并富有乡土气息。这充分表露出剧作者的天赋和才华。这个剧本在芬兰文学协会于 1860 年发起的文学创作比赛中独占鳌头，荣获头等文学奖，从此基维的名字跃入芬兰文坛。

基维在 1864 年发表了他的第二部重要剧作《荒原上的鞋匠》。这是芬兰的第一部喜剧。内容叙述一个受父母严格管教的青年埃斯科心地善良，却呆板和固执。一次父亲在与邻村一位友人酗酒时给他订了亲。埃斯科遵照父母之命届时前往邻村娶亲，当他到后方知姑娘已嫁给别人。埃斯科非常尴尬，遂恼羞成怒，捣毁了姑娘家的门窗和桌椅。在回家的路上，他浑身感到轻松了许多，就如同生了双翅在高空飞翔。剧作者的旨意并非讥笑这种粗鲁的举动，而是着意强调对人对事要宽容大度，不要狭隘自私。这部剧作亦庄亦谐，寓庄于谐，给人以很深的启迪。埃斯科也以鲜明的人物形象载入芬兰古典文学艺术的画廊。

基维创作的大型悲剧《逃亡者》（1867）和《康齐奥》（1868）描写了发生在贵族家庭的悲剧。因为作者对此生活环境非常陌生，完全凭虚构和想象编织故事，因而没有取得成功。而独幕剧《订婚》（1866）和《黑夜和白天》（1866）却受到文坛的注目。《订婚》的故事情节与《荒原上的鞋匠》十分相似，但比前者更富有幽默感，艺术性更强。这个短剧经久不衰，至今仍在芬兰剧院上演。《黑夜和白天》叙述一位双目失明的少女如何得以重见光明，重新领略芬兰绚丽的大自然风光。这部短剧恰似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蕴含着饱满的爱国激情。剧本《列娅》取材于圣经故事，叙述基督耶稣时期发生在巴勒斯坦国土上的故事。这是基维创作的反映异国情调的作品。剧中具有诗人气质的耶稣、精明能干的酒店老板和俏丽的老板女儿列娅等人物形象均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剧在 1869 年春天首次演出即获得成功。这也标志着芬兰宗教戏剧的开端。基维创作的最后一个剧本《玛卡列达》（1870）

反映维堡沦陷后在人们内心深处引起的不同反响。同时可窥测到剧作者对祖国的命运表现出的极大关注。他把祖国的前途与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基维的视野开始扩大，感情得到升华，向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基维在短暂的一生中还谱写出不少优秀的诗篇，这些诗篇均收纳在诗集《石南花》（1866）中。特别是他创作的抒情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如抒情诗《摇篮》、《幸运者》、《我心中之歌》、《渴望》、《林业工人之歌》和《猎熊之歌》等至今仍为芬兰艺术宝库中的珍品。诗人在上述诗歌中抒发了对祖国瑰丽自然风貌的赞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叙事诗《牧羊姑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首非常朴实的诗篇，诗人对人物和环境描绘得淋漓尽致，充满了生活气息，同时对牧羊女表示了深厚的同情。基维继奥克萨宁和克伦之后是后期浪漫主义时期第三位优秀的诗人，他创作的诗歌别具一格，散发着浓郁的泥土的芳香。

标志着基维文学创作最大成就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七兄弟》。这既是用芬兰文写小说的创业之举，也是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之作。这部小说完成于 1870 年,但是出版 3 年后才与读者见面。究其原因是该部小说曾遭到当时著名学者奥克萨宁的批判，致使出版界对此书的文学价值产生了怀疑。后来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学专家的首肯，此书方得以发行。这说明 19 世纪 70 年代芬兰的浪漫主义势力仍很猖獗，企图把现实主义这一新生事物扼死在摇篮之中。

长篇小说《七兄弟》是芬兰文学史上第一部较为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作者基维构思这部作品花了整整 9 年时间,中间三易其稿。这部作品的素材主要来源于现实生活，作者通过虚构和想象适当地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一户农家有七个兄弟，他们的父母是忠厚老实的农民，一家人辛勤劳作，

日子仍很清苦。后来父母相继去世，田园荒芜，七兄弟的生活更是朝不保夕。种地交不起租税，读书受不起打骂，万般无奈，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到荒芜人烟的深山老林谋求生路。他们来到深山密林，但好景不长，七兄弟亲手修建的木屋，被森林大火烧成一片废墟。因此七人被迫逃出森林，一路上不断遭到猛兽的袭击，经受风雪严寒的考验。他们勇敢顽强，与熊豹豺狼斗争，与暴风雪作战。基维通过对七兄弟种种遭遇的描绘，深刻表现了芬兰农民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满。七兄弟之所以离家出走，是想逃脱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企图寻找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但是七兄弟这种消极逃遁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表现出作者现实主义立场。小说对芬兰农民热爱劳动，在艰苦环境中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生动描绘，细腻感人，颇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些描写，同对城市富贵人家那种骄奢淫逸生活的描写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小说的结尾，当七兄弟历经 10 年的艰苦奋斗重返家园后，有的当了庄园主，有的升了官，人人满意，各得其所。当然，作者这种处理方法，是对现实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有损于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矛盾的尖锐性。

在《七兄弟》这部小说中，作者对几个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约翰正直，善良，但反映迟钝；托马斯坚强，诚实；阿帕聪明，善谈，会讲故事；西迈奥尼性情怯弱，迷信宗教，酗酒；蒂莫天真，愚蠢；拉乌里善思索，爱幻想；埃洛灵敏，狡猾，语言尖刻。各个人物性格突出，特征鲜明，成为芬兰文学画廊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小说中人物语言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其中许多个性化的语言形成芬兰人民的谚语或歇后语，至今仍在流传。

基维短暂一生的创作时间不长。从 1864 年到 1871 年这七年间,他竟创作出 12 个剧本、1 部诗集和 1 部长篇小说,共 14 部文学作品。这实属难能可贵。特别是这段时间，基维的处境相当艰难，不断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和诽谤。他创作上的现实主

义倾向和坚持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爱国主义立场引起瑞典贵族统治阶级的不满，他们千方百计迫害他。芬兰文学界保守势力强大，对基维创作方法上的革新视为洪水猛兽，极力进行阻挠和攻击。这使他身心俱伤，于 1872 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然而，基维作为一个文学家在芬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显赫的，他是芬兰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是芬兰近代文学的奠定人。

其他作家和诗人

基维去世后芬兰文坛一时趋于寂静状态。虽然一些早已闻名的作家仍继续写作，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就，新成长的作家也没有什么惊天之作。他们只是写一些短小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剧本和诗歌。有的芬兰文学史家称 19 世纪 70 年代为“小幽默时期”。在该时期较为典型的作家是苏奥玛拉宁(1850—1907)。他于 1876—1885 年发表的两本《短篇小说集》给芬兰文学园地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他首次生动地描绘了小城市资本家和手工业者的生活面貌，同时反映居住在彼得堡的芬兰人的生活和命运。他的创作风格诙谐、活泼，语言丰富多彩而富有情趣。其作品可读性很强，至今仍吸引着不少读者。他同时是俄国文学的著名翻译家，他的作品深受俄国作家，特别是果戈里的影响很深。

在该时期较为典型的诗人兼剧作家是埃尔科（1849—1906)。他创作的诗歌格调明朗、欢快，富有田园风味，很多诗被作曲家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埃尔科一生共创作出十几部诗集，其中包括抒情诗和哲理诗。诗人埃尔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他创作的诗歌中往往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国家和民族。但是他的哲理诗却反映出与理想世界格格不入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理想诗人的额头上出现了思想家的皱折”。他的著名诗歌有《海洋》、《圣诞节的前夕》和《不祥鸟》等。埃尔科在他创作的剧本中突出地反映了社会问题,如剧本《占卜者》 (1887)、《阿依诺》 (1893)、《库勒

沃》（1895）、《波赫约拉婚礼》（1902）等，或以圣经故事或以《卡勒瓦拉》中的神话故事来影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占卜者》反映出作者自己的宗教观。《阿依诺》反映了妇女主题。《库勒沃》反映工人的社会悲剧及主人与奴仆之间的矛盾冲突。《波赫约拉婚礼》反映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总之，埃尔科一生的创作道路是由理想到现实的道路，特别是后期已加入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队伍中。

第五节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芬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社会因素。19世纪下半叶芬兰农村宗法制开始走向解体，整个社会结构开始向工业化方面转化，特别是芬兰的森林工业逐渐改变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实体。工业资本主义日益壮大，工人阶级队伍正在形成，劳资矛盾日趋激化，社会弊端层出不穷。这引起人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客观上也给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2)文化因素。以本民族语言培养的一代新人开始成长壮大。他们与其前辈不同，民族语言问题不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更关注的是因社会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各种新问题。传统的观念开始动摇，两代人的冲突不断出现，这在康特创作的剧本《神父之家》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国内一些爱国主义作家，如鲁内贝格的爱国诗篇、伦洛特编著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和基维的长篇小说《七兄弟》对新的一代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其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3)外来因素。达尔文的进化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教育学、约翰·密尔主张自由和解放的先进思想对芬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作用；北欧诸国，如丹麦文学评论家布朗兑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及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作品促

进了芬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成长。此外，俄国文学大师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对芬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芬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约在1884—1885年之间基本形成。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敏娜·康特和约翰·阿霍都来自文学沙龙“耶乃费尔特学校”。他们同情无产者，同情妇女，敌视贵族资产阶级和神权阶层，暴露社会弊端，在艺术上一般不采用历史题材，运用白描的方式而不是抒情的方式来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以小见大，以面概全。他们不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喜欢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但是借鉴了其中心理描写的某些技巧。一般而论，芬兰批判现实主义是封建制度濒临灭亡、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形成过程的文学艺术形式。它斥责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生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在芬兰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他们对劳动人民往往限于怜悯同情，对社会罪恶的揭露，也往往通过伦理道德的途径来进行说教，很少触及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更不能给社会指出真正的光明之路。

M.康特

敏娜·康特(1844—1897)是19世纪芬兰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和小说家。她出生于芬兰中部坦佩累城的一个职员家庭，父亲为一家纺织厂的总监，后随其父母迁到库奥皮欧城定居。她于瑞典语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于伐屈拉城师范学校攻读文学。这所学校专门用民族语言培养教师。她在该校学习期间迫于父命与教员康特完婚，从此中途辍学。但是她一直坚持自学和写作，经常在其丈夫主编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敏娜·康特自幼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目睹了他们的生活遭遇，同情他们的处境，由此引起她的创作欲望。她一生写过很多剧本和小说，其中大多数是反映

劳动人民生活的。即使因丈夫过早去世，留下七个孩子，处在生活重压之下的敏娜·康特，仍支撑着瘦弱多病的身躯，向罪恶的社会发出了声声呐喊。她的第一部引人注目的剧本《盗窃》就是在这种贫病交加的艰苦条件下创作的。

剧本《盗窃》（1882 年）取材于农村生活。它以农庄主的儿子尼洛与佃农的女儿海琳娜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深刻鞭挞了当时在芬兰农村残存的封建门第观念和迷信及酗酒的恶习，为忠贞不渝的爱情唱了一曲赞歌。剧情大意是：尼洛断然拒绝与另一位农庄主的女儿洛维莎成亲，因为这婚姻是双方家长包办的。他仍热恋着童年的好友、佃农安提的女儿海琳娜，因而引起双方家长的反对和阻挠，也引起洛维莎的妒嫉。他们以一桶黑麦为报酬，收买了整日装神扮鬼、不务正业的培拉图来离间尼洛和海琳娜。一天深夜，海琳娜父亲外出饮酒，培拉图趁机窜入他的房间偷走了海琳娜的围巾（围巾本是包扎安提伤口用的），把围巾故意丢在尼洛父亲波托拉屋内，并从屋内偷走 500 芬兰马克，以制造偷盗事件栽赃陷害海琳娜。海琳娜终于以所谓偷盗罪被捕入狱。培拉图为消除隐患，把 500 马克埋在松林里一块大石头下，他这一举动正好被正在松林采集蘑菇的单身汉赫普拉宁发现，于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出这场盗窃案的真相。海琳娜因无辜而获释，重与尼洛和好，培拉图受到法律制裁。这是一部五幕话剧，结构严谨，构思新颖，剧情由浅入深，步步推进。剧中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刻画逼真，性格突出。如海琳娜的忠贞、善良；尼洛的勇敢、坚定；洛维莎的狭隘、妒嫉；波托拉的顽固、虚荣；安提的老实、愚昧；赫普拉宁的机智、诙谐及培拉图的贪财、狡诈等都栩栩如生。人物对话机智、幽默、生动、流畅，富有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这个剧本创作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发表与上演于 80 年代初。该剧本的发表和上演获得了一致好评，认为是敏娜·康特切中时弊的力作。剧作者突破了当时芬兰舞台仅仅供消遣娱乐的旧框框，而使

之成为教育人民的阵地。她的这一努力，为芬兰戏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19 世纪下半叶的芬兰,伴随着工业特别是森林工业、航海、造船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得到繁荣，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完善和巩固。城市中工厂和机器的大量出现，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劳资矛盾日趋激化；农村中涌现出大量雇农、佃农和农业工人。社会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愈益严重。面对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深受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影响的敏娜·康特，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奋笔疾书，向罪恶的社会开始挑战。她在这段时间创作出不少反映穷苦人生活和妇女问题的优秀文学作品。小说《穷人》（1886）通过贺帕宁一家的生活遭遇：孩子患病无钱医治，只能等死；妻子因孩子之死而患了精神病，最后也一命归天，深刻揭露了穷苦人被社会吞噬的残酷现实。小说《女贩洛鲍》（1889）的主人公洛鲍是一个穷苦的女人，其貌不扬，但心地善良，专为人们办好事。就是这样一个纯洁的女性却遭到上流社会贵夫人的冷嘲热讽，甚至骂她是“下贱的女人”。社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几次把她关进牢笼。小说作者对洛鲍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强烈控诉了好人得不到好报的黑暗社会。剧本《苦命的孩子们》（1888）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上“到处是富人压迫穷人”这样一个事实，触及了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的实质问题。难怪该剧在芬兰国家剧院首次上演就遇到麻烦，当局责令禁止继续演出。小说《哈娜》（1886）叙述哈娜是一位聪明俊秀的少女，她富有理想，好学上进，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家庭和社会成为她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致使她美好的愿望，如同五彩缤纷的肥皂泡一个个地破灭了。作者通过哈娜的不幸命运向社会大声疾呼：要改善妇女的地位，给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剧本《工人之妻》（1885）则描述了工人里斯托酗酒成性，因此倾家荡产，甚至连妻子的财产也挥霍殆尽，致使其妻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同时里斯托

还奸污另一位女性。里斯托的这种粗暴行径却无人敢于问津，得到法律上的保护。作者通过被玷污女性赫姆桑图之口义正词严地指出：“你们的法律和权利，哈，哈，我枪毙了它们。”从而对当局推行的无视妇女正当权益的法律条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总之，在这段时间，由于敏娜·康特对芬兰社会现状的观察敏锐深刻，思路开阔灵活，观点明确，分析中肯，所以创作出一系列饱含战斗激情的好作品，把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家庭、道德法律和教育等问题大胆而真实地披露出来。她无视敌人的谩骂、阻挠和围攻，也不顾某些人的冷嘲热讽，因此后人尊她为19世纪的‘女英雄”。

敏娜·康特晚年的三部剧作颇受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特别是托尔斯泰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思想在她晚年的剧作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剧本《牧师之家》（1891）通过神父一家两代人的矛盾冲突浓缩了19世纪80年代芬兰社会上存在的保守与先进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牧师瓦塔里是一个顽固与保守的典型人物，他为了创办一种宣传宗教迷信、愚弄人民的报刊《朝霞》，让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尤西任其助手，并因资金缺乏突然中断长女哈娜的大学学习，甚至阻拦次女梅尤去报考演员的职业。尤西、哈娜和梅尤代表着正在觉醒的进步力量，与瓦塔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尤西拒不接受父亲的建议，甚至不惜中断父子关系，走到他所向往的《青年芬兰》编辑部工作，与《朝霞》报相抗衡，向人民宣传自由独立的思想，揭露宗教迷信是麻醉人民思想的毒剂。这部四幕话剧充分显示出剧作者敏娜·康特对社会生活高度概括的能力和娴熟的写作技巧，人物对话充满哲理，耐人寻味。但是该剧的结尾，父子之情竟占了上风，以相互握手言欢而告终。这一结局削弱了剧本的批判力量。剧作《瑟尔薇》（1893）叙述年轻的姑娘瑟尔薇迫于家规嫁给年龄大出她一倍的法律公证人阿克塞，但她仍一往情深地热恋着

童年的挚友维克托。她知道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当时的法规，然而与阿克塞离婚不成，又陷入维克托的情网中不能自拔，她感到非常痛苦，出于无奈竟毒死了丈夫。瑟尔薇希望与维克托远走高飞，共同过幸福的生活。但是社会布满了罗网，她无法逃脱，终于被捕入狱。瑟尔薇不屈从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旧俗，追求幸福的生活，她毒死丈夫实际是向当时社会中的虚伪道德和法规提出了挑战。她最后终因势单力薄而被社会吞噬。作者对该剧的构思及表现手法大胆泼辣，寓意相当深刻。这个剧本最初是用瑞典文写的，当时在瑞典语剧院上演获得很大成功。剧本《安娜丽莎》（1895）是敏娜·康特的最后一部作品。内容叙述农庄主的女儿安娜丽莎15岁时爱上了雇工米科并与其生一私生子，随即扼死了他。几年后她要与出身高贵的青年约翰结婚，但米科及其母亲极力阻挠此事，并扬言揭露过去的隐私。安娜丽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在结婚的盛宴上对来宾承认自己扼死了私生子的犯罪事实，并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剧作者以高超的写作技巧塑造了安娜丽莎这位少女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这是一部三幕话剧，全剧自始至终以女主人公为轴心，剧中所有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都是围绕着她产生的。剧情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作者善用倒叙、埋设伏笔和悬念的手法，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剧中女主人公安娜丽莎是一位美丽、聪慧、勤劳和善良的女性，在家庭里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深受父母的宠爱；在教会学校里她机敏好学，对牧师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博得牧师的赞扬；在社会上她贤淑端庄，干事麻利，受到众人的青睐。但是她因少年时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铸成大错，后受到法律的制裁。剧作者透过安娜丽莎这一所谓犯罪事实，向人们展现出一幅芬兰农村色彩昏暗的画面：顽固的家长统治，封建的门弟观念，强大的宗教势力，虚伪的道德和法律，落后的社会风俗。安娜丽莎作为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面对这股强大的黑暗势力，束

手无策，只能成为牺牲品。但是剧作者在该剧中宣扬了宗教上的忏悔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也暴露出其世界观的局限性。

总的说来，敏娜·康特一生坚持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作品（1879—1883），具有较浓的浪漫主义色彩，注重自然景物的描绘和理想世界的追求，虽然暴露一些社会弊端，但不深刻。第二期作品（1884—1890）大胆揭露和深刻批判社会弊病，对劳苦大众和妇女处境寄予满腔同情，但艺术上显得粗糙。第三期作品（1891—1895）注意人物的心理描绘，艺术性较强，但思想性相对说来显得较弱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敏娜·康特的戏剧成就在芬兰文学艺术领域占有突出的地位，她作为一位剧作家，是一代人的突出天才。她把芬兰的社会问题搬上舞台，当时在芬兰是个创举。她把芬兰的工人形象搬上舞台，当时在北欧实属罕见。她不愧是一位芬兰现实主义戏剧文学的奠基人。

J. 阿霍

约翰·阿霍（1861—1921）小说家。他出生在拉宾拉赫蒂地区一个牧师家庭，后随其父母迁居里萨尔米。故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在他幼小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起初在库比奥城11年制芬兰语学校读书，在那里他熟读了国内著名作家伦洛特、鲁内贝格及基维的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1880年阿霍考入赫尔辛基大学，在学习期间他涉猎广泛，一些国外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开了他的眼界，增加了他的智慧，激发了他从事文学创作事业的强烈欲望。他于1883年发表了处女作《当父亲买灯的时候》。小说反映随着19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芬兰社会及居民生活带来的可喜的变化。内容充实，文笔清新、流畅，引起读者的注目。1884年发表的小说《铁路》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玛蒂和丽莎这两个人物形象。

这一对年迈夫妇生活在边远山区，听说要在山区修建铁路后感到惊奇，并产生了坐火车的愿望。铁路使地处偏僻的人们走向新的世界。作者客观地展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及由此导致这两个地区人们心理状态的差异。小说格调新颖，语言生动活泼，且富幽默感，博得文学界的一致好评。

19 世纪 80 年代芬兰社会要求妇女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作家阿霍顺应了这一形势，在不到 10 年时间，创作出反映妇女问题的两部长篇小说《牧师的女儿》（1885）和《牧师的夫人》（1893）,这是姐妹篇。《牧师的女儿》叙述在中产阶级家庭环境生活的少女爱丽富有理想，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希望将来与好友克里木生活在一起。但是她禀性懦弱，难以摆脱周围环境的制约，屈从于旧风俗的压力，最后嫁给一个牧师的助手为妻。《牧师的夫人》则描述爱丽在结婚几年之后在一偶然机会与少年好友克里木相遇，旧情复萌。这时的克里木已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爱丽对他既爱慕又羡慕，内心焦灼不已。两部作品格调低沉，充满着压抑感。作者对爱丽的心理活动和自然环境的描绘细致入微，情景交融，相得益彰。他不像作家敏娜·康特那样大胆泼辣，直抒胸臆，而是冷静沉着，娓娓道来，富有创作艺术上的含蓄美。《牧师的夫人》是作者在 1889—1890 年访问法国之后的新作。不难看出，他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在该作品中有时过于注重细节的描写，或多或少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然而上述两部长篇小说都具有斯堪的那维亚现实主义特色，当时在芬兰国内以及整个北欧地区都受到重视，深得广大读者的欢迎。

19 世纪 90 年代，芬兰文坛上的气候发生变化，人们对描写严酷现实生活的作品有些厌烦，对充满幻觉的作品产生好感。阿霍为了迎合读者的欣赏口味在文风上有所改变。他于 1897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巴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部作品描写 17 世纪异教和基督教展开决战的故事，最后异教徒巴努在决战中遭到惨败。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刻画出众多的具有非凡才能和力量的人物形象，并运用了大量的咒语和魔法。这标志着作家阿霍的创作文风由现实主义向新浪漫主义的转化。此外，为了纪念芬兰民族诗人斯奈尔曼诞辰 100 周年,阿霍于 1906 年发表了两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冬末和初春》。这部作品反映 1840—1850 年间芬兰民族觉醒的历史，特别描绘出这段历史中杰出的人物斯奈尔曼和伦洛特的丰功伟绩，以启迪后人。作为历史小说， 这部作品是芬兰文学画廊中的佼佼者，并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作家阿霍叙述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当属《尤哈》（1911）。它是作者长时期酝酿和艺术加工的成果。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芬兰与俄国交界的东卡累利亚未开化地区。作品中女主人公玛丽娅是自然的女儿，容貌出众，体态匀称，并且感情丰富，具有异乎寻常的诱惑力，以致使得两个男子成为她爱情的牺牲品。玛丽娅的丈夫尤哈是朴实的垦荒能手。他身强力壮，老实厚道，但是性情懦弱，缺乏自信。当他得知自己的妻子遭到别人蹂躏后，认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已化为泡影，失去了精神生活的支柱，以致投河自尽。而蹂躏尤哈妻子玛丽娅的男人塞梅卡性情凶狠，流氓成性，是作者夸大了的人物形象，颇具传奇色彩。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作品，故事情节戏剧性强，矛盾冲突时起时伏，跌宕有致，富有艺术感染力。小说中的语言具有地方色彩，简洁、含蓄、耐人寻味。阿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良心》（1914）反映了渔民的生活。作者对居住在海岛上渔民生活的描绘相当成功，对渔民形象的刻画维妙维肖，非常逼真。这充分显示出作家生活和艺术功底的深厚。

在阿霍写作生涯中还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散文。这是一类特殊性质的产品，也是很有价值的文学读物。从 1891—1922 年他一共出版了 8 本《散文集》,受到读者的好评。这些散文的特点是,作者自己的想象和观感多于记实和叙事。作者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写

作手法，但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其中多含轻松、幽默气氛，也不乏有格调低沉、悲观的消极之作。散文的题材相当广泛：有抒写大自然风光的,如《森林之路》、《岛屿》、《丘陵》、《沼泽》、《静静的湖泊》等;有描写动物的,如《兔子的遭遇》、《小动物》等；有刻画人物形象的，如《厨娘》、《新居民》、《年老的港务长》等；有儿童素描肖像，如《小丽莎》、《拉鲁》等。这些散文如同一面面闪光的镜子，折射出生活中五光十色的景象，也映现出作者自己在不同时期对人和事所持的审美理想。读者从中可以窥探到作家的文学历程。

作家阿霍是芬兰第一位靠写作谋生的专业作家，也是芬兰19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中心人物。他主编过具有重大影响的《日报》，而当时的所谓“青年芬兰作家”都集聚在该报周围。阿霍对芬兰现实主义文学和新浪漫主义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善于在芬兰文学思潮变化时审时度势，总是给广大读者提供大量的适合他们口味的精神食粮。他虽然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然而社会问题并非是他创作的非常重要的题材。他不是一位向旧社会呐喊的战斗者，而是一位沉静的思索家和描写家。他在写作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善于写景，是芬兰文学中写景的能手。二是富有幽默感。幽默是阿霍作品的一大特色。他经常把严肃的问题隐藏在诙谐、幽默中展现，使读者在开怀大笑之后引起深思。他那清新秀丽的文笔，对芬兰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T.帕卡拉

泰沃·帕卡拉（1862—1925）小说家。他出生在奥卢城一个金匠家庭。因家境贫寒，他完全靠勤工俭学读完中学和大学，一生先后当过店员、教员和出版社编辑。他从小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所以对他们的艰苦生活有较深的了解。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往往是工人、手工业者、海员、妇女和儿童。帕卡拉是一位温

和的现实主义者，他所描绘的穷苦人是孤独、笃信宗教、顺从天命、对罪恶的社会无力进行抗争的弱者。作者对他们的悲惨处境深表同情。帕卡拉一生共创作了 5 部长篇小说、多部短篇小说和 3 个剧本。特别是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给芬兰文坛增添了光彩。

长篇小说《瓦拉》（1892 ）叙述居住在瓦拉城一角的贫穷人民的生活状况。帕卡拉以近乎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精心刻画了一群居民形象，反映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社会上层阶级的态度。小说中没有真正的主人公，作者塑造了 50 多个人物形象，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是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作者对他们及其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描绘既符合历史变迁的轨迹，也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同样是一幅历史画卷。这部小说结构显得松散，但是生活气息相当浓厚，可以说是一部严谨的写实文学作品。继《瓦拉》发表之后,帕卡拉于 1894 年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艾尔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瓦拉》中儿童群像图中优秀的小女孩艾尔萨。她已成长为一个性情温柔、容貌出众的少女。她由于出身微贱，命运多舛，终于沦为富家纨袴子弟的玩物。成为社会的牺牲品。作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强权者的无比憎恨，对弱者艾尔萨则寄予无限的同情。作家帕卡拉洞察了社会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高瞻远瞩，立意深远地揭露出造成少女艾尔萨悲剧的根源首先是社会上存在着阶级矛盾。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传》（1903）描述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姑娘卡尔姆成长的故事。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对艺术有新的追求，采用了类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方法，突出了对卡尔姆精神和心理方面的描绘，这在当时的芬兰文学艺术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姑娘卡尔姆与其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她心灵中铸下了伤痕，以致影响她在整个一生中与其他男性的关系。

帕卡拉在儿童文学园地里撒下了辛勤的汗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较为出色的作品是《孩子们》 （1895 ）和《小人国》

（1913）。他的儿童文学作品继承了芬兰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有的取材于古老的民间故事，有的引用了民间歌谣和传说，具有朴素、清新的格调，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通俗流畅的语言。其中一些作品借古喻今，对儿童进行了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一些作品具体地描绘了穷苦人家的悲惨生活，使儿童能够了解社会的真实面目；一些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富有幻想，启迪儿童的想象力；还有一些作品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以增加儿童的智慧。当然，在帕卡拉的儿童作品中也有的作品宣扬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注重道德上的说教。帕卡拉认为，儿童是人类世界的未来，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气质决定着他们的成长和前途，从而也影响到世界未来的命运。所以他注意了解儿童的心理，做他们的知心朋友，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以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此外，帕卡拉在其写作生涯中还创作了三个剧本。其中最先发表的歌剧《在木排河道上》（1896）被誉为上品，它反映日常生活中善与恶的斗争，最后正义取得了胜利，恶的势力遭到了鞭挞。剧情活泼、生动、诙谐、幽默，深得观众赞扬。该剧当时成为芬兰剧院经常上演的剧目，后被搬上芬兰银幕。

总之，与作家阿霍相比，帕卡拉的作品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均显逊色，但是他在描写芬兰奥卢地区的人和事方面却有独到之处。在反映该地区劳动人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全部作品是奥卢地区的缩影，映照出那里的风土人情及历史演变过程。帕卡拉在探索儿童和少女心理活动方面是独具慧眼的，以他那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纤细的笔触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逼真的儿童和少女的形象，这些形象在芬兰文学中永远闪烁着光彩。

A. 耶尔内费尔特

阿尔维德·耶尔内费尔特（1861—1932）小说家。他出生在俄国，父亲当过沙皇俄国的将军、省长和议员，移居芬兰后积极

支持芬兰民族启蒙运动。母亲伊丽莎白出生于彼得堡的书香门弟，是法国人的后裔，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酷爱文学艺术的女性，为芬兰文艺沙龙“耶尔内费尔特学校”的召集人。耶尔内费尔特在俄国上大学期间读法律学专业，回芬兰后于1980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在母亲的精心引导下，他开始阅读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作品。从中受到启迪，以致最终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移居芬兰洛赫亚农区，一面耕耘一面从事创作，走上了既是农民又是作家的独特的人生道路。

耶尔内费尔特的创作生涯始于19世纪90年代。当时芬兰文学总的趋势是由反映客观世界的现实主义向描绘人们主观内心世界的新浪漫主义转化。在这动荡时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他的文学创作虽然仍立足于反映现实生活，但更注重描绘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气质，力图展现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奥秘。这与当时其他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方法不甚相同。特别是他于190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生活的海洋》被认为是芬兰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篇之作。

长篇小说《祖国》（1893）是耶尔内费尔特早期发表的重要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自己在大学期间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为基本素材，形象地展示了芬兰民族文化的成长史。在芬兰民族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下，作者又以委婉、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芬兰大学生乌奥列拉内心成长的过程，从而客观地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芬兰青年的思想主流以及对自由民主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篇小说《祖国》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它映照出当时在芬兰社会上存在着的建立在自然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各种思想潮流；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和尚在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作品，立意深远，思想容量很大，足以窥探到作者对生活的洞察力和艺术概括生活的能力。他因此一举成名，跃入芬兰优秀作家的行列。

《我的觉醒》（1894）是耶尔内费尔特翌年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一本充满真情实感和颇具说服力的自白书。他在这篇作品中详细审视了自己所度过的曲折的人生历程，大胆而坦率地暴露出自己的过失；同时宣称自己是托尔斯泰的学生。作品的格调与《祖国》迥然不同；《祖国》的格调激越、昂扬，而《我的觉醒》的格调则低沉、伤感。作家耶尔内费尔特非常崇尚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观、自我忏悔、忍耐、良心、博爱及勿以暴力抗恶等消极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在以后创作的许多作品中均有所表露。如他在 1900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兄弟们》中叙述一家有兄弟四人，他们为了谋求幸福、宁静的生活不惜到处奔波，多方探寻。他们最终在基督教宣扬的 博爱的旗帜下找到各自的归宿。

耶尔内费尔特作为托尔斯泰的学生从 1895 年开始与这位俄国文坛巨匠建立了通信联系，并于 1899 年去莫斯科亲自拜见了这位文化伟人，与他讨论了当时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从中得到重要启示。后来他又接受了美国学者亨利 · 乔治关于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是产生社会弊端的观点。从此，他对土地问题和佃农问题极为关切，并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如他在 1905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地母亲的儿子》中强调指出，土地是人类幸福的根本。他通过对农村生活和自然环境的描绘流露出这一深刻的思想内涵。他在另一部长篇小说《历史的悲剧》（1909）中反映了在芬兰大罢工和维堡起义时期的佃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耶尔内费尔特亲自目睹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他关注的焦点由土地和佃农问题转移到宗教问题上来。他把拯救人类的重担寄托在上帝身上。就在 1917 年大革命的春天，他还在赫尔辛基大教堂多次进行演说，宣扬上帝的伟大。后来他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旅居海外

耶尔内费尔特晚年重操旧业，又写出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

《格莱塔和她的上帝》（1925），内容叙述一家三口，母亲和儿子操瑞典语，儿媳操芬兰语，三口人操两种语言，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母亲笃信上帝，主张宽容和忍让。儿子虽然身健如牛，会干一手漂亮的木工活，但心胸狭窄，敏感多疑，缺乏生活中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终于在生活的重压下自杀身死。母亲和儿媳相依为命，共同过着不算轻松的生活。另一部作品是自传体小说《我的双亲》（1928—1930），分上、中、下三册。内容叙述耶尔内费尔特的双亲是如何支持芬兰民族运动以及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小说再现了19世纪下半叶芬兰民族运动的历史。

此外，作家耶尔内费尔特在一生中还发表过两个剧本《奴隶的哲学》（1902）和《死亡》（1927）。前者反对集权主义，通过剧中人基督教徒吕西玛科医生向上帝呼吁："交出你的权力吧！"后者是一部象征主义剧作。剧中主人公帕瓦利通过母亲之死，学会了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的艺术。两部剧作艺术上都取得成功，特别是后者，由芬兰著名音乐家西佩利乌斯谱成歌剧，永载芬兰音乐戏剧史册。

其他现实主义作家

19世纪末，芬兰其他一些现实主义作家都以活跃的新闻记者身分进行写作，大都团结在《日报》和《青年芬兰》报周围。他们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整体，每个人只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进行创作。作家海基·卡乌皮宁（1862—1920）一生发表了20部长篇和短篇小说集，很难说出其中哪一部作品是他的代表作。他擅长塑造少女的人物形象，如描绘农村少女形象的作品《维娅》（1889）、《腊拉》（1893）和《阿丽娜》（1896）在当时引人注目。这些作品反映少女们命运多舛、生活坎坷和不幸遭遇的历程。

作家桑德里·阿尔基奥（1862—1930）当过商人、农民党领

袖和《依尔卡》报的创办人。他一生共发表30部文学作品，其中堪称代表作的是长篇小说《暴徒》（1894）。叙述1850—1860年间芬兰南波赫亚地区一些青年人对现实社会充满敌意，酗酒和暴力事件屡次发生，以此来对抗社会。作者非常熟悉那里的情况，用写实的手法和冷峻的笔调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富有戏剧性，读来非常感人。

作家桑德里·依瓦洛（1866—1937）当过《日报》主编，擅长写历史小说，他本人也是历史学家。他创作的历史小说均以历史实事为基础，其代表作是《约翰·维萨依宁》（1894）。内容记述芬兰大学生的生活，并较为详尽地展示了芬兰语言发展的历史。

此外，在芬兰现实主义文学盛行期间，诗歌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值得提及的诗人有卡西米尔·雷诺（1866—1919）、约翰·埃利科（1849—1906）和卡尔洛·克拉姆苏（1855—1895）。他们都是时代的歌手，歌颂民主、自由、进步和大团结。他们创作了一些感人肺腑的政治诗篇，对鼓舞人们的斗志、唤起民众的觉醒、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诗歌多是即兴创作，直吐胸臆，没有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所以在艺术上显得粗糙、直露，缺乏内在的含蓄美。这些诗歌虽然盛行一时，然而缺乏艺术的生命力，不能永放光彩。

第四章　动荡时期的文学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40 年代）

第一节　历史和文化背景

进入 20 世纪以来，芬兰过去长期保持的和平稳定局面被破坏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期间对芬兰加紧进行控制，使它百余年来持有的自治特权受到严重威胁。这激起芬兰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了芬兰 1905 年的大罢工运动。芬兰虽然于 1907 年对议会进行了改革，使之成为欧洲比较先进的议会形式，但是沙皇对议会通过的许多法律条文不予确认，影响到议会不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芬兰议会基本上形同虚设，实际上从 1914 年到 1917 年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

对于来自沙皇俄国的严重压力，当时在芬兰国内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是保守的芬兰人民党主张进行合法的斗争，必要时做出一些让步。一是受青年芬兰组织支持的宪法党主张消极抵抗。宪法党和瑞典人民党的极端分子甚至主张转到地下，组织武装对抗。在大罢工期间，芬兰国内形成了两支敌对的军事力量：一支由资产阶级右翼力量组成的白色近卫军；一支由工人组织中的左派力量组成的红色赤卫队。白色近卫军依靠德国的帮助，而红色赤卫队则得到俄国革命力量的支持。

1917 年俄国大革命的波涛影响到芬兰。当时最高权力虽然集

中在议会，但就共同遵循的方针路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特别是 1917 年 12 月 6 日芬兰宣布独立并立刻得到由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的承认，使芬兰的右翼力量（主要是白色近卫军）感到恐慌，两大派矛盾日趋激化，终于导致 1918 年初的国内战争。战争共进行了 3 个月，白色近卫军取得了胜利。当时国内形势严峻，实行了白色恐怖，大批红色赤卫队成员遭到监禁和屠杀。国家对外政策投靠德国，并曾建议由当时的德国国王卡尔兼任芬兰政府首脑。这次国内战争造成的民族分裂创伤长期得不到愈合，同时也长久地影响了芬兰对苏联的关系。

芬兰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在第一任总统斯坦伯克任职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佃农问题及小租赁者的社会地位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国家以贷款的方式组成新的小生产者，在社会福利和卫生保健方面也有所改善。1921 年实施了普及教育法。1922 年颁布了宗教信仰自由法。禁酒法也在 1919—1932 年开始生效。1925—1928 年之间芬兰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国民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人口逐步减少，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开始向工业和服务行业流动。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芬兰国内局势又趋紧张。由于语言问题而造成的芬兰和瑞典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芬兰国内经济也出现萧条；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诸如投机倒把、走私、失业和暴力等屡屡发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与苏联进行的冬季战争（1939—1940）和续战（1941—1944），使芬兰经济蒙受重大的损失，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战争创伤使芬兰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大伤元气。上述背景给芬兰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20 世纪芬兰文学不再像斯奈尔曼时代那样完全致力于民族的觉醒，而是迅速的反映当前形势，成为社会的一个舆论工具。同时文学中出现了分支：芬兰瑞典语文学和工人文学相继独立形成。瑞典语文学以瑞典族一群崇尚欧洲文化的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刊物和组织。工人文学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形式，其成员多是各种工人报刊的编辑和记者。

20 世纪初的文学流派基本上有两种：一是民族新浪漫主义或称象征主义色彩浓重的文学。一是 1909 年出现的新现实主义文学。新浪漫主义文学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其代表人物是大诗人雷诺。新现实主义文学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方面，其代表人物是作家莱赫托宁和西伦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芬兰文学中产生了新的一代。在芬兰瑞典语文学中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现代派抒情诗人。他们主张革新，其所创作的诗歌，在题材、结构、语言及格律韵脚上都与过去有所不同，明显地受到来自欧洲各种现代艺术流派的影响。在芬兰语文学中产生了“擎火把者”的组织，虽然这个文学组织没有统一的正式纲领，但是其成员有共同的兴趣和追求，思想解放，对人性有着共同的理解和信念，竭力主张“打开通向欧洲的窗子”。因此，在芬兰文坛上一时间色彩缤纷，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这些新一代诗人和小说家的成就并未超过他们的前辈。该组织维持时间不长，由于一些成员的个人原因，则各行其道了。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一些原“擎火把者”文学组织的左派人士为骨干，又组成了一个进步的文学组织“基拉社”。该组织公开宣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宣传社会主义为己任。它的机关刊物为‘四十年代’。其组织成员除作家外，还有评论家、戏剧家、舞蹈家、电影工作者、画家和雕刻家。其领导成员大多是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在团结芬兰文学艺术家，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维护和平方面，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第二节　新浪漫主义文学

新浪漫主义亦称“民族象征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末，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其间形成一股较大的文化艺术潮流，有“芬兰文艺复兴”之称。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于 1894 年登基后便对芬兰加紧统治。沙俄势力日益渗透到芬兰国内，致使芬兰人民百余年以来所享有的民族自治权利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时芬兰文学艺术界的注意力由国内社会问题转到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来。他们对民族的命运及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他们发思古之幽情，纷纷到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诞生地卡累利亚地区去采风。企图从芬兰古老的爱国诗篇里得到精神安慰和解脱。作家阿霍于 1892 年徒步走访卡累利亚就是最早的例证。芬兰文学史上把这一倾向概括为‘卡累利亚主义’。同时，19 世纪末在欧洲出现各种文化思潮．诸如象征主义、新柏拉图哲学、尼采的“超人”论述和勃兰兑斯的文学理论观点，这些都对芬兰文学艺术家的创作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影响。其中特别是芬兰文坛的新秀，他们把法国的象征主义视为至宝，奉为圭臬。芬兰新浪漫主义文学实际上是法国象征主义在芬兰的变种。它把传统的芬兰文学艺术风格与这种新的现代派艺术风格巧妙地融于一体，形成一个具有芬兰传统艺术特色的新的文学品种。

新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艺术思潮在芬兰有其独到之处。芬兰不同艺术种类之间的合作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配合得如此默契和富有成效。它们的共同口号是“卡累利亚主义”。例如，芬兰著名作曲家西佩利乌斯于 1896 年根据《卡勒瓦拉》中的关于勒明盖宁部分，谱写了《地狱中的天鹅》这部曲子。同年大诗人雷诺创作了同名的诗篇。相隔一年后（即 1897 年）油画家卡伦卡

列拉也创作出《天鹅》这幅名画。但是新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却没有形成一支能够主宰一切的力量。这种新的文学品种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它造就出一批颇有才华的诗人，他们对芬兰诗歌艺术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E. 雷诺

埃依诺·雷诺（1818—1926）诗人。他出生在帕尔塔里地区一职员家庭。其父是土地测量员；母亲是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对诗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哥哥卡西米尔·雷诺是 19 世纪现实主义诗人，对他的成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雷诺先后在卡尼亚、奥卢和海麦林纳诸城读完小学和中学，17 岁时考入赫尔辛基大学深造。在大学读书期间，由其兄引荐很快加入了芬兰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联盟并参与其中一切重要活动。这个联盟是一个激进的进步组织，他在其中受到了思想和艺术的薰陶和锻炼。雷诺的第一部诗歌集《三月之歌》（1896）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大学毕业后，雷诺先后在《日报》和《赫尔辛基报》担任戏剧和文学评论员。

诗人雷诺是一个早熟的天才。他一生涉猎较广，除创作诗歌外，还发表过大量小说、剧本、评论和散文。在芬兰当今出版的 16 卷本的《埃依诺·雷诺全集》中，诗歌部分只占了 5 卷，还不足三分之一。但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其诗歌当属首位。雷诺早年创作的抒情诗集《三月之歌》、《夜织女工》（1897）和《一百零一首歌》（1898），如林中小溪，似涓涓流水，清澈透明，热情奔放，洋溢着大自然的芳香，浸透着爱的欢乐。这时诗人的感情是激越的，胸怀是坦荡的，情绪是乐观的，积极追求美好的理想生活。但是由于诗人刚刚踏上人生之路，对社会涉足不深，其诗歌的内涵往往流于肤浅和幼稚，艺术上也缺乏创新。

进入 20 世纪以来，诗人由一个无忧无虑和天真无邪的“孩

童”逐渐变成一位“老成持重的歌手”。他通过短短几年的社会实践，开始认识到人生之路布满了荆棘和乱石，诗人所肩负的任务是艰巨的，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艰难的跋涉者”。正如他在《我的道路》这首诗所写的：

“我的路是探索者的路，
你要步我的后尘是不幸的！
我并非是一个好向导，
可能会把你引入歧途。
倘若你要有家，
最好留在那里。
而我的家，
却在海角天涯。”

1899 年俄国沙皇发表了一项旨在并吞芬兰的《二月宣言》。它激起了芬兰人民的强烈不满，导致爆发了 1905 年的芬兰工人总罢工。在祖国处于风雨飘摇期间，诗人雷诺像暴风雨中的海燕，站在斗争的前列，发表了约百余篇诗文，热情讴歌了人民的这一伟大爱国运动。他在这一芬兰历史上称之为“冰冻年代”里，成为芬兰文坛的核心人物和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诗人。他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刻找到最需要的词句”，创作出出色的诸如《人民的权利》、《自由者》、《太阳之子》和《浓雾迷漫中的赫尔辛基》等政治诗篇。诗人在《人民的权利》这首诗这样写道：

“人民的权利属于人民，
芬兰上下一条心。
民族的意志，
民族的语言，

至为宝贵，
至为尊严。
屹立的芬兰，
犹如山 巅。
古老的芬兰。
年轻的芬兰。”

这时诗人认识到：

“众多的诗歌，
众多的诗人，
只有一首诗歌，
属于群诗之冠：
这就是歌颂
民族精神和意志的
严肃的诗歌。
诗人虽不能永存，
但诗歌却永放光彩，
永远激励着人民前进。”①

诗人雷诺从童年时代就对本国古老的民间诗歌发生了兴趣，进入 20 世纪后这一兴趣有增无减。他从前辈诗人创作的诗歌中受到启发，从古老的民歌和传统中吸取创作题材，通过运用一些外来的新的表现手法，融进诗人个人的感受，使之创作的诗歌具有一种新的含意。同时，他在德国哲理诗人尼采的影响下，也创作出一些富有古代神话色彩的叙事诗歌，在这些诗歌中超自然的力

① 摘自 《万奈摩宁之歌》。

量往往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诗中充满象征、寓意和隐喻。其代表作是 1903 年发表的诗集《降灵节圣歌》(一)。它是诗人雷诺采用民歌形式作出的，但对民歌又有所创新，使语言更精练、更富有韵律感，其中一些隐喻和象征更富有个性。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叙事诗歌。这部诗集由几段组歌构成，组歌中的很多标题采用人名，或某英雄、先知，或胜利者或失败者。如《图里》这首诗，叙述一个名叫图里的人在梦中去参加上帝举行的宴会，席间他向上帝请求推迟他的死亡日期。当他一觉醒来，方知自己的睡眠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人类所能生存的年龄，于是他立刻准备登上开往冥国的灵车。在另一首《莱依科·莱赫盖》诗歌中，描述莱依科·莱赫盖为了保存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竟向敌人吐露了机密，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事后他感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叛国罪，于是跑到森林里自缢而死。诗歌《高乌达》述说先知者高乌达能够战胜一切，但就是不能战胜死亡，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羞怯地来到玛纳① 的住所前来求救。诗歌《土玛》描写一个叫土玛的少年生性怯懦，害怕生活，只好投奔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那里。他在那里得到父亲的鼓励和安慰，于是重新返回人间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叙事诗集《希尔卡圣歌》是诞生在芬兰古老民歌传统基础上的一朵奇葩。它标志着诗人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

如果说 20 世纪最初几年是诗人雷诺健康成长的时期，那么在 1905 年芬兰工人大罢工以后的岁月里则是诗人病态心理的萌芽阶段。造成诗人病态心理产生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一是家庭风波的干扰。1905 年芬兰工人大罢工之后，国内形势非但没有向好的方面转化，反而每况愈下，越来越糟。沙俄势力变本加厉地进行统治，国内阶级矛盾也愈演愈烈，致使团结涣散，民不聊生。面临这严酷的现实，诗人心境倍感伤痛。1908

①玛纳系宗教术语，代表超自然的力量。

年诗人的个人生活也遇到挫折，他刚刚组成不满两年的美满家庭由于爱妻的突然离异而遭破坏，这对诗人的精神是个沉重打击。因此诗人在以后创作的诗歌里充满悲观失望的情绪。诗人在早先创作的诗歌《拉毕的夏天》中还相信芬兰的文化将会出现繁花似锦的局面。然而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里却与严寒、冰冻紧密相联。如诗集《冬夜》和《霜冻》（1908）格调低沉、伤感，描绘了一幅幅阴冷昏暗的画面，呈现出一片萧瑟的景象。诗人对祖国的前途深表忧虑。他为了排遣这种过分压抑的心境，1908 年诗人开始了长期国外羁旅的生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小说、剧本，还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但是这些小说和剧本多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的应急之作，一般说格调和质量均不甚高，这多少也冲淡了诗人的形象。当然，诗人在旅居国外期间也创作出一些较好的诗歌，其中叙事诗《希尔卡圣歌》续集于 1916 年发表后获得很高的评价，其艺术水平堪与第一部诗集比美。所不同的，是诗集中的各组歌的标题不是人名而改为天体的太阳或月亮，如《太阳的告别》、《月亮的孩子》等。在《太阳的告别》这首诗中，叙述苍天遗弃人类并向可爱的大地告别的故事。组歌中还包括富有传统色彩的诗篇，如《我们的救世主》。这首诗描写基督耶稣一次到芬兰旅游观光，旅途中感到又饥又乏，想找个地方休息。不料耶稣的投宿到处遭到冷遇，只允许他洗了芬兰蒸汽浴“萨乌纳”。从此，芬兰烟薰火燎的“萨乌纳”便成了谅解和友谊的圣地。

诗人晚年创作的诗集《约翰君主和卡萨林娜亚凯洛尼卡之歌》（1919）和《盛开的丁香花》（1920）等，其主旋律是自由，即思想的自由，情感的自由，国家的自由，人类的自由。但是此时诗人已感到力不从心，预感到在他有生之年这种新的追求和憧憬是不能实现的，因而他在这些诗集里也流露出一种哀伤的情调。

诗人雷诺是芬兰诗坛上的一位奇才，集诸多矛盾于一身。他创作的诗歌思想内涵跨度很大。他既是时代的骄子，以敏锐的目

光审视着时代的风雨，捕捉着时代的脉搏，又是尼采式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极力冲破传统的道德规范。他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客观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新型人，又是神秘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在诗歌中把庄严和温柔，生活的欢乐和痛苦融为一体，他在《太阳之歌》中高呼：“呵！人们，你们相互拥抱吧！”又在《老媪之歌》中低吟“人类是山猫群”。他是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但从不否定生活，他又是负荷着生活重担的艰难跋涉者，因而永远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他在诗歌创作中能够把掌握的民歌的各种形式和风格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从而使芬兰抒情文学的语言技巧和艺术风格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但诗的造诣很高，而且才思敏捷，能最先解释多种流派和思潮，把欧洲的浪漫主义和芬兰的卡累利亚主义最丰满地结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V. 科斯根涅米

维科·科斯根涅米（1885—1962）诗人、教授。他出生在奥卢城一职员家庭，父亲为中学教员。他两岁丧父，是在母亲、祖母、姑姑和姐姐等一群女性的爱抚下长大的，自幼聪敏多情。家乡美丽的自然环境，如星光闪烁的夜空、川流不息的流水及冬季雄伟壮观的冰川在他幼小的心灵经常唤起神秘的感觉，引起他的幻想。他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于 1903 年进入赫尔辛基大学读书，1907 年获学士学位。在大学学习时，他曾兼任地方报纸助理编辑，1906 年发表了处女作《诗》,从此坚定了他从事诗歌创作的信心。1921 年他被任命为土尔库大学文学教授，以后晋升为大学校长。他一生共出版了 10 部诗集、2 部诗篇小说集、1 部长篇小说、1 部散文集、3 本游记和 1 部童年回忆录，此外，还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科斯根涅米还是一 位出色的学者。他著有四卷本的《书与作家》（1916—1931）、《罗马诗人》（1919）、《青年歌德》

（1932)、《基维》（1934）和《歌德的中年和晚年》（1947），因而加强了他在芬兰文坛上的地位，1948 年被选为芬兰科学院院士。

科斯根涅米早期创作的诗歌集，如《诗》、《闪光的城市》（1908）和《煤光》（1913）具有法国帕尔纳斯格律诗的特征，词句简练,意境深邃。他不像 19 世纪浪漫派诗人把诗歌当做直吐衷肠的工具，而是在诗歌中力图把个人的感情隐藏在客观世界的背后，重视再现历史真实的艺术境界，重视诗歌的语言格律。他的早期抒情诗的基调是忧郁和悲观的，就诗人视野所及，无论在自然界或在人类生活中均呈现一片空灵死寂的景象。在《诗》集中有抒写都市夜景的诗篇《午夜的城市》和《夜晚的街巷》，有抒写北国风光的《平川》等。在这些诗篇的字里行间渗透着诗人对这冷淡大千世界的沉郁情思。在《闪光的城市》这部诗集中，作者重点描绘了家乡的自然风貌，如《故土》、《冬天的早晨》和《海岸》几首诗中，诗人不是对秀丽景色的引吭高歌，而是浅吟低唱，饱含着幽怨的情调。他在《森林中的秋夜》一诗中这样写道：

“我仰望着星空，
陷入沉思默想：
我一生的命运，
就在那个 地方。
我屈膝双跪，
向星空请求，
请别可怜我，
让我走完人生旅程。
我要经受住，
痛苦和磨难，
羞耻和恐慌，
即使我迈出一步，

就有一个陷阱，
理想破灭，
一事无成。
我的星空，
我要赞美你，
是你把我铸成人。”

诗人在秋天的夜晚，漫步在林间小路上，举首仰望天空中的星星，触景生情，联想自己的人生际遇，感慨万千，激起创作的灵感。这时诗人的世界观是超自然的，认为大自然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但是诗人早期诗歌流露出的悲观主义并没有导致他对人生的完全绝望。如《煤光》这部集子中的一些诗歌悲观色彩有所减弱。诗人一生多次强调人道主义。他曾说过，诗人的创作事业是对自己最高人道主义的奖赏。也许正因为基于这一信念，他才得以在这冷酷的世界上勇敢地生存下来。

诗人科斯根涅米一生的追求，诗人喜怒哀乐感情的流露，莫不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在后来创作的《旗之歌》中开头写道：

“我国的蓝色十字旗，
我庄严地向您宣誓：
为捍卫您而生，
为捍卫您而死，
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诗人在诗歌《云雀》、《为芬兰自由而歌唱》和《狮旗》中也抒发了这种爱国之情。他在《狮旗》这样结尾：

“啊，芬兰的狮旗，
光辉的日子就要来临！
您指导着人们进行
出色的斗争。
渡过难关，
就是胜利。”

芬兰于 1917 年取得独立。科斯根涅米目睹了独立后在国内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感到无限欢畅。1924 年发表的诗集《新歌》充分反映了诗人这种兴致盎然的愉快心情。《新歌》中的篇篇章章都跃动着一股青春的活力，富有生机。在诗歌《斯奈尔曼》和《献给云雀》中激荡着诗人热爱祖国的炽烈感情。而在《劳动之歌》和《播耘者之歌》中则散发出诗人对劳动者的赞美之情。诗人此时已认识到劳动能创造一切的伟大意义，他认为，芬兰人民只有依靠劳动才能缔造出一个新型的国家，并使之繁荣昌盛。诗人的这一观点在 1930 年发表的诗集《犁》中更得到了印证。可以说，科斯根涅米作为一名诗人在此阶段已走向成熟，他的创作思想得到了升华，从而使他居于诗坛的核心地位。

此外，科斯根涅米在此期间还写了不少箴言和警句。这些箴言和警句富有哲理，内涵深邃。例如：

“挥霍和享受不是幸福，而是幸福的绊脚石。”
“容忍的才能是心灵健全的最好证明。”
“谁想谋求全人类的幸福，谁就不会计较个人得失。”
“伟大的思想永远会发出光芒。”
“仁慈比荣誉更可贵。”
“善良人好做,正义者难当。”
“妒忌是心灵上的霉菌。”

“天才如没有韧性就如同灯没有油。”

从以上列举的箴言中也映照出诗人自己的世界观。诗人后期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此方面也多有建树，享有崇高的威望和荣誉。

诗人科斯根涅米的生活经历、艺术追求和人生观与雷诺不同。雷诺接近于欧洲文化潮流的激进派，而他则基本上是忠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守派；雷诺倾向由芬兰人民党分裂出来的激进组织青年芬兰派，而他则靠近芬兰人民党；雷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诗讽刺德国，而他则始终与德国保持友好；雷诺在诗歌艺术上崇尚德国诗人海涅和法国的象征主义，而他则以德国诗人歌德为师并仿效法国的格律诗；雷诺在诗歌创作上注重感情，追求梦幻，始终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而他则偏重理智，追求实际，早期是悲观主义者，后期为乐观主义者。雷诺的诗歌格调偏重豪爽奔放，而他的诗歌格调则冷漠、拘谨。这两位诗人的艺术追求与世界观的分歧，形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芬兰文化界不同的思想观点和阵营。同时两位诗人分歧的演变过程，也促进了芬兰文化艺术，特别是诗歌艺术的发展。

O. 玛尼宁

奥托·玛尼宁（1872—1950）诗人。他出生在坎卡斯尼米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赫尔辛基大学教学，同时从事业余诗歌创作和翻译工作。他的家庭成员在芬兰文化艺术界都享有很高的荣誉：其妻安妮·斯万是儿童和青年文学作家，并担任儿童报《蟋蟀》的编辑；长子苏莱维·玛尼宁是天赋很高的青年诗人；次子玛乌诺·玛尼宁曾担任芬兰剧院院长。

玛尼宁的诗歌创作起步较晚,生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他一生共发表了5部诗集，数量很少，且深奥难懂，一般不具备高

深文化素养的读者难以完全理解其诗歌的内涵。他的诗歌的突出特点是用词极为简练，以最少的字和句来包含最大的思想容量。为达此目的，他常常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打破常规，多使用反常的词组和句形，颠倒字句正常的排列次序，借以表达内心的奥秘。玛尼宁还是位优秀的翻译家。他翻译过世界文学大师荷马、莫里哀、歌德、海涅和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他也是国内瑞典语著名爱国诗人鲁内贝格全集的译者。他翻译的作品也往往被赋予译者独特的个人创作的色彩，给欣赏者增加一定的难度。

诗人玛尼宁性格内向，外冷内热，严肃中透出幽默。他创作的诗歌集《火花一集》（1905）、《火花二集》（1910）、《潜流》（1925、《旅行者》（1938）及诗人去世后出版的诗集《回忆之路》（1951）都是精品，在芬兰文坛具有一定的份量。在这些诗集中含有一定数量的爱国诗篇以及反映芬兰历史和现状的诗歌，但其绝大部分是抒发诗人个人感情的诗歌，这些诗歌格调冷漠，忧伤。诗人在这些诗篇中采用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读者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并进行深入的思考，方可从暗示或隐喻中领悟到诗歌的真正内涵。如诗歌《失去的一天》、《天鹅之歌》、《夜风》和《月光》等。另外，玛尼宁还创作了一些具有幽默感的讽刺诗，如《鹨和鲑》、《平和的人》和《四月的早晨》等。

玛尼宁在诗歌创作中始终把伦理道德放在首位。他认为人类的贪婪本性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他在诗歌中讥笑人们的软弱无能和狂妄自大 。诗人对荣誉和地位不感兴趣。他在生活中敏锐地捕捉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或人们相互之间微妙的关系，他发现在人们的友谊背后常常隐藏着贪婪和自私，其真正的思想感情被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所掩盖。他创作的诗歌中心议题是探讨人们思想感情的深奥和微妙。在艺术上，玛尼宁喜欢以自然界的现象做比喻或象征，从而引起读者的深思和玩味。因此有人说他是象征主义诗人。

L. 库斯蒂

拉林一库斯蒂（1873—1948）诗人。他出生在海麦林纳一小业主家庭。他在中学读书时与诗人雷诺是同窗好友，对文学就产生了兴趣并试写短诗。他生前共发表近 50 部作品，除诗歌外还包括小说、戏剧、散文和回忆录等。

库斯蒂发表的第一批诗歌《青春颂》（1893）、《乡村之歌》（1898）和《流浪者之歌》（1899）热情讴歌了海麦地区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绘制出一幅幅色彩明丽的农村风景画，格调轻松、欢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但是随着诗人年龄的增长，对人生的阅历逐步加深，诗歌创作题材越来越宽广，格调亦趋向冷峻。如这一时期发表的诗集《海浪》（1905）映照出时代风云的变幻，其色彩由明丽转向暗淡。

诗人后期创作的诗歌富有浪漫气息，诗集《荒原》（I-I 集，1915—1917）是其后期代表作。他把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的素材加以夸张和虚构，使其诗歌既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又具有传奇色彩。此外，诗人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神话诗和海洋抒情诗在芬兰诗坛也独放异彩，成为后代诗人效法的榜样。

L. 奥奈尔娃

奥奈尔娃（1882—1972）女诗人。她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城市家庭。她在赫尔辛基读完中学和大学后便直接投身文学事业。她既写诗，也写散文、剧本和小说。她精通法国文学，曾翻译过不少法国诗歌，她自己写的作品也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她的诗歌和散文，富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特色，描写新的更自由的生活感受。奥奈尔娃早期发表的诗集《调和》（1904）和《被打碎了的偶像》（1910）追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主张抛弃传统的道德观念。她有一些抒情诗歌富有性感，接近弗洛伊德的泛性欲

主义，直接对传统的诗歌挑战。她发表的长篇小说《密尔娅》（1908），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独立的妇女形象，为芬兰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色彩。奥奈尔娃是 20 年代文学组织“擎火把者”的积极支持者，竭立主张芬兰文学的“门户开放”。诗人后期创作了不少歌颂大自然的诗歌和充满哲理的格言诗。

奥奈尔娃与雷诺一样具有叛逆性格。由于性格和爱好的一致两人生前结成好友，交往甚密。也许因此导致她后来写出两卷本的传记文学《埃依诺·雷诺》（1932），为后人研究大诗人雷诺的一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J. 西尔约

约翰·西尔约（1888—1918）诗人。他出生在奥卢城一个海员家庭。因家庭经济拮据，他只读了三年大学便辍学从军，最后牺牲在国内战争的疆场上。

西尔约被后人赋予传奇人物“前额光亮的青年”、“自我的设计者”、“伦理道德的追求者”。他为人朴实，其创作的诗歌也和他的为人一样：自然、和谐、真实，毫无矫揉造作和哗众取宠之嫌。与雷诺等人的诗歌相比，他的诗歌显得呆板和单调，但是他以自己的生活实践证明：只有朴实的人才能够真实地观察世界。他发表的诗集《诗歌》（1910）、《大地在召唤》（1914）和去世后出版的《清水》（1919）映照出诗人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在当今出版的《西尔约诗集》中又收集了其生前创作的格言诗，这更丰富了诗人的形象。他的很多格言诗已成为人民生活的座右铭。诗歌成为诗人西尔约严肃的自我审视的工具，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把自己封闭在大千世界之外，他是以自己切身的内心体验来认识其他事物的。如果说诗人科斯根涅米是寻找真理，而诗人西尔约则是寻找前进的道路。当然，在西尔约的作品中，不仅仅有反映自己意志和思想的诗歌，还有充满诗情画意的讴歌大自然的佳品，这

两种诗风并存。另外，诗人西尔约除创作诗歌外，他发表的研究著作《抒情诗人埃依诺 · 雷诺》（1912）、《巴卡拉》（1917）以及《当代文学的分水岭》（1914）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被一些学者所引用。

第三节　新现实主义文学

芬兰新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 1909 年。它主要包括小说和戏剧 是在 19 世纪著名作家基维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1)如同 19 世纪传统的芬兰文学作品一样，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也往往以大自然为背景。(2）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普通劳动者，其中大多数都相当贫穷。(3)作品中人物的价值不是以其社会地位、文化水平或财富多寡来衡量，而是以其所作所为去判断。(4)作品中揭示的往往是个人和社会制度方面的矛盾或冲突。(5)作品的主人公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几乎都是社会的叛逆者，扮演着反潮流的角色。以上基本上概括了芬兰新现实主义文学总的风貌，但是具体到其中某一个作家的作品时，并不能完全体现上述全部特征。因为每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和采用的创作方法不尽相同，有的前期和后期差别很大。此外，还应指出，这一时期瑞典语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多反映城市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内容，与上述特征相去甚远，它完全脱离了传统文学的道路。

J. 莱托宁

约埃尔 · 莱托宁（1881—1934）小说家。他是塞明基地区一个贫苦农妇的私生子，自幼由一位牧师的遗孀抚养成人，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他在赫尔辛基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后成为专业作家。

莱托宁性情孤僻，内心经常充满激烈的斗争。他愤世嫉俗，横眉冷对世上的一切达官贵人，对弱小者们怀着深厚的同情心。他的创作视野多局限于描绘故乡的人和事。但是他不满足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而是追求表现事物的本质，力求透过对人的行为和所处环境的描绘去揭示人的灵魂。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社会上的叛逆者。他在作品中经常把荒诞无稽的情节和绝对真实的细节揉合在一起，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困惑，从而暗示出时代危机的某些征兆。

莱托宁的早期作品，如诗集《陷阱》（1904）、小说《魔鬼的小提琴》（1904）和《玛达琳娜》（1905）具有新浪漫主义文风。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尼采“超人”哲学的产物。他（她）们玩世不恭，尽情享乐，无所畏惧，我行我素，置社会传统道德于不顾，视国家法律如粪土，是社会上的浪子。其中小说《玛达琳娜》是作者以生母的经历为基本素材写成的，反映了这位年轻女人不幸的一生，颇受读者欢迎。这几部作品虽然还存在着思想和艺术上的不足，但它们充分表现出作者饱满的创作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较熟练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907—1908年，面对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和新浪漫主义文学日趋唯美主义倾向，作家莱托宁深感忧虑。他为了排遣当时的沉重心境并寻求一种更好的反映国内现状的文学形式，不惜离乡背井，去意大利和法国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考察旅行。意大利是人文主义大师薄伽丘和但丁的故乡，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他在那里加深了人文主义的观念。法国是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的诞生地，他在那里开拓了文学的视野，奠定了他立足现实的创作思想。从此作家莱托宁的创作文风发生了变化：由早期的新浪漫主义转向新现实主义，作品的体裁采用小说形式。他创作出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其中较为优秀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一个夏天的故事》（1917）和《布特吉诺科》（上下册，1919—

1920）

长篇小说《一个夏天的故事》叙述几位友人夏季相会湖滨小城萨沃林纳。他们沐浴在阳光下，在大海里游泳，徜徉在花丛中，尽情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他们肝胆相照，互诉衷肠，相互道出各自的生活苦衷。其中主要人物艺术爱好者法尔克曾访问过意大利和法国，在国内以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自居，但是他在社会上却处处碰壁，特长得不到发挥，艺术上也无成就。因此他倍感伤心，苦闷异常，企图自杀而一了终生。法尔克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代表了当时芬兰知识分子存在的普遍心境。作品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莫蒂宁。他是由小农起家的商业资本家、书店老板。他很善交际，对朋友慷慨大度。但是他神经过敏，在婚姻问题上屡遭不幸，因此不再结婚。他认为结婚生子会带来不安宁，孩子日后也会成为未来战争中屠杀无辜的刽子手，遭世人谴责。整个小说基调低沉，反映了人们悲观厌世的心理状态。然而作者却以幽默诙谐的笔触赋予小说以喜剧色彩，在作品中设置了许多荒唐的情节，使读者在忍俊不禁之后紧紧锁起了眉头。这是作家艺术匠心之所在，也是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色之一。

长篇小说《布特吉诺科》是莱托宁的代表作品。小说集中刻画了农村无产者凯克里埃宁这一人物形象。他正值壮年，却似乎有些懒散和不务正业。他与妻子共生养了 10 个孩子，还抚养一个患病的老岳母。一家 13 口人拥挤在一间光线暗淡、又脏又乱、臭气薰天的洗澡间里，这间小屋年久失修，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然而他却处之泰然，从不修缮。关键是他不满现存的社会制度。他痛恨自己耕种的土地不属于自己，更憎恨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由于他居住的洗澡间是属于土地所有者的，所以他宁肯让它倒塌，也不去修理。最后他放弃对土地的耕耘，携带全家辗转东西，做卖酒的生意，尽管当时政府已颁布了禁酒令。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他不依附于富家

的“恩赐”，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开辟新的谋生道路。在生活的重压下，他艰苦奋斗，从不屈服，这也是整个作品的立意所在。作家通过主人公一家一天生活的经历来结构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足以表现出其艺术功力之深厚。作家莱托宁长期生活在布特吉诺科的乡间别墅，颇为熟悉那里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这部小说正是该地区无产者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透过对主人公生活环境和行为动态的细致描绘，深刻揭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作家晚年更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经常以幽默和讽刺两种艺术手法来干预现实生活，先后发表了《可爱的跛子》（1922）、《受压迫的孩子们》（1923）、《红色男人》（1925）、《鸟巢》和《恶魔的斗争》（1933）等重要作品。

I. 基安托

依尔玛里·基安托（1874—1970）小说家。他出生在布尔基拉教区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牧师家庭，是土尔库早期浪漫主义时期诗人卡尔姆尼乌斯的后裔。他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文学系，后去俄国深造。在那里他对俄罗斯文学涉猎较广，受艺术大师托尔斯泰影响较深。回国后他曾当过报纸编辑和俄语教师。但是基安托一生大部分时间却蛰居在芬兰北部的偏僻地区卡依努，潜心从事文学创作。卡依努地区荒漠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在那里的粗犷慓悍的劳动人民经常是他描写的对象。

基安托是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一生共发表近50部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游记和随笔等。他性情孤傲，对事物有独立见解，从不随波逐流和趋炎附势。他反对调和、偏见和强权，反对宗教权威和保守。同时还经常进行自我反省。他发表的一系列自传体小说，如《神圣的恨》（1908）、《神圣的爱》（1910）、《保守的牧师之家》（1922）和《牧师之子》（1928）是他世界观逐渐形成的真实写照。

基安托早期发表的抒情诗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富有民歌风味，语言朴实、优美、简练、生动。著名诗集有《划船者之歌》(1893)、《诗与歌》(1900)和《祖国之歌》(1906)等。诗人有一颗赤诚之心，从青年时代就背叛了自己的牧师家庭，投身到祖国和劳动人民的怀抱。诗人在这几部诗集中满怀激情，放声歌唱，热情赞颂了养育他的国家和劳动人民。随着诗人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观察事物的眼光变得愈益严峻和深邃，具有一种穿透力。他在以后创作的许多小说中，透过斑驳陆离的社会表层揭示其存在的多种矛盾。给人以很深的启迪。他的优秀小说当属《红线》(1909)和《来自留休兰塔的约瑟》(1924)。

长篇小说《红线》是作家基安托的代表作品。它是以1905—1907年芬兰选举制度改革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的。当时芬兰隶属于沙皇俄国的大公国，其议会为多院制，而且不由普选产生。1907年芬兰在社会民主党占优势的情况下由多院制改为一院制，并且通过一个法案：规定凡年满24周岁的芬兰社会公民，不论男女，均享有选举权。小说主人公托比和妻子丽卡住在一个荒僻的小村。他们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总盼望有一天幸福降临人间。后来社会民主党人来这里做竞选演说，这对夫妇受到了鼓舞。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在选票上划上一道“红线”，就可从饥饿线上挣脱出来，从而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就会来到人间。然而选举过后，托比家中的生活依然如故。他们依然居住在小茅屋中，依然日以继夜地劳作，依然受冻挨饿，他们的3个孩子因缺吃少穿相继死去。就连家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小牛也被饿熊咬死。托比忍无可忍，最后操起斧头，向熊砍去。大熊受伤了，但是它更穷凶极恶，伸出魔爪，在托比的脖子上深深地画上了一道血红的线条。作者同情劳动人民的困苦处境，认为造成劳动人民愚昧、落后的主要原因仍在于贫穷。但是如同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希望通过改革选举制度来改善社会贫穷状况和改变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是不现

实的。因为反动势力太强大了。这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的立意所在。当然，作者通过社会民主党人竞选演说之口，对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同时喊出了“革命必胜”的口号。这对当时处于蒙昧状态下的劳动人民不啻是一声振聋发聩的春雷。此外，基安托在这篇小说中对艺术创作进行了新的摸索，采用了象征和拟人的艺术手法。例如，作品中的“熊”象征着反动势力；当主人公托比去教区村头买面粉时，森林中的树木都交头接耳，家中一群穿着红褐色衣服的蟑螂也议论纷纷。这种拟人式的描写，既烘托了作品的气氛，又增加了幽默感。

基安托另一部优秀小说《来自留休兰塔的约瑟》,是一部反映约瑟一家贫苦生活的作品。现在“留休兰塔”在芬兰已经成为“一贫如洗”的代名词和人们形容生活困苦的口头禅。这部作品如此深入人心，社会效果如此之大，应该说是对作者最好的客观评价。

M. 约杜妮

玛丽娅·约杜妮（1880—1943）女小说家。她出生在库比奥城郊的一个庄园主家庭，大学肄业。1911年与文学教授塔基阿依宁结婚，以后从事业余创作。富有文学气氛的家庭环境使她养成喜欢读书和善于思考问题的习惯。她的个人生活一向求实，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而以家庭主妇自居。她博闻强记，才思敏捷，夏秋之交是她创作的旺盛季节。约杜妮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一部作品的产生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构思，然后下笔如神，一挥而就。她在创作时惜墨如金，用词异常简练，在作品中从不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外部特征和客观环境的描绘，而是借助人物的内心独白或几个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揭示作品的主题。她不像莱托宁和基安托两人那样直率地鞭挞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而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特征，借以暴露人们的自私和贪婪等顽症。

在她的作品中，个人道德问题往往取代了社会问题。她深刻批评了人们存在的错误思想观念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行为，为高尚的人道主义大唱赞歌。她认为透过人们的爱情纠葛最能观察到他们的思想品德和道德风尚。因此她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几乎都涉及到爱情生活领域，作品的主人公也经常是她熟悉的出身于中等家庭的年轻女性。约杜妮时而以冷峻时而以幽默的笔调，如同印象派画家那样来捕捉对她们转瞬即逝的印象。然而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既不夸张，也不加以粉饰，非常贴近生活实际。所以她的作品在城市知识阶层特别受到注视。

约杜妮以善写短篇小说和戏剧而立足芬兰文坛。她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集有《爱情》（1907）、《如此感情》（1913）和《玫瑰园中的姑娘》。在《爱情》这部作品中，作者着重指出在通往真正爱情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和乱石，只有不畏困难，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才能到达幸福的顶峰。短篇小说《玛卡列塔》的女主人公玛卡列塔虽已结婚多年，她并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当丈夫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她一度情绪消沉，悲观失望，认为爱情之花趋向凋零，整日无精打采，默默无言。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争后，她突然醒悟，从此对丈夫耐心照顾，热情体贴，使之很快战胜病魔，恢复了健康。家庭又恢复了欢快、和谐的气氛。在《如此感情》这部作品中，作者深刻批判了那种把门第高低和金钱多寡视为爱情砝码的思想观念。短篇小说《塔沃·图奥玛依宁》描绘贫穷的佃农拉姆巴依宁贪图富贵荣华，看到佃主图奥玛依宁腰缠万贯，孤身一人，便想方设法要把佃主的财产攫为己有。他把女儿艾丝黛丽送往佃主家当佣人。一天晚上佃主酒后欲火燃烧，要求艾丝黛丽留下陪他过夜。当主仆二人同床之际佃农拉姆巴依宁闯进屋来，威逼佃主与其女成亲。佃主为了避免家丑外扬，便违心地答应了这门亲事。一场美人计成功了。作者以幽默的笔触，深刻鞭挞了为了追求财产以爱情做儿戏的荒唐行径。在《玫瑰园中

的姑娘》这篇小说中，作者叙述出身豪门的姐妹两人，父母早亡，两人相依为命。后来两人同时爱上来自异域的一位年轻壮士。姐妹俩因此争风吃醋，由相依为命变为情场上的仇人。姐姐最后占了上风，与壮士结为夫妻，并把妹妹赶出家门。妹妹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贫病交加，过早离开人世。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同情弱者，抨击了强者的残忍和冷酷无情，并告诉人们：爱情可以使人变得高尚，也可以使人变得渺小；它可以结出甜果，也可以结出苦果。此外，约杜妮早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日常生活》（1909）也在当时颇有影响。作者在这篇作品中描绘了萨沃地区的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生动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年轻的和年老的，富足的和贫穷的，慷慨的和吝啬的，以及他们的欢乐和忧愁。这是一部严谨的写实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

约杜妮创作的剧本一般比较短小、精练，多注重刻画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和反映他们的心理变化轨迹，人物对话机智幽默。其优秀剧作包括表现人们爱情和婚姻纠葛的喜剧《男人的心肝》（1914），揭露人们的投机心理和贪图钱财的喜剧《金色的小牛》（1918）和反映人们犯罪行为的悲剧《我是罪人》（1929）等。

A. 卡拉斯

阿依诺·卡拉斯（1878—1956）女小说家。她出身于维堡一书香门弟，其父尤利乌斯·克伦是抒情诗人。她受父亲的影响，早在中学读书期间就以父名发表诗歌。后来她与爱沙尼亚民间诗歌教授奥斯卡尔·卡拉斯结婚，侨居国外生活。但是她从未放弃写作，并成长为芬兰文坛一枝散发出异香的奇葩。

作家卡拉斯在侨居爱沙尼亚期间创作的小说基本上反映那里人民的生活状况。最早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海的彼岸》（上下集1904—1905）叙述爱沙尼亚人民在沙皇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他们终日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苦生活。作者在字里行间对他

们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短篇小说集《航船离去的城市》（1913）和《遗留血种》（1921）是作家以爱沙尼亚人民生活为素材创作的优秀作品。前者记叙爱沙尼亚人民在1905—1906年大罢工期间斗争情景。例如，短篇小说《伯尔哈德·利维斯》中，描写一个名叫伯尔哈德·利维斯的农民不幸被反动军警逮捕。他在反动当局的讯问和威逼下意志顽强，宁折不屈，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作者高度赞扬了爱沙尼亚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高贵品质。后者多是反映爱沙尼亚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文笔轻松幽默，生动活泼。

爱沙尼亚取得独立后，卡拉斯的丈夫奥斯卡尔教授被委托常驻伦敦的外交使节，卡拉斯也陪同前往，她以外交特使夫人的身份在伦敦生活了12年（1922—1934）。在此期间，她创作出以爱情纠葛为题材的4部小说，即《巴尔巴拉和蒂斯胡斯》（1923）、《烦恼的牧师》（1926）、《狼妻》（1928）和《神河的报复》（1930）。作者在这几部作品中完全摆脱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采取了类似古老传统的艺术形式，赋予作品以象征意义，并且充满了浪漫色彩。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远离了现实生活，似乎坠入到古老的年代。他们如同梦游者到处流浪，虽然偶而得到了“幸福”，然而最终却遭到毁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古代的某个角落，周围环境阴森可怖，鬼影闪没，恍若恶魔世界。小说中的语言冷僻，多隐喻和象征。其中《烦恼的牧师》是她的代表作品。叙述发生在17世纪的一个芬兰牧师的妻子和牧师的助手通奸的故事。这是一场爱情悲剧，小说故事性强，通篇充满戏剧性，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作者特别注重描绘人物的内部心理活动，展现出人物由本体的原始情欲和享乐原则构成的深层心理自我，在创作艺术上有新的追求。无疑，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借古喻今，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神学界的肮脏内幕，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

作家卡拉斯于1944年移居瑞典。晚年发表了回忆录式的长篇

作品《日记》（1952—1956），共分五卷。她在日记中真实记录了自己从读书时的年轻姑娘到外交官夫人这一时期的生活历程，特别追忆了她与芬兰大诗人雷诺的一段不平凡的爱情插曲。

M. 拉西拉

梅尤·拉西拉（1868—1918） 小说家。他出身于卡累利亚西部地区一个农民家庭，1887 年进入索尔塔瓦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维堡当教师。1898—1904 年旅居彼得堡，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1904 年回到芬兰。他 1916 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18 年在《工人报》当编辑，同年参加国内战争，成为红色赤卫队出色的文艺战士，赤卫队失败后被白军杀害。

拉西拉于 1909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哈尔哈玛》及其续集《玛尔特玛》反映大革命前在俄国和芬兰存在着的社会矛盾以及工人阶级的觉醒。同时作者对处在革命前夕的彼得堡也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这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但作者也采用了不少神话一寓言式的虚拟手法，使作品显得多彩多姿。

长篇小说《借火柴》是拉西拉的代表作。它讲述了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离奇故事，因为借火柴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小说主人公伊哈拉宁去邻居秀伐利宁家借火柴，借此机会替好友瓦塔宁和秀伐利宁的女儿提亲。秀伐利宁了解到瓦塔宁家产丰厚，便应允了这门亲事。瓦塔宁闻讯后要求伊哈拉宁一同去城内采购订婚彩礼。他们在去城里的路上喝醉了酒，酒后吐狂言，声称去美国娶个漂亮姑娘回来。霎时间狂言传遍全教区，以讹传讹，最后竟变为他俩在去美国的路上淹死了。伊哈拉宁的妻子闻后伤心至极，并决定改嫁原来的意中人考诺宁。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伊哈拉宁和瓦塔宁在城里呆了好几天，邂逅了瓦塔宁原来的相好凯莎。当瓦塔宁知道凯莎的丈夫已经去世并留下了大批资产后向凯莎求婚，凯莎知瓦塔宁家产丰厚，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三人返

回乡下途中路过秀伐利宁的家，这时伊哈拉宁才想起借火柴的事，于是来到秀伐利宁的家。伊哈拉宁正巧遇到了正欲偕同新的未婚夫到城里办婚事的妻子，秀伐利宁的家便成了小说中的故事的集中点。伊哈拉宁见状勃然大怒。妻子悔恨交加，百般讨好伊哈拉宁。考诺宁惊慌失措，左右为难。秀伐拉宁的女儿同情考诺宁的处境，答应与他结婚。这样一场矛盾冲突避免了。最后伊哈拉宁与其妻重归于好，双双回到家中。小说中的故事情节阴差阳错，妙趣横生。小说中的语言轻松活泼，诙谐幽默。几个主要人物形象贴近生活，栩栩如生。作者通过这滑稽可笑的故事深刻揭示出芬兰东部偏僻地区的人民是多么愚昧无知，他们是一群芸芸众生，缺乏智慧，缺乏感情，精神空虚，斤斤计较物质利益。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是一部内涵丰富的精品。

拉西拉一生还创作了其他一些长篇小说，如反映佃农问题的《孤独者们》（1913）,针砭宗教观念的《聪明透顶》（1915）和批判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复活》（1915）等。此外，还有剧本《寡妇求爱》（1911）和《玫瑰花开》（1912）。

J. 林南科斯基

约翰·林南科斯基（1869—1913）小说家。他出身于阿斯科拉地区一个小农家庭。他中学没有毕业，全靠自学成才。1895 年主办《乌西玛报》，致力于唤醒民众的工作。他既亲自撰写文稿，又经常利用群众集会场合发表演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组建了芬兰民族同盟，并在纪念爱国诗人斯奈尔曼诞生 100 周年之际发动改用芬兰文名字的运动，到 1906 年已有 10 万人由瑞典名字改为芬兰名字。他作为社会活动家对芬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他一生的主要成就却表现在文学方面。

剧本《永恒的斗争》（1903）是他的处女作。该剧取材于圣经该隐杀弟的故事，反映善与恶的永恒斗争。扬善弃恶是作家一生

文学创作的基调。

长篇小说《火红的花之歌》（1905）是他发表的第二部重要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唐璜式的人物，他身材修长，其貌不扬，作风轻浮，玩世不恭，热衷于诱惑女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后来他改邪归正，变成模范家长和遵纪守法的农民。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然而它那一幅幅充满浪漫色彩的画面却引起众多读者的兴趣。这部作品发表后成为芬兰第一部畅销书，很快被译成19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但是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对该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有的说它是一部言情小说；有的赞赏作者的艺术功力；有的则说它是部生活教科书，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无疑，这部作品的主题是有积极意义的，教育人们弃恶从善，做一个奉公守法、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公民。作者在该书的前半部分对主人公奥拉维放荡行为的过分描绘和渲染，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

长篇小说《逃亡者》（1908）是林南科斯基的代表作品。内容叙述一个居住在海曼地区的农民乌德拉不幸婚姻的故事。他诚恳，善良，但是好虚荣，讲面子，羡慕富人的生活方式。他不顾个人的实际情况，与一个比他年龄小得多的出身于中等家庭的少女结为夫妇。婚后他才发现在这位少女身上已孕育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开始他感到惊讶、愤怒和悔恨，继而陷入深思和自我反省，最后表示谅解并决定成全他人的幸福生活。作者在这个小说中很少有对客观景物的描绘，而是以其纤细的笔触，层层深入地揭示出主人公内部心理演变的过程，从而在创作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林南科斯基集强烈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充沛的精神力量于一身，因此他是位思想家和实践家。他又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于一身，因此他是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作品中注重反映现实生活，然而往往凭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赋予作品以浓

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善与恶的斗争，但最后总是善战胜恶，正义占据上风。

F.西伦佩

弗·埃·西伦佩（1888—1964）小说家。他出生在佃农家庭。1908年进入赫尔辛基大学生物系学习，在大学期间加入艺术社，在艺术社活动中结识了一些芬兰社会艺术名流，通过与他们的频繁交往，西伦佩认识到文学艺术是无穷宇宙的一扇大门，从而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因家境日趋艰难，被迫辍学，返回父母居住的乡间茅舍。从此，他潜心从事创作。

西伦佩一生共发表了近20部小说，还写过不少杂文、随笔和游记。由于他出身贫寒，所以对芬兰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命运甚为关心。他的作品大都以自己家乡海麦库洛地区的自然风光为背景，抒发感情，烘托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气质。正是由于西伦佩出色地刻画了家乡农民的生动形象，以及在描绘农民与自然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湛技艺，他于1939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他的作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但是这突如其来的巨大荣誉，也使他在后半生中缺乏应有的冷静和谦逊，而以芬兰乡土文学的鼻祖自居。同时家中爱妻病逝，作家自己也身患心脏病，这种种因素使他的艺术才能未能持之以恒地得到发展，这不能不是作家一生的重大憾事。

西伦佩最早发表的长篇小说《生命和太阳》（1916）是描写青年人爱情生活的抒情作品。作者以亲身经历为主要素材，抒发成篇，感情丰富，文笔细腻。他在这部小说中注重描绘自然景色，以此烘托作品氛围，寓情于景，渲染气氛，增强了艺术效果。同时，作者对走向颓废堕落生活的青年人提出了劝告，鼓舞他们振作精神，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创建新的生活，迎接新的人生。作品的

基调是积极向上的。《生命和太阳》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才华及认识和概括生活的能力，因而引起芬兰文学艺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受到读者的热烈赞赏。

西伦佩在第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后的第三年，即 1919 年，发表了他的第二部重要作品《赤贫》。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对生活长期观察思考的产物，格调冷峻，与第一部作品的风格迥然不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刻画了一个孤苦伶仃、性格怯弱、屈服于环境的压力、自己无力驾驭生活的弱者的形象，他缺乏思想，随波逐流，糊里糊涂地卷入到战争的漩涡里，最后被战争的狂涛恶浪吞没。这部作品力图真实地再现客观世界，从中找出爆发战争和造成死亡的原因。它的主题意义深远，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欣赏价值，为作者在芬兰文坛享有崇高声誉奠定了基础。

西伦佩于 1931 年发表了他的力作《少女西丽娅》。作品叙述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少女，后来因家庭经济破产，父母双亡，自己沦为佣人，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故事。作者在这个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出身豪门的少女形象：她容貌美丽，体态轻盈，性格高傲，谈吐文雅，行为举止高雅不凡。当她由贵族小姐沦为佣人之后，依然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度，毫无自卑之感。她的去世，标志着芬兰贵族阶级最后的灭亡。作者为他们唱了一曲挽歌。小说通篇都是诗一般的语言，遣词造句如行云流水，韵味无穷，足以表现出作者驾驭芬兰语言的能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部作品发表后震动了芬兰文坛，同时引起国外读者的注目，给作者带来了国际声誉。

西伦佩创作的旺盛期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除了上述三篇作品外，作者在此期间还发表了中篇及短篇小说集《在大地上》等近 10 部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记叙了身边琐事，然而更多的则反映了芬兰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现实，描绘了他们平凡、辛酸的日常生活，展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农村社会的悲剧。作者为

处于饥寒交迫中的小人物的命运掬以同情之泪，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西伦佩热爱生活，热爱故乡的劳动人民。他勤于观察，敏于思考，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开掘创作题材，捕捉人物形象。他如同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挥动着五光十色的彩笔，勾勒出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在作品中不是单纯写景，而是与作品中主人公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相映生辉，以增强艺术感染力。西伦佩的语言功底非常深厚，读他的作品，如饮一杯浓茶，总觉得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吸引着你，使你不忍离去。到了 30 年代后期，西伦佩的创作达到艺术高峰，成为芬兰文坛上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他的一生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虽然他的作品大都是描写故乡海麦库洛地区的人和事，但是由于作者具有对生活异常敏锐的感受力，使他能够在较狭窄的创作范围内挖掘出众多的人生课题，揭示出复杂的社会现象，逼人思考，引人关注。当然，西伦佩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所以其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是消极的、被同情的受难者。他不能够从先进的思想高度刻画出积极的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形象来，这也证明了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仍不愧是一位杰出的乡土文学大师。

V. 基尔皮

沃尔特 · 基尔皮（1874—1939） 小说家。他出身于芬兰西南部古斯塔夫岛区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青年时代发表了《拔示巴》（1900）、《帕西法尔》（1902）和《安蒂诺乌斯》（1903）三部小说和散文集《人和生活》（1902）。三部小说都取材于中世纪圣经故事和古代神话，宣扬了爱情的狂热，具有新浪漫主义文风。基尔皮在散文集《人与生活》中阐述了人是为了自身而生存，人的真正价值根植于强烈的感情之中。因此基尔皮被认为是芬兰文坛情感美学的代表。基尔皮在早期作品中追求语言的华丽和表达的新颖，追求文章形式上的美，特别注重艺术

效果，有唯美主义倾向。

基尔皮在本世纪初发表了以上几部作品后，大约沉默了 30 年。其间专心致力于土尔库大学图书馆工作，偶而发表几篇文章，也大多旨在强调文化统一的重要性，与文学无直接关联。至本世纪 30 年代，他以崭新的面貌重返文坛，接连发表了三部小说，即《在阿拉斯家中的客厅里》（1933）、《岛区小农》（1934）和《去教堂》（1937）。这三部作品完全迥异于青年时代写的小说，真实反映了岛区农民和海员的日常生活。作者在创作手法上有新的突破，在作品中大量采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等现代艺术方法，在遣词造句方面也刻意求新，往往赋予新的构词或句型以多种含意，这是当时芬兰其他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基尔皮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同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艺术风格很接近，但是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在阿拉斯家中的客厅里》这部长达 900 页的作品中，作者叙述居住在古斯塔夫岛上的主人们相聚在布置讲究的大厅里共同商议建造船坞的事。他们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达成了协议。但是作者通过主人们的相互交谈、内心独白和回忆却反映出时代历史风云的变幻与现实存在的诸多矛盾，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容量，使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一部内容极其充实的巨作。在短篇小说集《岛区小农》中，作者以犀利而诙谐的笔触勾勒出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图像：他们面临着小农经济破产的局面，或恐慌忧虑，或听天由命，或极力抗争。长篇小说《去教堂》反映了贫苦的农民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的情景。他们最后把生之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脱。后两部作品格调低沉和苍凉，其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角色。

M. 塔尔维奥

玛依拉 · 塔尔维奥（1871—1951）女小说家、社会活动家。她

出身于哈尔托拉教区一个牧师家庭，受过中等教育。她从 19 世纪末开始写作，一直延续到本世纪 50 年代。一生共发表 40 多部作品，计有小说、戏剧和演讲集等。同时还翻译了世界文学艺术大师屠格涅夫、易卜生和密兹凯维支等人的名著。

塔尔维奥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积极支持慈善事业，主办文艺沙龙，是新浪漫主义时期著名诗人科斯根涅米的志同道合的密友和支持者。她针砭时弊，不留情面，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代表作家敏娜·康特的刚烈性格。她受其丈夫——斯拉夫语言和文学教授米科拉的影响，曾撰文评述俄国统治波兰和立陶宛的文章，并熟识了上述两地区的文学。她晚年倾向德国文学，如同科斯根涅米那样，对德国的文化政策表示赞赏。

塔尔维奥早期的作品富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她注重描述芬兰农村残存的陈旧劣习，如酗酒等现象，以及那里存在的佃农问题。她认为造成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一些头面人物精神和道德的堕落，而广大平民则是勤劳的和善良的。所以在她的作品中，一些普通农民代表着健康的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力量，而一些所谓有文化知识的农村老爷们则是一群腐朽的败物。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黑暗庄园的陷落》（1901）和《尤哈·约乌西阿》（1903）。

后来塔尔维奥把创作视野由农村转向城市，反映出边远城市的真实面貌。她描绘了居住在边远城市中的贫苦市民和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状况，暴露出社会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不平等现象。作者刻画的人物形象有多种风姿：他们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文化修养，有年老的和年轻的，有善良的和品行不端的。作者特别注重刻画一些具有浪漫主义作风、心灵呈现病态的人物。他们对现实不满，但是又无所作为，浑浑沌沌的度日，放荡不羁的生活。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夜鸟》（1913）和《尼尼伯的孩子们》（1915）。

塔尔维奥发展中期最优秀的作品当属长篇小说《生活的面目》（1916）和《夜之眼》（1917）。这两部作品共同的特点是侧重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作者的创作视野由事物的外部特征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注重塑造人物的灵魂。长篇小说《生活的面目》是通过一位母亲对其女儿婚事的错误处理揭露生活的虚伪性。行将就木的卡列尔是一位邮差的遗孀，她生过好几个孩子，但是到了风烛残年后，其他孩子相继去世，只剩下一个仍未出嫁的女儿丽娜与她相依为命。卡列尔一生屈从于别人的意志活着，她庆幸自己在临终前还有权操办女儿丽娜的婚事。女儿丽娜曾与一个面包师相爱，却遭到她的拒绝。一次作风轻浮的艺术家蒂根登门来访，此人仪表堂堂，被丽娜的母亲一眼看中，于是把身边唯一的爱女许配给他。谁知这位艺术家荒唐、轻浮之极，经常陶醉在美女、金钱的幸福中，把丽娜玩弄够后便弃置门外，使之陷于绝境。卡列尔一生屈从于别人的意志，她离世之前却让女儿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她固执己见，独断独行，分不清苦甜和伪真，往往把咸盐当做白糖，把谄媚当做真诚，以致葬送了女儿丽娜的一生。作者在小说中大量采用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艺术方法细致描绘了女主人公卡列尔的心理发展轨迹，从而进一步揭示出造成丽娜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另一部长篇小说《夜之眼》主人公是一位年迈的医生卡依伦尼乌斯。他身材短小，孤身一人，语言锋利，但心地善良，对生活持虚无主义态度。正如他内心独白所云："我们来自梦中，我们在这地球上生活在梦中，我们也将走入梦中。梦就是最大的现实。""梦中生命和死亡共存，谎言和真诚共生。梦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世界。梦是水，它可以洗涤罪恶。梦是火，它可以抑制欲望。"作者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她对现实生活持有一种否定态度。这代表了当时芬兰知识文化界人士普遍存在的思想状况：虚无渺茫，消极悲观。在上述两部作品中作者在创作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成功，因

而受到当时文学评论界的一致赞扬。

塔尔维奥在芬兰独立后的年代,把笔锋深入新的创作领域。芬兰独立后的国内建设事业鼓舞着她反映现实状况。这个时期，她创作的优秀作品有长篇小说《鹤》（1919）和《教堂的钟声》（1922）。作者在这两部作品中交叉采用浪漫和写实的艺术手法,唱出了一曲富有爱国激情的颂歌。

塔尔维奥在晚年致力于历史小说的创作。她先后写出反映首都赫尔辛基历史的三部曲《波罗的海的女儿》（1926—1936）和反映历史城维亚波里失守的《城堡中欢乐的夫人们》（1941）。它标志着芬兰历史小说创作日臻完善和成熟。

综观塔尔维奥一生的众多作品，可以发现她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和严格的道德论者。她的作品尽管有结构松散和夸大描写事物之嫌，但却具有雄辩性和启动人心的力量。她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性格突出，别具一格。她在创作艺术上不断求新，表现手法不拘一格，语言丰富多彩，新颖生动。因而其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拥有相当多的读者。这也是她在芬兰文坛立足脚根的所在。

第四节　新时期的瑞典语文学

在芬兰文学中，包括芬兰语文学和瑞典语文学两大部分。在19世纪以前它们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无论是以芬兰文或以瑞典文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都致力于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但是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瑞典语文学逐渐脱离开芬兰文学，走上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K. 塔瓦斯舍尔纳

卡尔·塔瓦斯舍尔纳（1860—1898）是与作家阿霍同一时期

的小说家和诗人。他早期发表的诗集《晨风》（1883）文词优美，格调轻松，富有激情，颇具浪漫主义特色。他后来接连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童年之友》（1886）和《艰苦的岁月》（1891）。前者叙述一位出身豪门的青年在大学期间不平凡的经历。后者通过描述一个芬兰佃户被谋杀的故事，展示了19世纪60年代芬兰发生大饥荒的情景。这两部作品都立足于现实，从而奠定了他在芬兰文坛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

但是塔瓦斯舍尔纳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又不同于同时期的芬兰语的现实主义作家。他长期侨居国外，自诩为世界主义者，并经常为“语言和祖国”问题感到困惑，也往往为寻求“落根地”和“民族意识”而陷入苦恼。失落感和孤独感时常伴随着他。他这种感情在后来发表的小说《没有祖国的爱国者》（1896）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他在这部小说里刻画了一个寻找自己归宿和民族意识的青年。实际上这个青年人就是作者自己。

塔瓦斯舍尔纳作为诗人，一生共发表了五本诗集。其中较为优秀的集子是《诗歌》（1896）和《月桂树》（1897）。他创作的抒情诗情感深厚，语言娴熟，寓意深刻。在瑞典语诗人当中只有他能够与当时的瑞典优秀诗人相比美。他早期创作的诗歌就显示出一定的才华，特别是爱情组歌《初恋》曾被芬兰音乐大师西佩利乌斯谱成歌曲。同时他开创了瑞典语诗歌创作的新领域：海洋和岛屿。他经常抒发对海洋和岛屿的爱恋之情，但格调是忧伤的。在《诗歌》这部诗集中包括一部分自传体的叙事诗歌。作者曾根据这些诗歌的题材又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小卡尔》（1897）。还有一部分诗歌，如《我的周围多么寂静》、《葬钟已敲响》和《影子岛》等抒发了诗人暮年郁闷的心情。但是诗人在《芬兰人的芬兰》这首诗中则义正词严地表示：

“芬兰人的芬兰，
我严厉的继父，
我永远不可能
成为你的家奴。”

诗人晚年在芬兰的波里城居住期间对语言问题更为敏感。他在那里生活得很不融洽，自认为生活在芬兰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变成了“鬼岛上的俘虏”。在《月桂树》这部诗集中，诗人叙述了一个芬兰诗人的遭遇。另外，在爱情组歌《献给狄安娜的歌》中，诗人通过对古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狄安娜的描绘，展现出世间存在着的错综复杂的爱情关系。

诗人塔瓦斯舍尔纳去世后，在他的遗稿中发现这样四行诗句：

“还我语言和国家，
还我爱的权利，
还我落根之地，
让我奋斗到底！”

这四行诗句是宣言，也是号角，它鼓舞着瑞典语文学的年轻一代踏上新的征途。

A. 姆尔奈

阿尔维德·姆尔奈(1876—1946) 诗人。在1899年发表的第一部诗集《格律和韵脚》中，有一首题为《两种曲调》的诗。他在这首诗中指出了芬兰语诗人和瑞典语诗人唱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曲调：前者以委婉、纤细的声音讴歌芬兰内地平静的森林和田野；后者以粗犷顿挫的情调赞颂浪涛汹涌、礁石嶙峋的海岸奇景。诗人姆尔奈再也不像塔瓦斯舍尔纳那样认为自己是“没有祖国的爱

国者”了，他把操瑞典语居民集结的西南海滨乌西玛地区视为养育他的国土。诗人甚至为了在该地区发展瑞典语的文化教育事业担任了 10 年成年教育学院院长，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姆尔奈在政治上迥异于众多的瑞典语作家。他支持左派组织，参加工人运动。在芬兰工人大罢工的岁月，他主持过在赫尔辛基铁路广场召集的工人集会并发表演说。他也曾以人民代表团团长的身分上书俄国总督，要求他辞职。他在这时创作的诗篇中欢呼新时期的到来：“在工厂机器轰鸣中听到新时代的歌唱。”他作为一名政治诗人在此期间是很活跃的。然而随着工人运动的澎湃发展，工人与政府当局矛盾的日趋激化，他内心感到恐慌，逐渐疏远了工人运动，投身于农民的怀抱。 1918 年大革命前夕，他在一首《致红旗》的诗中宣称向红旗告别，因为“它沾染了血迹”。他没有参加国内战争，但对战争所造成的分裂局面深感惋惜。他当时热衷于保卫操瑞典语人的权益。他写的小册子《操瑞典语人的国土》被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因而他被誉为瑞典民族的真正诗人。

姆尔奈一生共出版了约 20 本诗集，其中很难断定哪一部是他的代表作品。诗集《新时代》（1903）、《死亡的岁月》（1910）、《岛上的春天》（1913）、《夏夜》（1916）和《秋歌》（1919）勾勒出诗人创作发展的不同阶段。总的说来，诗人讴歌的对象是海岸和岛屿，并赋予它们以象征意义。海岸和岛屿象征瑞典族居民的国土，而浪涛、岩石和大树则象征着其居民的性格、意志和生命力。诗人感觉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瑞典族的势力日趋削弱，但他不像塔瓦斯舍尔纳那样消极悲观，而是在严酷的环境中讴歌生活中的积极因素。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来临，接连发表两部诗集《北大西洋的风暴》（1937）和《玛尔斯火焰在海上燃烧》（1939），对纳粹德国的军国

主义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B. 格瑞普伯克

伯特尔·格瑞普伯克（1878—1947）诗人。他早期发表的诗集《花格大门》（1905）、《玫瑰城》（1907）和《黑色十四行诗》（1908）具有象征意义，多抒发对生活的享受和肉体感官的快乐，以艳丽诗人闻名。后来他亲身经历了爱情的痛苦，因而诗歌的格调变得低沉和忧伤。他也感到瑞典语诗人的处境受到威胁，他认为这是社会种族问题造成的。他确信瑞典族是高贵的民族，理应在芬兰受到特殊的尊重。瑞典族居民为求得生存的斗争亦即高贵的上层阶级与来自下层的威胁的斗争。他在诗歌中反复使用“尊严”和“勇敢”这样的词语，把瑞典族居民等同德国英雄，要“战死在西方文明的前哨阵地”。

格瑞普伯克在1918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知音——芬兰国内战争的胜利者白军。内战使他从个人的伤感和孤独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也促使暂时放弃了狭隘的民族利益。他积极投靠白军，成了他们的御用诗人，最后成为高唱战斗进行曲的“冷酷的浪漫主义者”。

格瑞普伯克晚年创作的诗歌《死神在召唤》流露出暮年的空虚感和孤独感。他在诗中写道：

“民族和国王，
英雄和草包，
牲畜和家禽，
究竟在哪里？
一些竖琴演奏家，
究竟在哪里？
呵，死神的号角已响起。”

E. 索德格朗

伊迪丝·索德格朗(1892—1923)女诗人。她在 1916 年发表的集子《诗歌》是令文学批评家难以理解其全部含意的作品。这部无韵的朦胧诗集的出版震动了北欧诗坛，揭开了北欧诗歌的新篇章。

诗人索德格朗早年在彼得堡德语学校读书并用德语发表诗歌，后因身染肺病去瑞士疗养。她在疗养期间熟识了盛行于欧洲的新的文学流派，如法国的象征主义、俄国的未来主义和德国的表现主义。欧洲现代派诗歌对她影响很大。但是，她在诗歌创作中不是单纯模仿任何一种流派，而是创造性吸收各派之特点，以独具一格的诗风问世。索德格朗在以后发表的诗歌中，第一次在北欧实践了英美现代诗歌中的一支流派——意象主义在宣言中所提出的三点要求，即直接表现客观事物，删除一切无助于“表现”的词语，以口语节奏代替传统格律。当然，这对北欧诗坛当时仍以恪守传统格律为基本准则的现象不啻是一种挑战和超越。因此她的诗歌引起北欧诗坛众多人士的非议。然而年轻的女诗人对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和批评置若罔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和自信，仍然我行我素，在诗歌创作领域大胆革新，独辟蹊径。

索德格朗短暂的一生处境极为艰难。在俄国大革命期间她的家庭遭到破产，后来举家由彼得堡迁到坐落在俄芬交界的卡累利亚地区的古老庄园居住。贫病交加伴随着她的一生。最初她感到绝望，屈服于社会环境的压力，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悲伤。她发表的第一本诗集《诗歌》抒发了这种郁闷伤感的心情。后来发表的三本诗集《九月的竖琴》(1918)、《玫瑰祭坛》(1919)和《未来的阴影》(1920),反映了诗人对死亡,从屈服到反抗、到接受、到升华的心理历程。她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很深，自尊自爱之心很强，她后来从大自然中去寻求心灵上的解脱，去开阔她的受压抑的胸襟。她在此间创作的诗歌中自诩为“女王”，要“解放整

个世界”，充满了乐观和自信。她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首诗中，把自己居住的花园描绘成迷人的花坛，人类的苦难和冲突融化在花草之间，大自然的一切景象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的世界，无限纯洁和美好。这充分显示了诗人生前对美好人生的追求。然而自然规律毕竟是不可抗拒的，严重的肺病终于夺走了这位才华正茂的年轻诗人的生命。诗人去世两年后，她的最后一本诗集《虚无世界》（1925）得以出版。她在这本集子中预测到自己生命的短促，不久将离开人世，重又浮现出怅然若失和伤感的情调。

H. 奥尔逊

哈卡尔 · 奥尔逊（1893—1978）女诗人。她是诗人索德格朗的志同道友。当年轻的女诗人索德格朗陷入四面楚歌的危机关头，是她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支持这位受难者。她积极主张对瑞典语文学进行革新。她认为文学是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东西，必需对它进行持久的探索，使文学保持一种不屈不挠、不断创新及不受任何约束的永久活力。她竭力反对对文学进行某种科学的规范。

作家奥尔逊这种对文学无止境的探索精神也反映在她一生发表的众多的长短篇小说中。如富有表现主义特色的长篇小说《季列米阿斯先生寻求幻觉》（1926），描写少女成长的长篇小说《智达姆包》（1933）,诗体小说《卡累利亚的行吟诗人》（1940）和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梦幻小说《刺绣》（1944），它们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浪迹在尘世上的探索者，他们知道美好生活的主流在身边潜藏着，随时都有找到的可能，然而必须耐心等待。正如她于196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归家》中一个主人公所说的：“我很奇怪，为什么所有的人就不懂得这个秘密……我知道，这个秘密一旦被发掘，生活就会变得像童话般美好”。

小说家奥尔逊的一生正是不断寻求通往人生真谛的道路。

E. 迪克托尼乌斯

埃尔曼 · 迪克托尼乌斯(1896—1961) 诗人。他熟知芬兰共产党创始人库西宁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通晓在欧洲流行的新的文学流派——意象主义和表现主义。他在诗歌创作中强调运用新流派的表达方法，主张打破传统的格律。他最初是以作曲家而闻名的，因此他的诗歌富有音乐特色，节奏感很强，言词激烈而明快。

迪克托尼乌斯早期发表的歌集有《竖琴》（1922）、《烈焰》（1924）和《煤》，犹如火山欲将爆发，充满了一种炙人的力量。他具有激进的社会观点，第一次在诗歌中抨击资产阶级和经院式的美学观念。他在《人不能貌相》一组诗中这样写道：

“骑士风度与我无缘，
我不是在决斗，
而是在冲刺。”

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某种原始的暴力冲动，其诗歌题材也多与野兽、地震、暴风雨等有关。构成诗歌的基本因素是运动，他有一组诗的题目就是《速度》，没有动态的描述就意味着死亡。他在诗歌中自封为‘暴风雨的魔鬼”，能‘推翻地球，射中太阳”。然而，他在另一首诗中则写道：

“我的脸在黑暗中哭泣，
尽管我知道，
自己是一块花岗石。”

这就反映出诗人的诗歌不仅具有刚毅的一面，正如他另一部诗歌选集的名字《小草和花岗石》，所揭示的还有小草那样温顺的

一面。他对大自然、对爱情、对陷于困境的弱者是温顺的。迪克托尼乌斯公开表示同情穷苦的人民和 1918 年内战中的牺牲者。他曾写过关于两种英雄坟墓的诗，以对在战争中倒下的白军和赤卫队战士的怀念。同时诗人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也是非常关心的。诗人晚年创作的作品,如《土地和云》（1934）等仅限于抒发对自然界的树木、花草和土地的爱恋之情，与早期棱角分明、刚毅泼辣的诗人形象迥然不同，这时的诗人已成为大自然的宠儿。

第五节　工人文学

芬兰工人运动的历史比较悠久，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就已经形成一股自觉的政治力量。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开始产生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学——工人文学。特别经历了 1905 年大罢工之后,工人文学出现了空前的高涨。但是在 1918 年国内战争期间，由于红色赤卫队遭到失败，致使一些颇有才华的工人作家或被白军杀害，或被长期监禁，更有一部分作家流亡到国外，主要到苏联、美国和瑞典。至于仍留在国内的工人作家也被迫转到地下活动。因此，当时工人文学受到暂时的挫折。

芬兰专门研究工人文学的理论家拉乌尔 · 巴尔姆格伦写过一本《工人文学》（1965） 的书。他在书中就工人作家的写作题材、写作风格及读者范围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他研究过的 150 名工人作家中有三分之一不是出身于工人家庭，是由芬兰上层阶级或知识界的人物“转变”而来的；有三分之二均来自工人家庭。大多数作家出身贫穷，都是靠自学成才的，并且具有丰富的工作和斗争经验。他们所写的题材不外是有关工人生活和斗争的经历，语言新颖生动，形式自由，结构自然。他们观察和分析问题都是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的。特别是工人诗歌富有战斗性，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受到广大劳动者的普遍欢迎。此外，芬兰工人文学还有一个

显著特点，即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都亲自从事文学活动，而且还翻译过不少外国进步的战斗歌曲，如《国际歌》和《华沙进行曲》等。

O. 库西宁等人

奥托·库西宁（1881—1964）在内战之后移居苏联，后加入苏联国籍，并曾任苏共高层领导。他早年创作的两首诗歌《爆破筒》和《太阳之歌》在历次出版的工人诗选上均被选入。他对美学感兴趣，在诗歌创作中追求美的艺术效果。他曾以书信的方式指导过瑞典语现代派诗人迪克托尼乌斯的早期创作，并享有“芬兰的卢卡契”之美称，成为芬兰著名的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家。

西洛拉（1876—1936）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和小说。莱托麦基（1886—1935）则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名著，是著名的工人文学翻译家。工人作家中年龄较大的玛蒂·库丽卡（1863—1911）属于19世纪80年代青年芬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她在坠入空想社会主义者之前，发表过反映社会道德问题的剧本《阿依丽》（1887），剧本上演后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瓦曼巴斯-海尼宁（1873—1937）是个多产作家。其作品内容涉及面广，跳跃性大，主人公的面貌有的不够清晰。他本人在许多方面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丽娜玛-珀西宁（1876—1935）是妇女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和很受欢迎的女诗人。她从1900—1926年间共出版了7本诗集，还发表了为数甚多的翻译文稿。她的作品思想性强，具有较大的启迪力量。此外，芬兰很多工人运动中的领导者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国际社会主义战斗歌曲的影响。

K. 卡特拉

真正的工人诗歌是伴随着1905年的工人大罢工运动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的最优秀诗人是科西·卡特拉（1882—1928）。他的诗歌创作始于1903年，早期受大诗人雷诺的影响较深，诗歌中

含有一股社会激情，但是类似标语口号。如在《听听人民的声音吧》这首诗中写道：

“听听人民的声音吧！
它如同闪电雷鸣，
划破漫漫夜空！
穷人，上帝和正义，
要求听到这种声音！”

随着 1905 年大罢工浪潮的翻滚，诗人卡特拉在其中受到锤炼，诗风变得深沉、有力。他在诗歌中高度赞扬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严厉痛斥沙皇俄国对芬兰的剥削和压迫。同时大胆揭露社会弊端。他在《伟大的日子》这首诗中写道：

“一天一夜，
发生巨变，
现在创造的新事物，
胜过以往一百年。”

在另一首《金色的青年》诗歌中，对资产阶级青年大胆而直率地进行了质问：

“金色的青年，
油头粉面，
你可知道，
养育的价值？
你可知道，
谁的乳汁把你养大？

谁用科学知识，
把你武装起来？

是谁把你推上
艺术的殿堂？
是谁让你
过上优越的生活？
……
是人民呵！
正是人民。”

诗人在后来创作的诗歌中把人民和工人等同起来。

1917年的大革命浪潮把诗人卡特拉推向第二个诗歌创作高峰。他满怀革命豪情，高声歌唱红旗，歌唱自由和解放，歌唱新时代的到来。他在国内战争期间逃往瑞典居住，直至晚年。在瑞典期间他发表过一些格调较为低沉的散文和诗歌，对工人赤卫队的惨败表示惋惜和同情。有时他以幽默的情趣来揭示战争的残酷，如他在一首题为《地衣时代》的诗歌前半部分描绘人类由猿到人的发展过程，后半部分则描述由于战争毁坏了一切，世界重又恢复了“原始的面貌”，人类又变成了“四肢爬行的动物”，栖息在树干上，以“地衣、野兽为食”。诗人最后在一首《别人在歌唱》的诗歌中明确指出，别人是在为“个人而歌唱”而诗人自己则是为“广大群众及其神圣事业”而歌唱。无疑，这是卡特拉诗歌的灵魂所在。诗人一生始终与人民患难与共，关心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反对战争，拥护和支持进步事业。他的诗歌鼓舞着人民特别是工人的斗志，化为他们争取美好前途的行动力量。

K. 阿玛拉和 K. 唐图

诗人科西 · 阿玛拉(1889—1918)和卡斯皮尔 · 唐图(1886—1918) 在国内战争期间均被白军杀死。他们创作的题材范围与卡特拉的作品相同。其内容是反对邪恶，支持正义的事业，重点是揭露社会的弊端和反映工人的生活。诗人阿玛拉的作品生前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只是在他牺牲后被人装订成册加以出版。诗人唐图的早期作品属于新浪漫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诗歌才转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如《我是铁匠》这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工人的自述，读来亲切感人。

K. 乌斯凯拉等人

有一些工人诗歌作者的武器是讽刺，故谓之讽刺诗人。卡洛 · 乌斯凯拉（1878—1922） 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版的诗集《野苹果》 (1912)和《脱缰的野马》 (1921) 充满讽刺和幽默。在诗集《野苹果》中，有一首滑稽的诗歌《王国和附属国之歌》。歌词开始写道：

“侵吞芬兰的人，
居住在彼得堡。
有一次他做了个梦：
俄国成了附属国，
芬兰却成了王国。”

乌斯凯拉还创作了不少反对宗教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认罪》诗是这样开始的：

“如果我吃和喝

就是犯罪
——生存等于罪恶。
如果我的发明
就是犯罪
——创造等于罪恶。
那么构不成犯罪的
只有圆圈——〇。”

在国内战争期间，乌斯凯拉还创作出《革命》和《审判的号声》等强有力的诗篇。

另一位诗人艾尔莎·巴沃-卡里奥(1858—1936)在讽刺诗歌的创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她于1906年写出的《新国歌》催人泪下，歌词开始是这样的：

“呵!芬兰，
您是贫穷弱小的国家。
您的肢体被分解，
并且惨遭压榨。”

工人文学中大部分是诗歌，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小说、散文和戏剧。芬兰创作反映工人问题和阶级对抗的戏剧作品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剧作家敏娜·康特。后来艾尔维拉·维尔曼(1879—?)创作的剧本《吕丽》(1903)在芬兰国家剧院上演获得成功。剧中女主人公吕丽是一位工人的女儿。她与一个出身豪门的纨袴子弟彼尔根结为夫妇。但是彼尔根生性放荡，沉溺女色，见异思迁，婚后不到三年便抛弃了吕丽另就新欢。对此，吕丽毫不示弱，冷静果断，并声称自己负责赡养生下不久的婴儿。作者树立了一个不畏强权、独立不羁的新的女性形象。工人剧作家维尔曼在以后创

作的剧本中始终没有超出《吕丽》剧作的水平。如1907年发表的剧本《在地下室里》反映赫尔辛基城贫苦女人的卖淫生活。作者注重情节的渲染，意在揭露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但是流露出自然主义倾向，社会效果不够理想。国内战争期间她移居苏联，从此几乎停止了创作。

赫达·蒂莱（1870—1944）女小说家。国内战争期间她移居苏联。她注重社会现实的变革，反映工人、妇女和社会道德诸问题。处女作《莱妮》（1907）描述新世纪给芬兰偏僻农村带来的变化。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森林村》（1909）、《上帝的宠儿》（1911）和《赫玛,生活的童话》（1913）则揭示农村无产者的生活和命运。她在国内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人们》对社会持有严厉的批判态度，展现出社会上存在着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内战爆发之后，她移居苏联。蒂莱在苏联的卡累利亚地区于1934—1936年间创作了分为上下两部的鸿篇巨作《树叶变了》。它反映十月革命前夕在俄国农村发生的变革，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风，当时受到苏联文坛的注目。

康拉德·莱赫麦基（1883—1937）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工人作家。他出身佃农，当过面包工人、新闻记者、芬兰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国会议员。他创作短篇小说，共出版了《沟壑》（1910）、《深层》（1915）、《死亡》（1911）和《地狱》（1919）等多本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多以死亡为主题，而形成死亡的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如贫困、疾病、政治迫害和绞刑暴力等。作品格调低沉，滞重，充溢着一股悲愤的力量。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

莱赫麦基的代表作品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出的长篇小说《走出深渊》（1917）。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给未来的世界绘制出一幅多彩的蓝图：叙述未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战争及由此而导致的世界大革命，最后建立起一个以世界各民族为兄弟的联合国。整个作品富有理想主义色彩。这在当

时悲观绝望的情绪充溢芬兰文坛的情况下，不啻是一付兴奋剂。

莱赫麦基晚年发表了自传体两卷本长篇小说《战斗者》（1922—1924），叙述了芬兰工人阶级的成长历史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

第六节 新文学团体“擎火把者”

芬兰取得独立后不久，约在20世纪20年代最初几年，由一些热爱文学事业的青年人共同成立了一个文学组织“擎火把者”。他们出版了《擎火把者文集》，创办了《擎火把者报》。在报纸创刊号的社论中这样写道：“生活是神圣的，我们热爱生活。艺术是神圣的，我们献身于艺术事业。任何纲领不会持久保持下去，任何真理不会是永恒的。生活的目的是进行不断的探索。因此，我们目前唯一的宗旨致力于精神解放和一切言论和思想自由。我们不承认任何权威，他们在生活面前是懦夫。展望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年轻的朋友，挺起胸来，砸掉束缚在你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创建伟大的新生活。”

这是芬兰独立后一代新人的宣言书,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跃动着一股青春的活力。他们情绪饱满，思想解放，相信年轻的共和国，寄希望于未来，特别关注在文学和科学领域出现新的气象。他们共同的口号是“打开通往欧洲的窗子”，反对闭关自守。当时他们把视线瞄准法国和德国。在“擎火把者”组织中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和小说家，他们以不同的艺术手法，绘制出色彩纷呈的人生图画，使20世纪20年代的芬兰文坛大放光辉。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达到瑞典语女诗人索德格朗的艺术水平，他们的艺术主流不过是实现了表现主义的芬兰化。因为“擎火把者”组织内部缺乏严格的纪律和统一的行动纲领，作家之间团结涣散，各行其是，所以该文学团体没有维持几年就自行解体。其

中一些社会激进分子后来加入了 20 世纪 30 年代组成的左派文学团体“基拉社”。

K. 瓦拉

卡特丽·瓦拉（1901—1944）女诗人。她出身富足家庭，师范学校毕业后任中小学教师多年。她的性格、气质、写作方法和命运遭遇与瑞典语现代派女诗人索德格朗极为相似。自由格律是她一生诗歌创作中的表达方式。她在给友人的信中称“狂喜和悲伤”是她自由体诗歌的柱石，形成她一生诗歌的基调。

诗人瓦拉的早期作品，如诗集《远方的花园》（1924）、《蓝色的大门》（1926）和《渡口》（1930）感情澎湃，热情奔放。她赞颂光明、温暖和象征着生命力的夏天，早晨“太阳的喊声”把她唤醒，她沐浴着夏天的“注满温暖的阳光”。诗中重复运用“美妙的”、“五光十色的”、“绚丽多彩的”、“令人炫目的”等形容词。这种散发着浓郁的夏天气息的诗篇很难想象是出自生长在荒僻的北国拉毕地区的女教师之手。

瓦拉歌颂光明和幸福，但是她也抒发伤感之情。这时在她的诗中描绘出一幅萧瑟的秋冬图画，夏天的温暖消散了，她的手触到的是“冰冷的枯死的树叶”。她的感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温柔忠厚的女诗人面对着不安全的世界产生了忧伤的心情，原来的狂欢变成了悲痛。女诗人这种感情的变化在她后期发表的诗集《回归》（1934)和《橡树在燃烧》（1942）中充分得到展现。

在政治冲突尖锐的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诗人瓦拉转向左派，她在诗歌中批判社会弊端，捍卫人权和同情穷苦的弱者。她成为进步力量的保卫者和战斗者。

诗人瓦拉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美化环境的花匠，在她的抒情诗中历来就包含着自我审视和尊重生活，在她后期色彩暗淡的诗歌中亦是如此。她不是一边倒的诗人，更不是政治诗人。她希望成

为他人的“柳笛”和“小桥”。她的主张很简单：“活着比死了好”。她始终沉醉于童话和幻想，追求理想的生活。在她后期的诗歌中，令人震惊地发现，热爱生活和温暖的女诗人如何以描绘冬天的画面来揭示人世间的冷酷。

诗人瓦拉在大战后期因肺病死于瑞典。她一生是一场悲剧，然而她既不夸张也不欣赏这场悲剧，也从未打算以虚无缥缈的诗句来装饰它。她不愿意歌唱“闭着的双眼”，更留恋于生活。她拒绝接受烈士的花冠，尽管她一生的追求理应如此。

U. 卡依拉斯

乌诺 · 卡依拉斯（1901—1933） 诗人。他具有本世纪 20 年代芬兰抒情诗人的典型特征：疾病、贫穷、短命、性格内向及热衷于探讨宗教伦理道德问题。他借助生母的遗金只读完两年赫尔辛基大学之后便以写作自谋生路。 10 年内共出版了《风和穗》（1922）、《船工》（1925）、《流盼》（1926）、《赤脚》（1928）和《梦和死》（1931）5 部诗歌集。早期诗歌受德国表现主义抒情诗的影响，形式自由，节奏鲜明；后期诗歌仿效法国古典主义诗歌的格式，诗句洗练、严谨和精确。

卡依拉斯诗歌创作范围比较狭窄。他一生自始至终在探寻人生的正确途径，他的绝大部分诗歌的内容是严肃的自我审视，只有一小部分诗歌是讽刺官场歪风和对祖国的赞颂。在上述诗集中几乎找不到单纯歌咏爱情和大自然风光的诗篇。卡依拉斯的内心充满着矛盾，经常是痛苦和忍受、反抗和怀疑并存。萦绕在他头脑的中心问题是人们的犯罪、受难和死亡。 他认为，人们在患难中是同病相怜的兄弟；人们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其理想和行动相矛盾造成的。他希望通过自我审视来诱导人们的理想和行动趋向统一，从而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但是他把自我审视的焦点集中到宗教伦理道德的范围，主张人们在犯罪之后经过受难、顿悟、忏

悔，纯洁心灵而走向新的人生。诗人的这种主张在诗歌《赤脚》、《罪人》、《落网》和《房屋》中得到了充分的宣扬。

卡依拉斯晚年陷入极端的悲观主义。他的诗歌题材新奇而陌生，描绘了一个奇特的世界，一个接近死亡的世界，一个活动着幽灵和魔鬼的世界，一个令读者恐怖的世界。但是，诗人赋予这古怪的题材以严谨、洗练的诗歌格式，从而增加了读者对诗歌的审美趣味。这特别表现在后期创作的诗歌《在边缘》、《驭手》、《死者》、《小提琴》和《梦》中。

卡依拉斯正值青春年华，却以冷峻的态度探讨人的生与死的重大问题，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应该说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时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找出正确的答案，他的诗的格调始终是低沉、忧伤的，他的精神经常是痛苦的，导致诗人肺病的日益加重。最终病魔吞没了这一年轻的天才诗人。

A. 海拉科斯基

阿洛·海拉科斯基（1893—1952） 诗人。他出身奥卢城一书香门庭。他在大学攻读自然科学专业，但对诗歌有特殊爱好，从此一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早期发表的诗集《诗》（1916）、《无题歌》（1918）、《我们两个》（1920）和《冰镜》（1928）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战斗的激情。他以挑战的姿态走向社会和人生。向一切传统观念宣战；同时标榜以自我为中心。虽然他在当时注意了解文学中的各种流派的发展动向，但在诗歌艺术上他不追随任何流派，而独辟蹊径。诗集《冰镜》标志着诗人的创作已走向成熟，其中有不少诗篇如《春天乘火车旅行》、《观察到的》和《狗鱼之歌》等都是精品。其结构新颖，语言奇特，独具特色。诗人早期诗歌的基调为悲观主义，而只有从爱情、家庭幸福和大自然中找到暂时的慰藉。因此在上述几部诗集中，也包括数量可观的咏赞爱情和大自然的优秀篇章。他大学毕业后以搞自然科学工作

为糊口职业，经常“徜徉在森林中，栖息在松树下”，并以艺术家的眼光欣赏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每每激情潮涌，陶醉其间，挥笔而就。

从 1928—1941 年海拉科斯基搁笔多年，专心致志从事自然科学的教学工作。然而硝烟弥漫的客观世界终于使他不得安静，于是他重操旧业。他在以后短短的 10 年当中连续发表了《新诗》（1943）、《晃动的船头》（1946）、《静悄悄》（1949）、《组诗》（1952）和《明天是美好的》（1953）5 部诗集。这段时间是诗人创作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诗人摆脱了以自我为中心，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他在《自我画像》这首诗里把自己比作一条“痛苦地脱了千层皮的昆虫”。在另一首《精神祈祷》诗中，诗人认为在大千世界中人是微不足道的，人应该屈服于大自然这个上帝，宣扬了泛神论观点。

P. 穆斯塔珀

皮·穆斯塔珀（1899—1973）是“擎火把者”组织中别具一格的青年诗人。他不追随异国情调，始终保持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他早期创作的诗歌既受到国内民歌的影响，也受到国外现代派诗歌的浸染。如诗集《美丽眼睛之歌》（1925）和《雕鹗之歌》（1927）采用自由的格式，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他的诗歌中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写实与虚构相交织，展现出一幅迷人的世界。其中既包括耕耘大地的色彩和音响，如田野、花园、公路、山鹬和秧鸡的鸣啼；也包括广漠的荒原、森林小溪和小溪旁边开放着的粉红色的玫瑰花；既有受过相当教育的神父和僧侣，也有中世纪的大教堂。穆斯塔珀的创作视野是广阔的，艺术想象是丰富的。因为诗人自己出生在乡间，所以对农民既有深刻的了解，也寄予深厚的同情，特别关注农民的生活和命运。

穆斯塔珀作为民歌研究者，既熟悉国内古老的叙事诗和神话

诗歌，也通晓新型的民歌和田园牧歌，还了解外国诗歌。他从中吸取其精华，并把它融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所以他后期创作的诗歌异彩纷呈，多姿多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穆斯塔珀肩负着保卫祖国的重任重新操起旧业，先后创作出《告别阿尔卡迪亚》（1945）、《玫瑰花》（1947）和《捕野禽者》（1952）等诗集，诗中洋溢着饱满的战斗激情。同时诗人还写过讽刺诗篇《金黄色的寒鸦》和幽默小品《新衣歌》，亦庄亦谐，给人以启迪。

穆斯塔珀在诗歌研究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糊口职业是教学，从1932—1947年任赫尔辛基大学文学讲师，1947年晋升为大学教授，后来又成为科学院院士。他发表的主要专著有《芬兰古老诗歌世界》（1935）和《芬兰传说和咒语》（1946）等。

K. 萨尔基亚

卡洛·萨尔基亚（1902—1945）出身于基卡地区一农民家庭，与卡拉依斯是同一时期的抒情诗人，也是同命运共患难的战友。他始终活动在“擎火把者”组织之外，其创作的诗歌受法国帕尔纳斯派的影响，注重诗歌的语言美和形式美，具有严谨的结构、精确的语言、谐和的节奏和韵脚。他不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一生共创作出《羁绊》（1929）、《内疚》（1931）、《梦乡》（1936）和《命运的天平》（1943）4部诗集。此外，还翻译过一些法国抒情诗歌。

处女作《羁绊》抒发了萨尔基亚受疾病折磨的痛苦心情。死亡和对永恒宁静的渴望经常形成诗歌的主题。他这种忧郁、沉重心情只能从爱情和梦中得到暂时的安慰。他在诗歌中给自己创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以此来与严酷的现实相抗衡。

诗集《内疚》表达了萨尔基亚对生母的怀念之情。母亲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赋予了他善良、温柔、沉静、腼腆，近似少女的性格和聪敏的天资。母亲去世时他刚14岁，正进入初中二年级。母亲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诗人的脑海里。诗人满怀着伤感的

心情追忆着母亲的音容笑貌，抒发对她的深厚热爱之情。

诗集《梦乡》是萨尔基亚的成名之作，引起广泛的注意。诗人在这部诗集中对生活进行了哲理的思考：生活中的美和丑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诗人表明，将致力于美好的事物，厌恶丑恶的现象，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其思想内涵较前两部诗集要丰厚得多。同时这部诗集的语言艺术日臻成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同时期其他几位诗人望尘莫及的。

最后一部诗集《命运的天平》反映了萨尔基亚完全摆脱了个人的忧伤和烦恼，走向现实生活和人类。面临着残酷的战争，他对人类的命运甚为关注，这在他后期创作的诗歌中时有表现。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仇恨在增长，
罪恶在膨胀，
和善、友情一扫而光！
有人操起斧头，
要把兄弟砍伤！”

诗人萨尔基亚高声呐喊：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表现出高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它标志着诗人人生观的质的飞跃。

Y. 尤　翰

于尔约·尤翰（1903—1956）出身于工业城市坦伯累，是位性格孤僻的诗人。他素常态度严肃，少言寡语，对人冷淡，有“黑色珍品”之戏称。他青年时期发表的3部诗集《鞭痕》（1926）、《深渊》（1928）和《最后的包围》（1931）对社会提出了批评和挑战，富有战斗激情，但是在艺术表现上过于简单、粗糙，显得单调和直露，缺乏含蓄和深度。此后几年他放弃写作，全力

从事外国诗歌的翻译工作。他翻译过英国大诗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著名诗篇，从中受到艺术感染和薰陶，对自己以后的诗歌创作大有裨益。

从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尤翰进入壮年，连续发表了《雪中的十字架》（1937）、《朝圣途中》（1938）和《炼狱中的火焰》（1941）等诗集。诗人经过很长一阶段的社会实践，亲自感受到人生路程的艰辛，充满了悲观情绪。这种情绪在上述诗集中均有所表现。他在《长夜》这首诗中，把人生比做漫漫长夜，苦海无边。在另一首《冰花》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北极星将在我头上升起，
我无力从它下方逃脱掉，
我短暂一生在这里度过，
我的家乡是寒冷的雪国。”

面临着这黑暗的世界，诗人是无力抗争的，只能屈从于命运的安排。

《炼狱中的火焰》是尤翰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描写冬季战争的诗集。诗人明明知道芬兰于 1939 年冬对苏联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不会取得胜利的，但是他却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诗人在诗集的字里行间均流露出对这场冬季战争的厌倦之感。尤翰是一位人道主义者，特别关注人类的命运，希望他们永远过着康乐的生活。这是该诗集的主旨所在。在诗歌艺术上，尤翰运用写实和象征相结合的写作方法，采用传统的脚韵和鲜明、精练的语言及变换的节奏，使创作的诗歌，婀娜多姿，大放异彩。

O. 巴沃拉依宁

奥拉维 · 巴沃拉依宁（1903—1964）是“擎火把者”组织的

中坚人物和出色的文学批评家。他写的文章富有激情，能鼓动人心。在《寻找当代》（1929）这本文集中,他首次向芬兰读者详细介绍当时盛行于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新的艺术流派，诸如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及俄国革命抒情诗歌等，并探讨趋向城市化和机械化社会的物质文明问题。他的第二本文集《伟大的谦逊》（1932）,其矛头指向芬兰文坛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批评了芬兰文学单纯追求形式美，其内容贫乏和单薄，不能深入揭示人物形象的内心活动，更不能准确地反映出社会弊端之所在。他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当时‘擎火把者’一些成员发表的作品既显得幼稚,又很粗糙。

巴沃拉依宁在30年代后期发表了一系列旅游观感文集。其中颇引人注目的是批评希特勒德国的文集《第三帝国的客人》（1936）。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曾去苏联完成旅游三部曲的主要章节，由于战火燃起未能全部实现。1941—1944年，他在东卡累利亚任通讯营军官，后在指挥总部写回忆录，这就是战后出版的《阴郁的独白》（1946）。这本书当时受到国内政坛严厉的批评，致使巴沃拉依宁从此几乎全部中止了他的写作生涯。实际上《阴郁的独白》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书。因为巴沃拉依宁在二次大战前后曾频繁穿梭于苏联和德国之间，认识到处在这两个意识形态相互对立强国之间的芬兰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他在这本书里尖锐地批评了芬兰在战争期间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是不明智的，同时高度赞扬了苏联是卓越的国家。

P. 韩培

本蒂·韩培(1905—1955）小说家。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学没有毕业，全靠自学成才，最终跻入芬兰优秀作家的行列。韩培自1925年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一生共创作出近20部小说，其中很难说究竟哪一部是他的代表作。比较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荒原之战》（1940)、《九个男人的靴子》（1945)、《面

粉》(1949)和短篇小说集《阵地和军营》(1928)、《当代》(1942)、《年老的海达·拉赫科》(1947)及《原子弹的研究者》(1950)等。

作家韩培从不迷恋城市生活，也不追随欧洲文学中产生的新的艺术流派。他始终生活在偏僻的农村，从小农、伐木工和游民身上捕捉人物形象。他同情这些缺乏文化修养、顽强地为生存而斗争的人们。这些人不了解自身存在的价值，只知道拼命地干活，却从不过问依然贫穷的原因，似乎被生活折磨得麻木不仁了。作者经常以幽默的笔调对他们进行善意的嘲讽或批评，其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醒。但也有例外，作者在一篇题为《哈努里-伯利曼自传》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类似多余人的形象。伯利曼是一个未婚女仆的私生子，当母亲生下他时就打算弄死他。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他仅靠着一把旧的手风琴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每逢别人结婚或举行舞会时，他总是以伴奏者的身分前去助兴，以换取几枚糊口的小钱来维持生计。伯利曼就这样度过了平庸的一生。看得出来，作者对这样的多余者的人物命运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韩培的作品题材范围较窄，仅局限于农村。他在其作品中揭示出地主和农民，森林主和无产者，掌权者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坚决站在后者一边。作家以犀利的笔触探讨了马克思论述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辛辣地鞭挞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作家反对战争，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卫道士——军队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他早在20年代后期创作的小说《阵地和军营》中就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军队，把他们描写成受人摆弄的机器人，没有头脑和思想。在以后创作的《荒原之战》和《九个男人的靴子》等小说中，通过一些精彩的细节描写表现出作者的厌战情绪。

韩培的小说在艺术上独具一格。作家以深邃的目光透过生活的表层去挖掘其本质，刻画出鲜明生动、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作品语言非常贴近生活，简短精练，富有生活情趣。他作为反映北

国荒野居民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给芬兰文学领域开创了新的境地，受到后代人的赞赏和模仿。

T. 帕卡宁

托依沃 · 帕 卡 宁(1902—1957) 小说家。他出身于工人家庭。他本人没有高深的学历，全凭自己的天资和勤奋而成为出色的工人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因而作家具有国际声誉。由于其文学上的突出成就帕卡宁晚年被接纳为芬兰科学院院士。

帕卡宁 1927 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初期发表的作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目。只在 1932 年发表了反映青年工人成长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阴暗的工厂》才初露锋芒。从此反映工人生活成为他一生创作的主题。帕卡宁一生发表的作品基本上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写实的作品，主要描写对象是大自然、人和社会。作家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现实，机智地捕捉和分析典型人物。他同情工人的生活处境，揭露资本家的剥削本质，大胆针砭社会弊端。他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一般都显得愚笨，甚至是一副可怜相，但非常逼真。真实是帕卡宁作品的核心。他的文学语言没有作家韩培那样犀利尖刻，而是朴实、庄重、通俗易懂，他善于透过社会现象的表层去探索其深层结构，他永远不满足于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要发生。作家不愿采用白描的手法去复制现实生活，而是去研究在表层内部存在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他所处的那个阶层和时代的潮流。这一类作品除了上面谈到的《阴暗的工厂》之外，还有反映 20 世纪 20 年代末港口城市大罢工的长篇小说《祖国的岸边》(1937）及《过去的岁月》 (1940)和《小弟弟》 (1946 ）等。

作家帕卡宁知道生活是复杂的，其中包含有无穷的奥秘。他除了写实的这一类作品外，还创作了另一类富有象征和隐喻的类

似神话的小说。如《黑色的魔鬼》（1939）和《一个男人和红胡子的先生们》（1950）。作者借助直觉来剖析人物的心理状态，虽然在此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就，但足以证明作者力求跟上时代的潮流，以新的表现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

帕卡宁晚年从事反映出生城市科特加的系列长篇巨著。然而，因患脑疾，仅写出了《晨光熹微》、《同志之间》和《胜利者和失败者》（1948—1952）三部小说而被迫停笔，致使一生宏愿未能实现。

M. 瓦尔塔里

米卡·瓦尔塔里（1908—1979）小说家。他是"擎火把者"组织的重要成员。出身于赫尔辛基一书香门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20岁开始发表小说，从创作初期就追求异国情调，注重艺术技巧，热衷于反映都市生活，特别对青年人爱情的描写形成他创作的主流。同时在他的作品中也反映出时代变幻的风云。他多才多艺，既写小说，也写诗歌、剧本、电影脚本、童话和杂文。一生创作甚丰，但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小说创作上。

长篇小说《我的伟大幻觉》（1928）是瓦尔塔里的处女作。他在这部作品中抒发了20世纪20年代青年人对人生的追求和向往；同时也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这一代人造成的精神创伤。第二部重要作品《从父到子》（1933—1935）通过对一家三代人的生活描绘展示了赫尔辛基市的近代发展史。这部小说篇幅浩繁，结构宏大，类似一卷史诗。另一部作品《陌生来客》（1937）对女主人公的心理描绘惟妙惟肖，相当出色，给芬兰文学园地增添了色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瓦尔塔里陷入悲观主义，沉醉于对古老历史题材的创作。有的作品以16世纪战争动乱的欧洲为背景，有的以地中海地区的文化发展为线索。他特别对世界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以及在此期间持有不同政治、宗教信仰人们的矛盾和斗争

感兴趣，创作出一系列小说。如两卷本的长篇小说《米凯尔 · 卡尔瓦亚尔卡》和《米凯尔 • 哈基姆》（1948—1949）描述宗教皈依者哈基姆如何由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并加入到土尔其阵线的。《约翰 · 安克洛斯》（1952 ）描述基督教和西方势力在伊斯坦布尔的消亡。《永存的土尔穆斯》（1955)叙述伊特拉斯坎王朝的崩溃。瓦尔塔里不是单纯的写历史小说，而总是与当代挂钩，赋予历史小说以时代精神。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埃及人斯努海》(1945）。主人公斯努海是位医生,是埃及法老埃克纳托的弃儿。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斯努海被法老遗弃的经过，其中回顾了阿蒙霍特普四世推行的宗教改革，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势和流血斗争，战争统帅赫列姆海普的辉煌战绩，漂亮的王后奈福丽提黛，海地王国的兴衰及古老的叙利亚和希腊。作者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想象构思谋篇，展示出恢宏的历史生活画卷。其中特别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神采各异，楚楚动人，人物性格突出，谈吐举止不凡，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瓦尔塔里在这部作品中也间接地影射了芬兰中产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失望和顺从。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国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

作家瓦尔塔里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在其众多题材的作品中都闪现出这种思想的火花。虽然作家已经离开人世，然而其火花依存，而且永不会熄灭。

第七节　基拉社

对年轻的芬兰共和国持乐观态度以及主张“门户开放”，这是“擎火把者”组织迈出的第一步。他们对过去的历史不感兴趣，对一些社会问题一般也不过问（韩培和帕卡宁除外）。国内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触及到 20 世纪头 10 年开始写作的一些较老的作家，但是“擎火把者”组织的成员没有经受这种战火的考验，更

不会具有由此而引起的忧患感。

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国内出现的大饥荒，其次是国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促使“擎火把者”组织成员清醒过来，他们创建了激进的《新擎火把者报》。后来《新擎火把者报》中的一些成员和左派文化报刊《文学报》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于 1936 年联合成立了左派文化团体“基拉社”。参加到这个团体的成员大多出身于工人家庭，是 1918 年国内战争失败者的后代。他们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奉俄国革命诗人和瑞典无产阶级诗人为楷模，以实际行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良倾向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创作出一些朴素而悦耳的诗篇，这些诗篇适于口头朗诵并容易记忆。诗歌内容都直面人生，摆脱了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发表的一些小说和剧本也极有价值，对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V. 卡亚瓦

维尔约·卡亚瓦（1909— ）诗人。出生于工业城市坦伯累一鞋匠家庭，曾就读赫尔辛基大学。他是芬兰国内至今仍坚持创作的年龄最大的诗人。到 1984 年底，共发表了 34 部诗集。他驰骋诗坛达半个世纪，其影响是深远的。这些诗集也记录了诗人自己近 50 年来在诗坛留下的足迹。

卡亚瓦的第一部诗集《建设者》（1935）是反映城市工人生活的。他在诗中高度赞扬了工人们的伟大建设业绩，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厚的感情。1937 年发表了他的第二本诗集《动荡的岁月》,标志着诗人的先进思想发展到顶峰。他在这本集子中歌颂了血染的革命红旗，同时高声呐喊：

> “北方的歌声已经响起，
> 无产阶级的时代已来临。”

看得出来，这时诗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在芬兰取得胜利是满怀信心的。

两年后卡亚瓦的第三部诗集《别了，候鸟》（1939）问世。其格调与前两部作品迥然不同，缺少对革命的浓厚激情，转向抒发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时诗人往往醉心于捕捉对大自然转瞬即逝的感觉印象，并注意把这种印象转化为情感状态加以表达，因此创作出的诗歌富有印象主义的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诗人卡亚瓦移居瑞典，并用瑞典语写了两本诗集《致海鸟》（1948）和《在某地》（1949）。受瑞典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他在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1949年他回国后连续发表两本诗集《手臂》（1949）和《你好！大海》（1950）。在这两部作品中卡亚瓦避免使用一些抽象的抑或装饰性的语句，采取物我同化的艺术手法，使我与大千世界的界限模糊不清，融为一体，给战后芬兰诗歌开辟了一条新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是六弦琴，
它是用质量最好的红木制成。
我是壁炉，
六弦琴在其中被毁坏。
我是人，
是我毁灭了六弦琴。”

卡亚瓦被称为诗歌的手工制作者。他不善于玩弄技巧，而致力于磨练和完善他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诗人把所观察到的事物变成诗歌。卡亚瓦的诗歌是很形象和可感的。他如同水彩匠，用淡淡的几笔就把观察到的景象勾勒出来。卡亚瓦勾勒出来的景象经常是夏天的充满阳光的海岛或海曼地区的明朗风光。它的基本成分是水、天空和大地以及在大地生活着的人——尤其是女人、小

孩和老人。诗人经常捕捉事物的最细微之处并加以具体描绘，以表述自己的深切感受。

卡亚瓦在战后创作中偶而也回到青年时期创作的题材上去，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例如：1961 年发表的诗集《十个风向》,反映一系列非洲国家新的觉醒。诗人此时不再诉诸于诗歌以阶级斗争的激情，而是以旁观者的态度客观抒写。在《坦伯累之歌》（1966）诗集中，诗人描述了童年时代的坦伯累城及战争最后时期的城内状况。而在《壁垒狂想曲》（1972） 诗集中，他重温了已消失的工人城市一角的历史。

卡亚瓦晚年创作的诗歌致力于探讨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并相互影响的课题。这时诗人对生活感到满足，认为阳光和空气就能够驱走饥饿。正如他在 1982 年创作的一首诗中所写：

“我伸出染上色彩的手指，
经常指向绽开的花丛。
我默默地祝福：
生活无限美好。”

A. 土尔蒂阿依宁

阿尔沃 · 土尔蒂阿依宁（1904—1980）诗人。他出身于赫尔辛基一个鞋匠的家庭，上过社会大学，1951 年任“基拉社”主席。他的第一部诗集《变》发表于 1936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在时代的土壤中，
播下了变化了的铁的种子。”

土尔蒂阿依宁在诗歌中也直接描绘人与大自然，但是其音调

比卡亚瓦更有力和更激烈。他从 30 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挖掘创作题材，或公开谴责政府当局，或细微反映工人的艰苦生活。诗人坚定地站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一边，同情他们的处境和命运。热爱生活和劳动人民，始终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调和政治斗争、歌曲创作的原动力。他在“基拉社”1937 年出版的第一期刊物上写道“战斗者无暇吟唱那些绵绵的爱情歌曲。”

土尔蒂阿依宁于 1939 年发表了第二部诗集《阴云下面的道路》，其中包括一部分讽刺幽默的小诗，例如《萨利尼》就是有名的一首，诗中写道：

“你一天干 8 小时的活，
睡 13 个小时的觉，
其余 3 个小时用来吃饭
和睡前谈论女人的事。

当有人劝告你：
朋友，你应当学习点东西，
使你的生活更充实些。
可你却说：
我这样生活，
就心满意足。

萨利尼呀，萨利尼，
你这样做能改变世界吗？”

诗人土尔蒂阿依宁在 1939—1940 年冬季战争期间当过青年军官，但是 1941 年续战爆发后他拒绝参战。因此他如同当时“基拉社”的许多成员一样被定为叛国罪而投入监狱。1946 年出版的

诗集《42号》就是反映诗人这一段狱中生活的。诗人在极其艰苦环境中仍表现出奋发向上的乐观精神。

五六十年代土尔蒂阿依宁发表的诗歌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超出了工人题材,如诗集《我的爱情》（1955)、《初秋》（1959）和《我赤脚》（1962）等。土尔蒂阿依宁晚年也创作了一些讽刺资本家的诗歌，但政治色彩远不如三四十年代那样浓。就其艺术而言，通俗、生动的语言和鲜明的节奏是他一生诗歌的两大特点。

J. 奔纳宁

亚尔诺·奔纳宁（1906—1969）是“基拉社”中富有文采的诗人。他创作的诗歌一般比较含蓄，生前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广泛注目。诗人在庆祝他诞生60周年之际出版了诗集《行列》（1966)、。诗集题目一语双关，既表明他从事的写作工作，一行一行地爬格子；又暗示出他肩负的战斗任务。这部集子记录了奔纳宁一生的坎坷经历；同时折射出时代发展的历史轨迹。但诗人在创作中却采用了超现实主义及其他一些现代派绘画的艺术手法，使其诗歌独具风采。

奔纳宁的一生既是诗人和新闻工作者，又是社会活动家。1970年发表诗人生前写的两卷本回忆录《光荣的一生》反映了这一事实。他除了创作诗歌外，还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创办了《文学报》，担任过《自由之声》和《人民新闻》报的主编和驻莫斯科记者。晚年主办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月报《形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其他一些进步人士一起因所谓叛国罪被捕入狱。他在狱中构思了长诗《耶利米的悲剧》（1945）。奔纳宁借助取材于圣经中的耶利米的故事影射诗人自己和芬兰当时的现状。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八月的阳光》（1944）等也极富有政治色彩。

奔纳宁除创作政治诗外，还写爱情题材的诗歌。散文诗集

《未发出的信件》（1947）就是其一。这本散文诗既不反映青年男女之间的纯洁爱情，又不描绘少男少女的初恋心理，而是对成年人的爱情进行尖锐的剖析，揭露出它的复杂性和神秘性。爱情既是自由的，又是排他的；既是公开的，又是秘密的。

诗人奔纳宁晚年意识到死亡的来临，也写了一些有关死亡的诗歌。他认为死亡是自然规律，不可惧怕，就如同在一首诗写的：

“别害怕，姑娘，
死亡是大地的原始居民，
我们是大地的客人。”

H. 沃里约基

海拉·沃里约基（1886—1954）女剧作家。她原是爱沙尼亚人，20世纪初在芬兰赫尔辛基念书，与芬兰人结婚后加入芬兰国籍。她从1912年起用爱沙尼亚文发表了2部长篇小说和3个剧本。30年代初使用芬兰文从事戏剧创作。1936年发表了反映芬兰海麦地区妇女生活的剧本《尼斯卡沃里的妇女们》从而一举成名。后来又连续发表《尼斯卡沃里的面包》（1938）、《尼斯卡沃里的年轻女主人》（1940）、《尼斯卡沃里的海达》（1953）和《尼斯卡沃里的现状如何》（1953）等系列剧本。尼斯卡沃里系列剧的中心议题是职责、金钱与爱情的矛盾。另一个中心议题是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并非表现在穷人与富人之间，而是表现在热爱农村及代表农村传统的乡下人与代表上流社会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人之间。沃里约基观察到乡下人的弱点和局限以及他们的狭隘和愚笨，但是作家同情乡下人，站在乡下人一边，乡下人往往构成剧本中正义的代表。尼斯卡沃里的系列剧反映了芬兰农村宗法制的生活方式，构成一幅幅农村世态风俗画卷。剧本也展

示出新时代的到来和旧的观念形态的消亡。正如剧中年轻的女主人依洛娜对神父说的：“神父先生，我们不同于您们，我们是新一代人。”

剧作家沃里约基善于设计戏剧情节来激化矛盾。人物塑造栩栩如生，对话生动流畅。她特别善于塑造女主角，她们是剧中的顶梁柱，生活中的强者和未来的主宰。剧中很多女角色都被列入芬兰戏剧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与此相反，剧中的男角色则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动摇，彷徨，遇事不果断，只有女人告诉他们如何安排生活。

剧作家沃里约基生前曾与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有过密切的交往。布莱希特 1940 年创作的剧本《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就是由她提供的素材并在她的住处完成的。很少有人知道她于 1947 年发表的剧本《依索-海依基莱老爷和他的男仆卡莱》就是上述布莱希特剧本的翻版。她创作的系列剧主角的设计、性格和对话无不受到布莱希特的影响，而剧中汽车驾驶员无产者的形象则完全照搬布莱希特的剧作中的人物。沃里约基与布莱希特的合作在芬兰文学史上是一种特殊的现象。

沃里约基在晚年写的系列回忆录（1944—1953）中，回顾了她不平凡的经历：她不仅是一位文学艺术家，还当过锯木公司的经理。第二次大战期间，因政治狂坐过监狱，战后担任过芬兰广播电台总经理和芬兰左派党团组织民盟在国会中的议员。

E. 西内尔沃

埃尔维·西内尔沃（1912—1986）女小说家。她出身于赫尔辛基一木匠家庭。她多才多艺，一生既写小说，也写诗歌和剧本。她受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影响很深，其作品主要反映 30 年代赫尔辛基工人的生活面貌，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同时，她的作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具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游击队和反抗运

动中颇受欢迎。西内尔沃的很多作品是在狱中写成的，她因为在二战期间从事芬苏和平友好协会的工作而被判 4 年监禁。她自称是“专业革命工作者”，1945 年加入芬兰共产党，西内尔沃在 50 年代末的危机时刻脱党。其脱党原因：一是在芬兰共产党内开始反对教条的斯大林主义；一是在文化生活中推行形式主义的现代派文学艺术。西内尔沃晚年陷入极度的悲观主义，她后来一直居住在远离赫尔辛基的偏僻地带，销声匿迹，直至去世。

作家西内尔沃一生饱受铁窗的生涯，深刻意识到人的成长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决不会一帆风顺。她这种感受在许多作品中均有所表露。她在一首诗中写道：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西内尔沃在长篇小说《巴拉瓦林的铁匠》（1939）中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个普通劳动者整个一生的际遇，读来真切感人。

长篇小说《换来儿瘸腿威廉》（1946）是西内尔沃的代表作。小说刻画了一个好幻想的穷孩子如何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后为革命事业捐躯。作家在小说中运用了象征、神话等艺术手法，使作品具有童话般的传奇色彩。中篇小说《同志，不要叛变》（1946）真实地记录了作家在狱中的生活感受，具有一定的政治鼓动作用。剧本《世界尚属年轻》（1952）反映芬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 1942—1943 年世界大战期间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塑造了一群年轻英雄形象。该剧曾于 1953 年在赫尔辛基工人剧院上演，受到观众的好评。

作家西内尔沃曾于 1957 年随芬兰友好代表团来华访问。回国后翻译了鲁迅的作品《祝福》等，为芬中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五章　战后时期的文学

（20 世纪 40 年代至 80 年代）

第一节　历史和文化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被迫参加了两次对苏联的战争。第一次战争发生在 1939—1940 年，历史上称为“冬战”。第二次战争发生在 1941—1944 年，历史上称为“续战”。这两次战争芬兰均以失败而告终，使芬兰蒙受了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损失。据统计，芬兰在战争中共死亡 86000 多人，伤残 57000 多人，失去东南部的卡累利亚地区和当时的第二大城市维堡，迫使居住在该地区的 42 万人民（相当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迁移到内地居住。经济上对苏联进行战争赔款约 5 亿多美元。1944 年秋芬兰经济拮据，一贫如洗。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芬兰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如贵重金属工业和船舶制造业，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至 1952 年底芬兰已全部付清了对苏联的战争赔款。同时，芬兰政府还制定了一些特殊法规，致使迁到内地的 42 万居民得到了妥善安置。为了进一步振兴国民经济，芬兰在战后特别注重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商品出口数量。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芬兰由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在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和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先进工业国家。至 20 世纪 80 年代，芬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 13 个国家之一，人均收入超过 1 万美元。

战后芬兰的国际威信最初是低下的，常常被安置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后排座位上”。为了迅速扭转这种局面，芬兰战后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芬兰在反省了过去对苏政策后，在对外关系上推行了巴锡基维路线①，即在搞好对苏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在国际上奉行和平中立，不介于大国利害冲突。这一对外政策后来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理解和承认。芬兰于 1948 年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解决了对外关系中的关键问题。1955 年加入联合国，1956 年加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5 年加入北欧理事会，加强与北欧各国的合作关系。1961 年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亦即“七国集团”。1973 年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前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于同年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组织即“经互会”签订了通商条约。1975 年芬兰在首都赫尔辛基主持召开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亦即“欧安会”。这标志着芬兰的国际地位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伴随着芬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芬兰的人口及其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芬兰 50 年代人口约 400 万，70 年代发展到 470 万；50 年代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70 年代城市人口已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即约占百分之六十。从谋生方式来说从事农业和森林业的劳动人数逐渐减少，而从事工业经济和服务行业的人数则不断增加。

当然，芬兰战后形势发展并不都是乐观的，国内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诸如城乡差别、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等痼疾均对社会构成了威胁。地处边远或比较偏僻地区的居民不断向南部城市集中的经济发达地带涌进或移居瑞典谋生。据统计，至 70 年代仅仅移居到瑞典的芬兰居民就达 30 万。此外，农产品生产过剩、环

① 巴锡基维为 1946 1956 年期间的芬兰总统，因战后外交政策是他制定的，故称之为巴锡基维路线。

境污染、物价不断上涨、税收不断加重均给居民的心理带来不安定因素。尤其是 1973 年爆发的国际石油危机给芬兰经济生活投下了阴影，致使国内经济一度出现短暂的萧条时期。其间失业人口猛增，工业生产及出口贸易亦严重受挫。所有上述弊端在芬兰当代文学中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

战后芬兰文学艺术也经历了一个摸索阶段及由消沉到较发展的时期。战争结束后，人们普遍感到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虽然 40 年代也产生了像著名作家韩培创作的长篇小说《荒原战争》等少量优秀文学作品，但总的来说，其思想和艺术水平并未超出战前文学的水平。当时芬兰文学艺术界认为，国内 40 年代以后的文学应当迥异于战前的文学。究竟如何向前发展，尚无定论，处在彷徨摸索阶段。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大量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被介绍过来，占领了国内文学阵地。直到进入 50 年代，芬兰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才出现了新的转机。在抒情文学领域产生了现代派诗歌，在叙事文学方面出现了反思小说，亦称“战争浪漫主义文学”。到了 60 年代，许多作家关注社会现实，对社会上存在着的一切不良现象持批判态度，文学开始干预现实，形成“参与文学时期”。70—80 年代以来，作家的视野较前放宽，也较分散，创作十分活跃，文学艺术界呈现纷繁的局面，产生了所谓“日常生活和大自然诗歌”、“中产阶级文学”、“农村文学”及“工人文学”等，其分类详细，壁垒分明。总之，战后芬兰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 40 年代末的彷徨和摸索阶段、50 年代的反思阶段、60 年代的干预社会阶段、70—80 年代以来的多元并举的阶段。

芬兰在战后特别重视作家的创作和作家队伍的建设。国家制定了对作家发放补助金制度，并调整和补充了文学奖金制度。据统计，芬兰设立了超过万元的文学奖金就有 17 种之多，这对繁荣

文学创作，扩大作家队伍是非常有利的。从前绝大多数作家集中在赫尔辛基、坦伯累和土尔库这三大城市，后来发展了地方作家群，与之取得了相对平衡。此外，为了及时沟通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学习和借鉴外国作家的先进创作经验，芬兰还于60年代初在国内创办了拉赫底国际作家联席会，每两年在海滨小城拉赫底举行一次会议，被邀请的都是国际知名作家，其目的是交流创作经验并探讨世界文学中普遍感到关注的重要问题。所有上述措施对战后芬兰文学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40年代的文学

苏芬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从事创作的一些作家，统称“战争阴影下的一代”。这一代人亲身经受了时代的压力，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没有明确的方向可循。他们对自己的青春被战争葬送倍感伤心。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创作上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也有的走上心理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但是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这一代人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与战前文学结合紧密或战前就发表过作品，如居尼、奔纳宁和杨松等。另一类脱离了战前文学的影响，他们的目光只注重战后形势的发展，如维达、科尔拜拉和曼奈科皮等。

A. 居尼

阿莱·居尼（1913—　）女诗人。她出身于科尔巴纳一因凯里一职员家庭，父亲为中学教师。她本人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当过中小学教师。1938年她开始创作诗歌，并发表了处女作《烛芯》，表现出一定的文学才能。两年后发表的第二本诗集《水鸟》（1940）标志着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已经形成。她的诗歌语言婉转流畅，舒缓有致，特别注重韵律的运用。她认为韵律是诗歌的生

命。她在创作中采用传统的脚韵，但其诗歌又别于传统的诗歌。诗人善于以物传情，以描绘大自然来影射对人的情感和意志的探讨。诗人曾说：“如果给我的诗歌冠以什么流派的话，我宁肯叫它象征派”。的确，诗人在创作中喜欢运用象征和隐喻，从1949年开始又转向寓言诗和神话诗的创作。居尼的诗歌题材一部分是反映妇女日常生活琐事，但更多的则涉及爱情领域，反映爱情的艰难，揭示人的双重人格。在她的诗歌中，男人往往是不可捉摸的怪物。

诗人居尼在后期诗歌创作中往往借古喻今，通过对神话或历史故事的描绘来映照现实世界。她主持正义，对现实世界中的非人道主义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她发表的主要诗集还有《茅屋》（1946）、《喧闹的森林》（1947）、《跨越玻璃山》（1949）、《无名树》（1952）、《九座城市》（1958）、《世界舞台》（1961）和《骑士歌和浪漫曲》（1967）等。

此外，居尼还从事外国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在此方面主要译著有莎翁的《十四行诗》（1965）和《二十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1976）。

E.奔纳宁

埃依拉·奔纳宁（1916—1994）女小说家。她出身坦伯累城一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为工厂主。她大学毕业后当过档案保管员、广告设计员、报刊编辑和评论员。她在文学上是多面手，既写小说和诗歌，又写短评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还在赫尔辛基大学教授过翻译课程。其处女作《战前仍很年轻》（1942）反映战争年代大学生的生活，艺术上取得成功并奠定了她在文学上的地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成为女作家奔纳宁早期发表文学作品的主题。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典型环境，描绘青年妇女内心世界的矛盾和斗争成为奔纳宁构思长篇小说的基本框架。奔纳宁受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的影响很深，特别注重长篇的创作，她一生发表了十七八部长

篇小说，其中《洗衣女工》（1963）为其代表作。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原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后因家道中落，沦为洗衣女工，以此职业糊口度日，从而引起上层社会人的歧视和嘲讽。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处境是深表同情的，并在小说中提出质问："难道这种人应该低人一等，不应该得到关注吗？"70年代以来，奔纳宁创作视野更加开阔，创作出宏大题材的三部曲《狂欢》（1971）、《追求》（1972）和《一束玫瑰花》（1973）。这三部曲以坦伯累市一位妇女的目光来审视20世纪初芬兰社会发生的动荡和变革，内容充实，构思巧妙，堪称佳品。

女作家奔纳宁还是创作短篇小说的能手。她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集如《塔院》（1952）、《钻石》（1957）、《倩影》（1961）和《初恋》（1969）均被列入国家优秀短篇小说的行列。这些小说取材广泛，几乎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奔纳宁以敏锐的目光，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污点"，挥洒成篇，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她的文笔秀丽，往往以戏剧的手法设置情节，使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T. 杨松

托威·杨松（1914— ）为优秀的瑞典语儿童文学作家。她出身于赫尔辛基一书香门第，父母都是艺术家。她自幼学习绘画，曾去瑞典和法国深造。绘画和写作成为她一生中的两大爱好和艺术追求，并且在这两方面均有所成就。在绘画方面，她从1943年起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在文学方面，她发现了"姆咪的家庭"和"姆咪的山谷"，并以此为题材创作出10多部童话，从最早发表的《侏儒和洪水》（1945）到1970年发表的《姆咪山谷的十一月》。其间引人注目的童话还有《危险的仲夏节》（1954）、《神秘的冬天》（1957）和《姆咪爸爸和海洋》（1965）等。

作家杨松创作的童话内容非常丰富，故事性很强，语言通俗

流畅，她的童话世界由一群代表不同生活习俗的动物所组成。这一群动物的生存环境与现代人大相径庭，充满了稀奇古怪的现象。但是这些动物的言谈举止、性格特征和理想追求又与现代人十分相像。它们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约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作家借助对童话世界的拟人化的描述来反映战后芬兰人民渴望和平自由的愿望。但是，杨松后期创作的童话格调发生了变化，田园牧歌式的情调淡薄了，多了些焦虑和不安。这主要是由于世界形势的演变使她内心产生了恐惧所致。60年代以后世界上出现了能源危机，大国间核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工业化带来的对空气和环境的污染，所有这些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无不给正直人们的内心投下阴影，杨松也不例外。然而她在该时期创作的童话中也时而流露出悠然和机智，这对后期作品沉重的格调也多少起了些调剂作用，取得了一定的平衡。近年来，杨松所创作的一些童话被拍成系列电视片在世界广大地区放映，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因而作家本人在国外的声誉也与日俱增。

L. 维达

拉乌里·维达（1916—1965）诗人、小说家。他出身于坦伯累城郊一工人家庭，父亲是石匠。作家本人只读过中学，当过建筑工人。1947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混凝土工人》。这部诗集以崭新的构思和优美的韵律受到读者的注目。诗人把传统的诗风改成新貌，并运用贴近生活的语言来反映工人的生活，其格调粗犷豪放，饱含着积极向上的激情。诗集中包括两种格式的诗歌：一种是叙事长诗，一种是讽刺而幽默的短诗。诗人维达不希望自己的诗歌变成生活的点缀品，而要求有更丰富的内涵，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往往透过对生活表层的描述揭示导致善与恶、健康与病态、成功与失败的根源，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他在一首诗“磨”中，与死人交谈，但交谈的结果并不像有的诗人作品那样变成死者的俘

虏，而是使自己的生存意志更加坚强。诗人坚信人类最终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

作家维达一生除创作诗歌外，还写小说。他于 1950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冰碛岩》是一部力作。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描述伐木工人尼耶米宁一家的兴衰史；同时映照出芬兰工人斗争的历史。维达认为，芬兰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几经挫折，但前途是光明的。就如同小说结尾所展示的那样，虽然作为一家之主的尼耶米宁倒下了，但他的妻子约塞弗娜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她表示一个人要坚持生活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芬兰国内许多人曾出现极度悲观的情绪，在此种情况下，维达推出这部力作不啻是一付鼓舞人心的振奋剂。

J.科尔柏拉

约尔玛·科尔柏拉（1910—1964） 小说家。他出身于托依卡瓦教区一神职人员家庭，父亲为赞美诗人。作家本人受过高等教育，1938 年开始当中学教师。

科尔柏拉一生共发表 4 部长篇小说：即《玛尔蒂玛的为人》（1948）、《芬凯尔曼博士》（1952）、《忏悔》（1960）和《阵地哨所》（1964）。作家在这 4 部小说中集中探讨了灾难、犯罪、责任和调和等问题。《玛尔蒂玛的为人》中的主人公是位有良好愿望的理想主义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混淆了是非观念，造成了严重后果。至此他才醒悟到原来他从前一直没有真正认识自己。《芬凯尔曼博士》的主人公由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超人”，他对周围实行恐怖主义，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由于他断绝了与周围人的来往，使周围世界变成一片废墟，从而自己也陷入了绝境。《忏悔》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军官，他通过进行自我审视，终于认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犯下了罪行。正如这位军官自己说的：“战争就是战争，但人在战争中可以是人，而我则不是人，因为我在战争中犯

了罪。”《阵地哨所》中的主人公是位和平主义者，他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所以他主张“现在应当杀掉上帝，永远革掉他的职”。

在上述4部长篇小说中《芬凯尔曼博士》是其代表作。科尔柏拉对该作品进行了独特的艺术构思。小说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均可独立成篇，且每部分中的“我”独具特色，不尽相同。小说打破正常的时空排列，“我”也随着时空的变换而神态各异。科尔柏拉意在表明：在人身上有许多“自我”共存，它们相互斗争，“我”可表现为“善”，也可表现为“恶”。总之，最困难的是人难以掌握住自己。这也许就是作家科尔柏拉对人的最终认识。

J.玛奈科尔皮

尤哈·玛奈科尔皮（1915—1980）诗人、小说家。他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父亲是传教士。他出生在美国，在芬兰国内大学毕业后，又去法国学习，深受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他涉猎较广，既写诗歌，又写剧本和小说。其作品的内容多是反映人们在这荒诞世界上的生存现状。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数是一些被世界所“遗弃”的人，他们是孤独者。例如在1955年发表的独幕剧《钥匙》中的主人公是位工作多年的翻译工作者，在他度过自己50周岁生日时，竟没有一位来宾前来祝贺，此情此景令他倍感孤独和凄凉。玛奈科尔皮作品的格调一般比较低沉，通过作品力求揭示普遍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灵与肉的矛盾和冲突，揭示出人们无穷的忧虑和极度绝望的心境。

玛奈科尔皮作为诗人他属于现代派。他的诗歌不受传统格律的约束，形式比较自由，句子简短，节奏鲜明，不注重细节描绘，而追求表现主观精神和内心激情，颇具表现主义艺术特色。其主要诗集有《小路》（1946）、《播种者去播种》（1954）和《见解》（1971）等。

玛奈科尔皮作为小说家，其作品倾向心理现实主义，注重对

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和描绘。同时他在小说中往往淡化情节，使现实；想象、幻觉、记忆和梦境相互交错或重叠，模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概念，追求一种纯属内心世界的时间和空间，颇具新小说派的艺术特色。他发表的主要小说有《旋工》（1958）、《船在起航》（1961）、《遗物》（1965）和《蜻蜓》（1970）等。其中小说《遗物》是他的代表作品。内容描述一位失去爱侣的老者关起门来欣赏屋内的一切富丽堂皇的陈设，触物思人，追忆与爱侣一起度过的欢快岁月，深感失去的永远的失去了，不能再现。

第三节 50 年代的文学

50 年代在芬兰文坛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抒情新浪潮，称之谓“革新的激进主义”或“诗的革命”。这一代年轻诗人发表的诗歌完全摆脱了传统格律的约束，不适用韵脚，甚至不使用标点，开头不大写、诗行任意排列。诗歌题材拓宽，重视反映当代日常生活，诗歌语言注重形象化和大众化。也许由于战争的缘故，这一代诗人多系女性。诗人们对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认为旧世界已被推翻，诗人的形象应当改变，已往的诗风不足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对生活的追求。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却遭到国内保守的批评家的强烈反对。这些人认为取消诗歌固守的格律和传统的韵脚就是意味着诗歌生命的终止，还预言在诗歌方面的革新是对社会一切传统价值观念否定的开端，终会导致一场政治革命。

50 年代小说艺术的革新不像诗歌那样明显，因为小说反映变换中的社会不像诗歌那样直接和迅速，而且小说艺术在战争前后的脱节现象也不像诗歌那样严重。如战前作家韩培和帕卡宁在战时仍以旧的艺术手法进行写作。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在创作上各放异彩：有的袭用传统的艺术手法，如作家霍维宁；有的采用战前

工人小说的艺术方式，如作家林纳；有的在创作上走“中间道路”，采用新与旧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进行写作，如女作家约恩拜尔托；有的则使用全新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如作家麦里。这一时期小说内容多涉及到战争，如林纳的《无名战士》和麦里的《白棕绳》在文坛上有相当影响。

H. 尤沃宁

海尔薇·尤沃宁（1919—1959）女诗人。她出身于里萨尔米地一商人家庭，父亲为批发商。她大学毕业后在银行供职多年，1949 年开始创作诗歌。她在 10 年期间发表了《妖树》（1949）、《金衣国王》（1950）、《冰层》（1952）、《日复一日》（1954）、《基岩》（1955）和《传话者》（1959）6 部诗集，从而成为向新诗过渡时期的重要诗人。

女诗人尤沃宁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认为现实世界是残酷的，斗争是无情的，加之自身长期患病，致使诗人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痛苦和忧愁。因而孤独、伤感和死亡构成她全部诗歌的基调。在她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死水”、“枯木”、“猫头鹰”和“鼹鼠”等不详之物，这也正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她在一首《熊》的诗中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被围困的野兽，切断了与大自然的一切联系。诗人的世界观是泛神论的，在诗歌里展现的是一个个神奇的世界。她认为神灵无处不在，从大自然的一种极微小的现象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尤沃宁有时也创作出一些歌颂大自然奇迹的诗篇，从而使自己的内心积存的苦闷和烦恼得到暂短的解脱。

在艺术风格上，尤沃宁的一部分诗歌继承了古代诗人鲁内贝格田园诗的格调，具有严谨的格律和韵脚，简洁流畅，节奏感强。但她更多的诗歌则采用了自由体。诗人在传统的诗歌里展现的是一个“孤独的自我”，而在现代派诗歌里则展现出一个“斗争中的自我”。在她的诗歌世界里两种“自我”共存，这说明诗人的内心

世界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

E. 曼奈尔

艾娃-丽莎·曼奈尔（1921— ）女诗人。她出身于赫尔辛基一职员家庭，父亲是出版商。她受过中等教育，先后在保险公司和出版部门工作过，40年代便开始创作诗歌。她认为现实世界是矛盾的：一方面存在着大自然、童话和音乐；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人为的规章制度，限制了人们自身的自由，使世界变得复杂起来。她创作的诗歌主调是人的孤独和人世间的冷漠。

曼奈尔的诗歌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40年代由传统的格律诗向自由体诗歌转化阶段。战争震撼了女诗人的心，使她去顽强地寻找生活中的真理。诗集《黑与红》（1944）和《似风如云》（1949）是这一时期的佳作。（2）50年代女诗人对现实世界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并给以哲理的概括，产生了许多哲理诗篇。如揭露原子弹能毁灭全人类的诗集《此次旅行》（1956）是该时期的代表佳品。（3）60年代以来女诗人的心更不平静，她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强权和政治迫害表示强烈不满并进行严厉谴责，诗人开始大胆干预生活。如反映苏军侵占捷克的诗集《假如悲伤消散》（1968）是此时期上乘之作。此外，曼奈尔在该阶段还创作出反映世态炎凉的剧本《五月雪》（1967）和长篇小说《当心胜利者》（1972）。作者在长篇小说中对苏军侵略者提出了严重警告。这不仅表明曼奈尔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更标志着她由一个单纯的文人成长为一名保卫和平的战士。

P. 尼耶米宁

伯尔蒂·尼耶米宁（1929— ）诗人、翻译家。他出身于瓦萨市一书香门第，父亲为市议员。家中有一藏书颇为丰富的图书室，他从小就经常徜徉其间，后逐渐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大

学时代他开始对诗歌发生兴趣，毕业后当了中学老师，但是从未间断诗歌的创作和翻译工作。迄今他创作的主要诗集有《石器时代》（1956）、《墓穴》（1958）、《光阴似箭》（1961）、《眼睛里的世界风光》（1964）、《仇风》（1968）、《如此紧张的生活》（1972）、《明天还有担忧》（1979）和《夜夜变幻的阴影》（1983）等。他早期创作的诗歌往往以不同历史时代为题材，借古喻今，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后期诗歌才面对现实世界。尼耶米宁鄙视强权、势力和荣誉，对现实社会流露出厌倦的情绪，唯一令诗人感到欣慰的是“爱情、音乐、古典文学和美酒”。诗人尼耶米宁才华出众，他既能写漫画式的散文诗，又能写情意缠绵的爱情诗，还能写具有哲理深度的格言和警句。他的诗语言清新、鲜明，富有音乐感。然而尼耶米宁在国内，翻译家的声誉远比诗人的声誉要高。

尼耶米宁从50年代便开始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主要是从英文转译的。他翻译的第一本中国书是《中庸》（1956）。60年代他翻译出诗集《大风》（1960）。其中包括诗经，楚词，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的部分诗歌，唐诗选集《玉树》（1963），宋词选集《秋声》（1966）。70年代他翻译出包括元、明、清和现代古体诗在内的诗集《江上》（1970），《毛泽东诗词选》（1973），白居易诗集《迟云》（1976）和中国古代民歌选《发丝》（1978）。80年代以来他已译出中国古代民歌选《别离》（1984）、续集《山光水色》（1987）以及包括李清照和李煜的诗歌集《落虹》（1988）。目前尼耶米宁虽已步入花甲之年，然而雄风未减，仍继续勤奋地从事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工作。他的译文典雅、简洁、通顺、流畅，而且在每篇译文的后面附有精确的注释，便于读者对译文的深刻理解。因此他的译作在国内大受欢迎，曾多次荣获国家颁发的翻译奖金。如果说芬兰广大读者是通过阅读他的译著来了解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这不是过誉之词。尼耶米宁是一位积极从事芬中文化交流的使者。

P.哈维科

巴沃·哈维科（1931— ）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科学院院士。他出身于赫尔辛基一富商家庭，父亲为企业家。他大学毕业后在出版部门工作多年，50 年代开始写诗,很快就闻名诗坛。如果说女诗人尤沃宁的诗歌融传统与现代艺术于一体；曼奈尔的诗歌早期为传统格律诗，后期为自由体；那么诗人哈维科从一开始就完全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桎梏，自成一格。如果说尤沃宁在创作上倾向基督教，曼纳尔崇向泛神论，那么哈维科则冷眼观察世界，对一切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世界是复杂的多变体，难以理解，所以诗歌语言也应变化多端。他的诗歌语言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赋予日常用语以多种含意，或以同样的语言来描绘多种不同事物，使其呈现出复杂而朦胧的状态。因此芬兰国内学者称他的诗歌具有巴罗克艺术风格。他的诗歌还有一个特点是逐渐摆脱自我，面对客观现实。哈维科善于借古喻今，所以他的诗歌往往以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为框架，题材宏大，气势不凡。

哈维科早期发表的诗集，如《风夜》（1953)、《故土》（1955）和《叶叶相连》（1958）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而后期创作出的诗歌集，如《树都是绿色的》（1966)、《十四个统治者》（1970)、《二十与一》（1974）则富有沉重的历史感。他发表的格言集《演说､回答和教学》（1972）和《人之声》（1977）富有哲理，充满对当今世界的批判色彩。

哈维科除创作诗歌外，还发表了反映 1918 年国内战争的长篇小说《私事》（1960）和包括 14 部剧本的《剧作选》（1978)。其中有的剧目改编为多集电视剧在芬兰国家电视台播放。

B.卡尔佩兰

波·卡尔佩兰（1926— ）瑞典语诗人。他出身于赫尔辛基

一职员家庭，父亲为银行职员。他大学毕业后在赫尔辛基市图书馆工作多年,从 40 年代即开始用瑞典语创作诗歌。他是芬兰 20 年代瑞典语现代派诗歌的后继者，但他不是单纯地模仿前者，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充实。他主张诗歌不是虚拟现实，而是摹拟现实，这一点与芬兰语诗歌相吻合。诗人经历了动荡的岁月后，对人生感到茫然，其诗歌格调一般较为低沉和伤感。他创作的诗歌内容多是批判这个混乱的世界，缅怀和憧憬已经失去纯真的童年世界。诗人特别注重诗歌艺术，讲究构思谋篇和语言运用，在描写大自然的诗歌中往往达到物我同化，使客观环境与主观意识融为一体。他在早期创作的诗集《昏暗》（1946） 中运用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来抒写个人的内心世界，诗意朦胧。自 50 年代以来，他逐渐从自我中摆脱出来，直面现实世界。如这时期发表的诗集《变换的黑色》(1957)、《 凉爽的日子》（1961）、 《院落》（1969 ）和《源泉》（1973） 等，把城市、院子、儿童的手、妻子的目光和清晨的划桨声均纳入诗中。

卡尔佩兰除创作诗歌外，还写了不少小说。其中反映原子弹爆炸造成灾难的长篇小说《迟到的声音》（1971），特别在语言的运用上堪称杰作。

其他诗人

50年代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诗人。艾依拉 ·基维卡霍（1921—　）是卡累利亚人，战后曾因家乡割让给苏联而经历过无家可归的痛苦。早期发表的诗集《蓝色的岩石》（1942 ）和《威士忌之歌》（1945） 属古典风格，严谨、明快，有“ 抒情的理性主义 ”之称。从 50 年代开始,诗风发生变化,接近现代派。在她的诗中往往融具体与抽象于一体，这特别表现在诗集《离开草地》（1951） 和《鸟群》（1961） 中 。

阿依拉·麦里卢奥托（1924— ）出生在皮耶克塞麦基一书香门第，父亲为教师。她于1946年发表的处女作《玻璃油画》被认为是“代表了战后一代青年人的声音”，并称该诗歌宣判了“缺乏幻觉和囿于理想主义的老式诗歌的灭亡”，从而一举成名。她发表的其他诗集还有《病姑娘的舞蹈》（1952）、《恶梦》（1958）、《眼睛的尺度》（1969）和《生命之歌》（1972）等。

安娅·娃梅尔伏奥(1921— ）出生在里黑麦基一商人家庭。她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人运动并从事文学创作。她写诗歌也写小说。她创作的诗歌具有自传性质，反映自己参加工人运动的欢乐和失望。富有激情，受苏联诗人玛雅柯夫斯基诗风的影响很深。其主要诗集有《太阳的女儿》（1943）、《热、冷》（1960）、《小鸟》（1970）和《真理的反抗》（1973）等。她发表的小说多是反映爱情生活的，如短篇小说集《爱情故事》（1953）、《白乌鸦》（1962）。娃梅尔伏奥在长篇小说《最后的克娄巴特拉》（1949）中塑造的小说人物形象为个性很强的女性，既不屈服于生活，也不悲观失望，是作家自己的真实写照。

拉西·努米(1928—)出身于赫尔辛基一神职人员家庭,父亲为传教士，曾在中国湖南传教。他大学毕业后在《芬兰画报》任评论员，当过芬兰作协主席和芬兰国际笔会主席。他的诗歌具有洛可可风格，色彩斑斓。诗歌题材广泛，包括古代芬兰历史，基督教和东方文化。音乐和绘画艺术也融于诗中。早期发表的诗集《存在欲》（1949）运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对人的欲望的无知进行了描述。《山上放牧》（1949）则具有中国田园诗歌特色，注重表现大自然的光和色。运动和变化构成努米诗歌的基本要素，如森林中光和影的移动，大自然景色的变幻，沟壑中潺潺的溪水经常出现在他的诗中。生命在于运动，大自然的一切都孕育着生命的

勃勃生机。努米后期创作的诗歌对混乱的现实世界表示关切，追求永恒的宁静生活。努米这一时期发表的主要诗集有《我要你听到》（1954）、《天地的标志》（1956）、《六韵步诗》（1963）和《今天动身》（1977）等。

托玛斯·安哈瓦（1927— ）出身于赫尔辛基一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工程师。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文学报刊任编辑工作，在50年代首先发现了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作家和诗人，如哈维科、麦里、萨拉玛、萨里科斯基和许吕等。安哈瓦具有敏锐的头脑，对现实世界持怀疑态度。他是多面手，既写诗歌、评论，又从事翻译工作。他的诗歌受中国格律诗和日本俳句的影响，简短精练，立意深邃。其主要诗集有《诗歌》（1953）、《36首诗》（1958）、《第六本书》（1966）等。他翻译了大量英、法、联邦德国、瑞典和日本的诗歌。安哈瓦是芬兰研究和介绍日本文学的主将，并且首次把中国古典诗词和"新批评"引介到芬兰国内。

V. 霍维宁

威科·霍维宁（1927— ）小说家。他出身于西莫城一森林主家庭。他毕业于森林专业，并从事了两年森林保护工作，1957年成为专业作家。

霍维宁从50年代开始了创作生涯，最早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圆木》（1950）和长篇小说《偏僻地区的思想家》（1952）可以说是塑造芬兰人民形象的新篇章。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边远的农村，人物形象都是普遍的劳动者，人物活动的场所是林区。这种典型的乡巴佬们对一切都好奇。在他们看来，城市人的忙忙碌碌是荒唐可笑的。小说的格调诙谐幽默，引起读者广泛的兴趣。

后来霍维宁的小说风格和题材都发生了变化，讥讽多于幽默。如讽刺教会的长篇小说《人们的言谈》（1955），宣扬和平主义的

长篇小说《和平的烟囱》（1956），反映人们自私行为的长篇小说《仓鼠》（1957），以及描述青年人厌倦现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冬季旅游者》（1965）等，作者在其中采用了隐喻和象征等一些新的艺术手法，甚至在描述希特勒生平的长篇小说《流氓无赖》（1970）中，还运用了近似荒诞派的艺术手法——夸大或变形，与初期阶段的写实手法相距甚远。

长篇小说《流感》（1978）的题材和风格十分独特。霍维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许多社会弊端，如当政者的失策、生活节奏的机械化和政治上的僵化等。小说描述芬兰北部一个小农庄发生了流感，农庄身体结实的主人首先被传染，接着传染上教堂村的官员。由于防治不力，以致蔓延到全国，甚至越过国界传到非洲，其后果由小病小灾酿成大祸。霍维宁把酿成大祸的原因归结于社会上存在的诸多弊端造成的。霍维宁在小说中展开想象的翅膀，运用生动的比喻，讲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颇受读者欢迎。这部小说堪称为作者后期的代表作品。霍维宁作为一个社会的反叛者，其作用和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v. 林纳

万诺·林纳（1920—1992）小说家。出身于乌尔巴拉区一贫苦家庭，父亲是屠夫。他本人当过农民、森林工人和锯木工人，1955年成为坦伯累市的专业作家。坦伯累是芬兰最大的工业城市，这里的产业大军是芬兰工人阶级队伍中最有觉悟的一部分，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该市的文化事业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工人剧院几十年来一直在芬兰具有指导方向的作用；其文学俱乐部由工人作家组成，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以坦伯累市建立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作家群和以赫尔辛基市追逐国际各种艺术流派的作家群之间的对立，在50年代是十分尖锐的；但是这种相峙的对立局面反过来又促进和繁荣了芬兰的文学艺术事业。作家林纳正

是坦伯累市作家群中的核心人物。由于在文学事业上的功绩卓越，1980 年林纳被选为芬兰科学院院士。

作家林纳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目标》（1947)具有自传性质，描述一位生活曾极端贫困的青年人如何奋斗成为一名作家的故事。第二部长篇小说《黑色爱情》（1948）则倾向心理现实主义，叙述一个青年人在爱情上遭受挫折的故事。作家的独特风格是在名著《无名战士》（1954）和田园三部曲《在北极星下》中形成的。

长篇小说《无名战士》描述芬兰军队中的一个小分队在 1941—1944 年芬苏战争期间所经历的战地生活。这些战士都是普通一兵，既不是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也不是民族精神的化身。他们所经历的生活，也是当时前线所有士兵所经受的饥饿、疲劳、恐惧和死伤等，这也是战争的实际内容。作家以细腻的白描手法，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真象。他塑造的一个个士兵形象，虽容貌、性格各异，且操不同的方言，但对这场战争都深恶痛绝。林纳曾在《我为什么写这篇小说》一文中指出：“我谴责人们通常所指的战争狂人，不论他以什么形式出现。因为他是导致战争的祸根。战争的爆发不是由于客观环境造成的，而是由于人造成的。况且客观环境也是由人来创造的。”可见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把批判的锋芒正是指向了那些“战争狂人”。这部小说一经发表，立刻成为畅销书，并被译为多种文字走向世界文坛。芬兰不惜耗费巨资将它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在北极星下》，描述居住在海曼地区一个佃农家庭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其时间跨度很大,从 19 世纪的 80 年代写到 20 世纪的 50 年代。小说同时反映了当时芬兰社会各阶层人民对待这种社会变革，如妇女地位、民族觉醒、芬兰语言的地位、租佃制度等的不同态度。尤其可贵的是林纳在这部小说中，对许多历史事件做了符合历史实际的描述，为被资产阶级作家多年所歪曲的史实平了反。他以翔实的史料展示出，由于社会存在的

贫富不均的加剧和暴力肆虐而导致 1918 年内战爆发的必然性。他从内战失败者工人赤卫队的角度审视了这场历史悲剧，并首次使用了“资产阶级白色恐怖”一词。他在小说中还塑造了一名赤卫队指挥官的光辉形象。林纳受托尔斯泰“决定历史进程的是人民”这一观点的影响，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主要人物都是普通劳动者，一些重要场景都没有领袖人物出现。因此这是一曲歌颂普通芬兰劳动人民的颂歌。

林纳具有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和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在艺术上颇有造诣。他塑造的许多小说人物形象丰富了芬兰文学艺术的画廊，他在小说中运用的新的语言为芬兰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芬兰国内学者称林纳为“一代宗师”。

E. 约恩伯尔托

艾娃·约恩伯尔托（1921—　）女小说家。她出生于萨玛地区一商人家庭，父亲经商。她高等学校毕业后在新闻和广告部门工作多年，1950 年成为专业作家。

约恩伯尔托是 50 年代崭露头角的现实主义女作家。她的作品具有 50 年代芬兰叙述文学的基本特点，文笔朴实无华，语言流畅。她塑造的人物性格坚实可信，从不加以夸张和修饰，更不赋予理论评说或心理剖析。她总是与作品中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客观描述，但又能令读者领悟到作者对其人物所持的爱憎态度。她的艺术风格和对人的理解都是实事求是的。约恩伯尔托早期创作的小说就立足于芬兰南部乌西玛这个地方。它是农业、手工业和现代化工业的交叉点。反映该地区特殊的多层次的社会生活状况构成她小说的主要内容。探讨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她早期作品的特点之一。长篇小说《只是约翰》（1952）描述农村小商人约翰不喜欢自己的职业，热爱大自然，最后终于离弃了爱财如命的妻子，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过上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在

芬兰文学作品中反映人回归自然，返朴归真是经常的主题，然而很少有人描述得像她那样细腻生动，约恩伯尔托在艺术上获得了成功。探讨新与旧生产方式的矛盾成为她早期作品的又一个特点。长篇小说《在水上行走的姑娘》（1955）叙述坐落在城镇和农村之间一座庄园里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约恩伯尔托早期作品的第三个特点是，在众多的男女人物形象中通常男人形象多是无能之辈，而女人则是生活的强者。在当今妇女仍处在被歧视地位的社会里，她的这一举动无疑具有挑战性质。

约恩伯尔托 60 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如反映妇女命运的《聪明人坐在暗处》（1969 ）和反映不和谐婚姻的《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1969）在艺术上均未达到理想的水平。进入 70 年代以来，她连续创作出系列长篇小说《所有的门都打开》（1974）、《如同手中捧炭》（1976）、《咸雨》（1978 ）和《前厅和门槛》（1980），在艺术上有了新的起色。作家在系列小说中，以 1919 年春至 1928 年秋为小说的广阔历史背景，通过商人海尼宁家族变迁这条主线，反映芬兰取得独立后的最初 10 年的社会动态。其中包括芬兰经济和文化的复兴、政党之间的分裂、禁酒令时期的混乱状态以及艰难岁月的到来。约恩伯尔托依靠翔实的历史资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具有真实可信性。系列小说既是一部时代的缩影，也是一幅民俗画册。它映照出生活在艰难中的芬兰人民顽强拼搏的精神，他们经历了错误和失败直到最后取得了成功。作者认为，只有经历过无数次失败而最终取得成功的人才是最值得尊敬的，她正是要为这种人歌功颂德。约恩伯尔托在这几部长篇巨著中显示出驾驭生活和概括生活的艺术能力，对其中每个人物均进行了不同的艺术处理，最后各得其所。芬兰国内有的学者称这几部作品是“乌西玛史诗”。

V. 曼瑞

维约 · 曼瑞（1928— ）小说家。他出身于维堡一军人家庭，父亲是上尉。他毕业于大学历史系，曾在出版部门工作多年。

作家曼瑞如同林纳一样，也写战争题材的小说，但在艺术手法上却与林纳迥然不同。林纳亲自经历了战争，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战争进行客观描述。在林纳的小说中客观世界是稳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只能与之相适应。但林纳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在客观世界呈现异常混乱的状态下，人能够保持清醒。曼瑞对战争没有直接体验，在他的小说中主客观世界的界限模糊，客观环境可以充满人的意识，而人的意识也可以改变客观环境。同时小说中的人物缺乏理性，往往表现出荒谬和不可思议。在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白棕绳》（1957）中，主人公约塞是个上了年纪的炮兵，有一次他在前沿阵地拾到一根白棕绳，打算休假时带回家晾衣服用。他怕被军警发现，动身前把绳子紧紧缠在自己的身上。在返回故乡的列车上，由于长时间受到绳子的束缚和列车的颠簸，他几乎失去知觉，多亏列车员的帮助才踉跄地下车回到家中。他妻子见状大惊，急忙用剪刀把钳在身上的绳子剪断，只见其浑身呈现出青紫色。经过多日，这位炮兵才恢复了健康。曼瑞在这部作品中叙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似乎是荒唐可笑的，但作品的立意深远。主人公约塞代表当时的芬兰，绳子代表它执行的中立和不干涉的对外政策。作者认为，在战争年代芬兰企图依靠中立和不干涉的对外政策来保全自己是徒劳的，如同约塞的举动那样可笑。作家曼瑞在艺术上一反传统的写实方法，在作品中大量采用象征、隐喻、意识流和时空错位等现代派艺术手段，从多角度对战争进行了审视。他把这一情节非常简单的故事编织成引人入胜的洋洋大作，使广大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芬兰国内有的学者称曼瑞为“芬兰杰出的用多棱镜观察现实生活的

作家”。曼瑞其他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1918 年事件》（1960）、《阵地》（1964）、《上校的司机》（1966）和《中士的儿子》（1971）以及作家基维的传记《阿列克西斯·斯登瓦尔的一生》（1974）.

A. 许吕

安蒂·许吕（1931— ）小说家。他生于库依瓦尼也米一商人家庭，父亲经商。他大学毕业后为电力工程师，1958 年成为专业作家。

如果说作家林纳是对现实的批评者，在他的作品中纠正了多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错误认识，如果说作家曼瑞是对现实的设计者，在他的作品中构筑了一个荒诞的世界，那么作家许吕则忠实、客观地描述了现实世界，反映了长年保持着古老生活方式和习俗的芬兰北方农村的劳动者。许吕热爱这近乎原始的生生不息的普通农民，尊重他们多年来依然保存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以此来与现代文明社会相抗衡。在他的作品中虽然也涉及到对战争的描绘，但它仅是时代流程中的一个短暂历程，并不决定人物的命运。描述童年以及童年时代的生存环境往往形成他诸多小说的主要内容。许吕的代表作品，系列长篇小说《家庭》（1960）、《小学》（1965）、《父与子》（1971）和《活动桥》（1975）具有自传性质，反映作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状况。他采用平铺直叙的写作手法，娓娓道来，对人物不进行心理描绘，也不在作品中提出诸多问题及描述解决问题的方法。许吕展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客观世界，一个真实可信、亲切可感的客观世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P. 林达拉

巴沃·林达拉（1930— ）小说家。他出身在维堡一知识分

子家庭，父亲为土壤学专家。他 1951 年入大学学习神学，后当过装卸工和建筑工人，1955 年为专业作家。他自 1969 年始，任芬兰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

林达拉具有 50 年代许多重要作家的特点。他如同林纳那样力图在作品中对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赋予新的观点，并在众多的矛盾冲突中不是站在“官方”一边，而是站在“民众”一边；如同麦瑞那样采用特殊的小说结构来探讨对战争的看法；如同许吕那样描述芬兰北部地区童年时代的环境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对现代化城市的陌生感；如同约恩伯尔托那样喜欢探讨各种不同的道德价值观。

林达拉的重要作品，如长篇小说《富人和穷人》（1955）对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进行了对比，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商人哈库里甚至分不清“人和商品之间的差别”。著名“奶奶”三部曲，即《我奶奶和曼纳兴》（1960）、《我奶奶和元帅》（1961）和《奶奶和玛尔斯的故事》（1962）反映芬兰社会两种不同阶层人物的命运，奶奶和元帅从未相遇，然而两个人的生活历程却十分相似，最后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从 60 年代后半期林达拉连续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战争与和平的小说，如《战士的声音》（1966）、《战争与和平的声音》（1967）、《列宁格勒命运交响曲》（1968）、《来自北极的声音》（1969）和《在伪装背叛者的战线上》（上、下册 1976—1979）等。林达拉在这些作品中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态度极为明朗。林达拉在六七十年代还创作出反映芬兰战后社会变革的长篇纪实小说《巴锡基维时代》（1969）和《吉科宁时代》（1970）。这两部作品气势恢宏，手法不凡，颇具时代色彩，特别在芬兰舆论界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M. 瓦尔迪奥

玛丽娅-丽莎·瓦尔迪奥(1934—1966) 女诗人、小说家。她出生于塞明基一职员家庭,父亲为教师。她1950年大学毕业,1955年与著名作家哈维科结婚并专职写作。

女作家瓦尔迪奥的文学生涯是从创作诗歌起步的。她早期发表的诗集《婚礼》(1952)和《花环》(1953)具有明显的古代民间诗歌特色,其中只有一首长篇叙事诗《女人和景色》富有超现实主义色彩。

瓦尔迪奥创作的小说一显著特点是把卡累利亚的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古迹融为一体。其主要作品有反映男女之间爱情婚姻波折的小说《那是一个春天》(1957),反映家庭妇女生活的小说《所有的女人都做梦》(1960),反映青年人初恋的小说《情感》(1962)和反映人际间冷酷关系的小说《那些鸟是她的》(1967)。特别是她去世后出版的《那些鸟是她的》这部小说,瓦尔迪奥采用两个女人对话的写作方式,描述她俩为争夺神文留下的那份鸟的遗产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充满了戏剧性,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是她的一部力作。

P. 霍拉巴

奔蒂·霍拉巴(1927—)诗人、小说家。出生在于里基明基一资产阶级家庭,父亲为商业老板。他中学毕业后在书店和广告公司工作多年,后曾任《赫尔辛基新闻》驻巴黎记者、《当代》杂志主编和芬兰教育部次长等职。

作家霍拉巴在诗歌创作方面追求新的艺术风格,反对古典主义倾向。他发表的诗集《大地之子》(1953)、《近旁》(1957)和《看着你的双眼》(1959)格调低沉、伤感,但在诗歌结构和语言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使之独具风采。

霍拉巴在小说创作方面特别注重视觉艺术的发挥。他认为现代人处在物质世界的包围中，只能通过视觉观察它的表层，故着重对物质世界的描绘，而不注重塑造小说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霍拉巴受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较深。他发表的著名长篇小说《传统的特征》（1963）就是采用视觉艺术方法创作的典范。其故事情节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人物形象淡化。

70 年代以后霍拉巴作为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进入芬兰内阁担任教育次长，这使他特别注视芬兰政治时局特别是左派势力发展趋势。他于 1976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长途跋涉者》就是反映芬兰左派势力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然而其艺术风格却迥异于以往的工人文学作品，霍拉巴在其中采用了一些新的艺术手法，如回忆、幻觉、梦境等。

第四节　60 年代的文学

芬兰战后文学总的特点有两个，即艺术上的创新和对近代历史的反思。艺术上的创新突出表现在抒情文学（诗歌）方面，对近代史的反思主要表现在叙事文学（小说）方面。随着芬兰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通过先进的传播工具如电视等可以及时了解到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芬兰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落后国家了。芬兰在战后产生了新的一代。他们虽然没有参战的经历，但受当前世界局势的影响，普遍对政治感兴趣，因此 60 年代的“参与”文学便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政治诗歌、政治剧目、抗议歌曲、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等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中经常出现。60 年代的诗人和作家一般对当代社会持批判态度，矛头直向官僚主义、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种族压迫、政治偏见、军国主义和独裁专政等痼疾。他们往往采取通俗易懂的民间日常语言和讽刺

挖苦的艺术手法，其作品很能吸引广大读者和听众。在诗歌领域，把报纸标题、街头对话和政治表态均纳入其中，在叙事文学领域出现了许多纪实文章、政治杂文和宣传小册子等非纯文学作品。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60 年代涌现出一批有才能的诗人和作家。他们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本人大都是工人组织或进步党团组织的成员，对工人的生活及其居住环境有亲身的体验和了解，故能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劳动。特别是作家们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人物对话，其中多是土话、行话、方言和俗语，以表达主人公的粗鲁、爽直和慓悍的性格特征。小说中的故事多与时代密切相联。其背景与许多重大国际事件相关，如越南战争、肯尼迪被刺及卫星上天等；同时也涉及到芬兰国内出现的社会经济变化、人口外流等问题。这些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般并不是工人运动中的英雄，而是普通劳动者，他们经常挣扎在失业和贫困的战线上，被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年代跨度很大，从 1918 年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他们的写作方法总的说是现实主义的，这一批工人作家成为 60 年代叙事文学的主力军。他们的名字是萨拉玛、卢特、辛科宁、巴洛宁和奥亚哈尔尤等。

P. 萨里科斯基

本蒂·萨里科斯基（1937—1983） 诗人。他出身于伊姆皮拉赫底一职员家庭，父亲为政府职员。他于 1954 年入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古希腊和罗马文学，1958—1960 年为《大学生报》和《新芬兰报》撰稿人，1963 年为《人民新闻》副主编，1964—1967 年为《当代》主编。他后来专职写作。萨里科斯基短暂的一生创作甚丰，共发表 20 部诗文集。他学识渊博，精通古今世界文学名著，既翻译过《荷马史诗》，又翻译了《尤利乌斯》，在他自己创作的诗文中，既能觉察到古典文学和哲学的传统影响，又能体会到他对当代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

萨里科斯基是 60 年代芬兰诗坛的明星。他早期发表的诗集《诗》（1958）、《另一些诗篇》（1958）和《诗和希波纳式诗》（1959）结构严谨，简短精练。但是自 60 年代他发表的第一部诗集《世界》（1961）以后，文风有所变化，诗人以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来反映时代现状和人生。

诗集《究竟发生了什么？》（1962）是萨里科斯基的代表作品，也是他创作的转折点，开始干预时尚，他在这个诗集中把抒情与政论、高尚与渺小、美与丑及公与私混淆在一起，它们在其中自由的斗争。正如诗人自己所云：“我从报纸上，人们的言谈对话及我个人的言论中收集诗句，将它们放在一起，使之成为民主的具有辩论色彩的篇章”。他这种独具一格的诗风对 60 年代的芬兰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国会被解散，
晨报上登载了照片，
从中可以看到：
总统吉科宁的
忧虑的表情。
芬兰在地图上，
成了一个黑点，
如同破碎了的眼睛。”

诗人此时关心时局，维护民主和自由，主张正义，并加入了芬兰共产党，曾被邀赴苏联进行访问。

萨里科斯基诗歌的最大特点是非常口语化，便于朗诵。诗人自己也特别善于朗诵，加之他嗜酒成性，朗诵时狂放异常，所以他如同一位流行歌手那样很快就名声大作，人们称他为“芬兰新诗派中最肆无忌惮的诗人”。这个时期他曾代表芬兰参加了世界诗

歌狂欢节，在那里他的朗诵如同“现代的万奈摩宁”。这个时期他创作的其他两部诗集《我到处流浪》（1965）和《呐喊》（1966）力图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反映现实，但多少已流露出悲观伤感的情绪。60 年代末期发表的诗集《从斯大林头上望去》（1969)标志着萨里科斯基干预时局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在这部诗集中宣称自己成为一个“失败的革命者”。

70年代以来萨里科斯基诗歌的格调已经完全改变。他认为世界是荒谬的，自由不可能实现，自己只感到恐惧和疲倦。他在晚年创作的舞蹈三部曲，即《山上的舞池》（1977）、《参加舞会》（1980）和《阴暗的舞会》（1983）富有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诗人把世界描绘成一座人类的迷宫，在这座迷宫中游荡着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这个怪物即暗指束缚人们思想和理论的一切桎梏。诗人认为只有消灭这个怪物，人类才能得到自由和解放。

V. 基尔斯蒂奈

维诺·基尔斯蒂奈（1936—　）诗人。他出身于土尔纳瓦地区一农民家庭，父亲务农。他大学文科毕业后当过芬兰语教师和新闻编辑。

基尔斯蒂奈特别推崇超现实主义，他翻译了法国作家勃勒东编写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一书。他早期发表的诗集《旷野》（1961)、《迟缓的太阳》（1963）和《言论》（1963）就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

60 年代中期基尔斯蒂奈开始干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发表的诗集《自然的舞蹈》（1965）以散文诗的形式描绘原子弹爆炸的过程 同时涉及到哲学、宗教、应用经济和技术。诗集《长远的 LSD 计划》（1967）写到诸如现代化社会生产的计算机、电视机等对人的控制。在现代化社会里人成了物的奴隶。

诗集《乡村住所》（1969）格调舒展、活泼。这时基尔斯蒂奈

已脱离开喧闹的城市来到恬静的乡村。诗人居住在乡间住地，好奇地观赏着五彩缤纷的花卉，聆听着叮当悦耳的小溪声和鸣叫的鸟声，感到心旷神怡，使整个身心陶醉在美妙的大自然的怀抱。

诗集《不可代替的生活》（1977）是基尔斯蒂奈 70 年代发表的重要作品。他置身于现实世界中，观察苹果树的生长，冰的融化，焚烧报纸和煮咖啡。诗人在一首诗中写道：

“烧掉这些枯萎的稻草，
让这地方长出新的绿苗。”

在另一首诗中他又写道：

“我的机器飞快地转动，
但要扭转这混乱的世界，
却无能为力。”

基尔斯蒂奈面对这具有严重缺陷的现代化社会，虽然有美好的理想，但由于个人能力所限，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

M. 洛西

玛蒂·洛西（1934—　）诗人。他出身于索塔瓦拉一军人家庭，父亲是退役陆军军官。他大学文科毕业后去英国和美国进修，并在英国广播电台芬兰语部工作多年，回国后任《文化月刊》主编。

洛西是以翻译外国诗歌走上文学生涯的。他创作的诗歌深受西班牙文化的影响，具有拉丁美洲文学的那种战斗性和反抗性，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色彩和旋律。洛西首先是一位政治诗人，诗歌往往成为他手中的斗争武器。

洛西早期发表的诗集《舞台人物》（1965），以古典戏剧中的主角奥赛罗来编织现代故事，反映当代现实生活。诗集《两个人的玩耍》（1966）反映爱情生活的发展和消逝，欢乐和痛苦。

后来诗人洛西对世界的认识加深了。如诗集《场合》（1967）探讨了暴力问题。他认为世界将变成一个暴力的大磨盘。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会被这个残忍的庞然大物碾得粉碎。洛西在作品中把小品文、政论文、戏剧和超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手法融为一体，闪现出独特的艺术光彩。诗集《转折点》（1968）反映了苏联侵占捷克事件，洛西对此举表示了反感，同时他宣布放弃对苏共的盲目崇拜。进入70年代以来，洛西写了大量的宣传鼓动诗，以适应不同集会和场合的需要。其诗歌主调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革命的正义性。

洛西后期发表的两部诗集,如《铁流之歌》（1975）反映芬兰工人运动的发展史,《火红的鸟》（1983）是对和平的颂歌。

P. 萨里查

本蒂·萨里查（1941— ）诗人。他出生在赫尔辛基一工人家庭，父亲为管道安装工。他大学文科毕业后曾任《大学生报》和《芬兰社会民主报》文化编辑。

萨里查在诗歌中抒写他遇到的一切，阐述“世界对我”和“我对世界”的关系。他在创作中强调联想的重要性，并经常采用第一人称的方法。因此国内有的评论者称他是“自我陶醉者”。然而萨里查并没有把自我封闭起来，与世隔绝，而是把“我和我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紧密相连。他对阻碍人们相互友好交往的举动特别反感。

萨里查早期发表的诗集《褪色的标记》（1965）和《明天我活得更好》（1966）是以超现实主义的目光观察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的。后来发表的诗集《我不会停止》（1967）、《会员证的附

件》（1971）和《秋歌》（1973）则接近现实生活，诗歌语言也趋向朴实无华。萨里查关心国内外大事，关注人世间事态的发展变化，从中捕捉诗的灵感，挥洒成篇，抒发自己的观感。

L. 胡尔登

拉尔斯·胡尔登（1926— ）瑞典语诗人。他出生在皮也达萨里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农民兼作家。他大学毕业后一直留校执教，后升为教授。

胡尔登用瑞典文创作诗歌，其诗歌语言简练而尖锐，且富幽默感。他好用讥诮的艺术手法，在讥诮的背后往往是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思考。在他的诗歌中悲喜交织，常常使读者洒下“含笑的痛苦眼泪”。

胡尔登的诗集《山梨》（1966）格调低沉。诗人对世界人口过剩和原子弹的威力感到忧虑。诗集《爱国诗篇》（1967)背离了传统的爱国主义的诗风。诗人对芬兰历史持有一种不和谐的幽默感。诗集《胡卡先生》（1969）反映人们对科学、宗教和传统的认识。诗集《牧歌》（1973）格调轻快、舒展，充满田园情调，其中包含不少爱情诗歌。诗集《鲁内贝格和他的朋友》（1978）是对古代诗人鲁内贝格的颂歌；同时诗人表明自己是他的后继者，也是贫民百姓的代言人。

瑞典语诗人胡尔登是芬兰人道主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主持正义，反对邪恶，在其诗歌中时有表现。同时诗歌言简意赅，富有智慧，深受读者欢迎，其中不少诗歌被谱成歌曲演唱。

C. 安德逊

格拉斯·安德逊（1937— ）瑞典语诗人。他出身于赫尔辛基一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经理。他大学医科专业毕业，曾当过精神病学医生。

安德逊是芬兰瑞典语诗歌第二代的佼佼者。他摆脱了 20 年代瑞典语诗歌的框架而自成一格，带着俏皮的嘲笑来描述人类“新的世界”。同时他也写小说，其内容是探讨疾病问题，而经常与病态的社会相联系。他善于思考；敏于观察，往往能发现社会的病态之所在，从而指出其危害性。

作为诗人,安德逊在诗集《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1965）中，首次对传统的瑞典语诗歌提出挑战，形式更加自由。在诗集《一个我们将要在其中死去的社会》（1967）中，诗人从国际角度来阐述这个充满灾难的世界，具有强烈的反抗性。他还创作出一些纪实性的诗歌，描述一些精神恍惚、神经错乱者。这与他所从事的医生职业有关。作者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

作为小说家，安德逊创作出两部主要作品。一是长篇小说《在图像的背后》（1973）。描写对精神病患者做护理工作的人。但作者在其中特别指出，失业和流离失所同样也是与精神病同等重要的社会病症。二是长篇小说《美好的年华》（1976）,叙述青年人成长的故事。这些青年人认为当代社会是一座大医院，他们力求寻找一种新的共同生活的模式，来与当代社会相抗衡。从中不难看出安德逊对当代社会的态度。

H. 萨拉玛

汉努·萨拉玛（1936— ）小说家。他出生于科乌沃拉一工人家庭，父亲是电工。作家本人中学毕业后当过电工和农业工人，1961 年为专业作家。

萨拉玛是 60 年代芬兰工人文学中的杰出代表。他发表的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家奖金，并于 1975 年荣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萨拉玛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大胆揭露社会弊端。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多是一些被当代社会所遗弃的流浪者，萨拉玛同情他们的处境。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平凡的故事》（1961）就

是反映一个农村姑娘悲惨命运的故事。他的文笔细腻，描写具体，深深感动了广大读者。

萨拉玛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仲夏节的舞会》（1964）描写一群城市青年遵循古老的传统方式去风景秀丽的乡村举行庆祝仲夏节的舞会。他们认为仲夏节并不是宣扬宗教的洗礼节，而是太阳节。他们企图摆脱宗教的束缚，自由自在地狂欢一番。但其结果一场车祸致使许多人丧生。作者意在表明，在现代社会要想争取自由就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萨拉玛在小说中对芬兰明媚醉人的夏季风光进行了富有诗意的描绘，人物对话使用了许多民间语汇，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艺术上说也取得了成功。但是该小说发表后却在芬兰引起了轩然大波。芬兰右派宗教势力以所谓“亵渎上帝”的罪名对萨拉玛提出了控诉，致使他受到法庭的传讯和罚款，后由于国家总统出面干预，萨拉玛才免于判刑。

萨拉玛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那里的目击者就是肇事者》（1972）通过对主人公萨尔米宁一家的矛盾和发展的描写，反映出第二次大战期间坦伯累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反抗运动。小说中对双料间谍亚科尤卡亚关于从事间谍活动及其动机的交待描写得相当精彩。小说发表后在芬兰共产党内部引起争论。许多人认为此书对共产党员的塑造是不真实的，应当刻画出“勇敢的战斗者”、“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来。然而也有人认为小说毕竟不是历史，是允许作者虚构的。

萨拉玛在接连遭到左右两派的批评之后，心情一度很消沉。他这种情绪是通过后来继续创作的系列中篇小说《芬兰的亚》中的一个人物的自白表明的：“我虽然在文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不愿在这个国家当作家了。”

A. 卢特

阿尔色・卢特（1943—　）小说家。他出身于赫尔辛基一劳

动人民家庭，父亲是鞋匠。他中学毕业后曾当过鞋匠，还当过售货员和仓库保管员，1968年成为专业作家。

如果说作家萨拉玛的小说多取材于富有工人斗争传统的大工业城市坦伯累，则卢特的小说多取材于首都赫尔辛基。卢特小说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经常把反映日常工作和生活与世界重大事件相联系。阅读他的小说，既可感受到工人在家庭、工作和爱情中的欢乐和痛苦，又可感触到国际风云的变幻。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表面看来似乎平庸无力，但实质上却是有头脑、有见地的典型的城市无产者。

卢特发表的处女作《结婚》（1967）反映青年人婚姻不自由，在选择配偶所遇到的种种阻力。第二部长篇小说《木板房》（1969）描写一群流浪在城市街头的青年人自愿组织在一起共同谋生，但是由于内部组织纪律涣散和不团结最后终告分裂。作者意在表明，只有大家一条心，劲往一处使，才能创建共同生活的基础。卢特自幼生活在城市贫民地区，了解这些青年人的生活习性，所以写来得心应手，人物形象活龙活现，艺术上取得了成功。

卢特的长篇小说《尤林下士》（1971）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某炮兵部队服役的下士尤林与因积极参加政治斗争而被囚禁入狱的哥哥之间的矛盾斗争。作者通过兄弟俩之间的意见分歧，映照出当时工人运动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

长篇小说《故国》（1974）反映一对年轻夫妇在自己国内无法生存，只好逃离国外谋生的故事。卢特在这部小说中结合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深入探讨了造成六七十年代芬兰一些居民移居国外谋生的原因。长篇小说《上升时期》（1977）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工会干部和工人报刊编辑，虽然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却碰了壁，最后导致家庭破产，本人精神崩溃。

作家卢特富有幽默感。长篇小说《故国》和《上升时期》，其

书名具有极强的讽刺性。《故国》对这一对年轻夫妇来说不是故国，《上升时期》对那位工会干部来说也不是上升时期。作家反其意而用之，其小说的社会效果会更佳。此外，卢特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妇女的岁月》（1975）也具有喜剧效果。

L. 辛科宁

拉西·辛科宁（1937—1976） 诗人、小说家。他出生在维堡一工人家庭，父亲为金属工人。他受过中等教育，当过洗涤、建筑、金属和油漆工，1968 年成为专业作家。

辛科宁从写诗开始了其创作生涯，后来从事小说创作。他早期发表的诗集《迷乱的上午》（1965）和《宽松的衣服》（1966）以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来反映日常生活。辛科宁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追求人性的自由，但由于受传统的和社会的压力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沦为不自由和暴力的牺牲品。

长篇小说《迷雾》（1968）中的主人公是个失业青年，他找到了一个汽车油漆工的职业，很快升为工头，后被厂主收买，成为他的代理人。在这位新型代理人的领导下，企业越来越不景气，工人内部也出现分歧。最后搞得他焦头烂额，处境极其艰难。在长篇小说《索尔薇格之歌》（1970）中，作家辛科宁塑造了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新女性，她带领几代人为生存进行不懈的斗争。其续篇《索尔薇格和尤西》（1973）则反映了当代青年工人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场所成为以汗水和眼泪浇铸的工作地，他们个人的爱情、婚姻、生儿育女只是虚幻的泡影，可望而不可及。辛科宁试图从工人中寻求可信赖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然而结果一方面是虚幻的乐观主义，一方面是实在的悲观主义。辛科宁的小说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小说结构较为新颖，很能吸引读者。

s. 巴洛宁

萨姆里·巴洛宁(1917—1974) 小说家。他出生在维洛拉赫底一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鞋匠。他当过锯木、森林、渔业、玻璃、油漆和电业工人，47 岁才开始创作生涯。在短短的 10 年期间他发表了 10 部文学作品，其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些被现代社会遗弃或排挤的普通劳动者。巴洛宁以同情的笔触叙述了他们的悲惨命运，向读者展示出一个极其阴暗的世界。如长篇小说《井》(1970)、《木板房中的屋子》(1971)和《反抗》(1973)都是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他们在死亡战线上挣扎。因为巴洛宁当过多年工人，对他们的生活处境有亲身的体验，所以写出的作品非常真实感人，深受工人和农民的欢迎。

巴洛宁发表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写战争的，如他的成名作《死亡的道路》(1967) 叙述第二次大战期间芬苏之间的续战。巴洛宁在作品中谴责了这场战争，认为战争是毁灭，是厮杀，是掠夺，是死亡。他的优秀短篇小说集《第八号房间》(1969) 以生动的事实描述了战争毁灭了一代人的故事。

第五节 70—80 年代的文学

进入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芬兰诗歌领域刮起了一股新风：诗歌多取材于日常生活的琐事，注重抒发自然景色和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人们多采用自由体的诗歌形式，任凭自己感情的迸发，诗意很浓，颇能感染读者。这股新的诗风首先是从基尔斯蒂奈的诗歌《乡间住所》和两位小说家创作的诗歌，如奔纳宁的《感谢幻觉》和基尔比的《爱情之歌》中表现出来的。

在叙述文学方面，70—80 年代出现了所谓‘中产阶级文学’和“变化中的农村文学”。中产阶级文学多反映知识阶层的现状，这

些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已非从前，失去了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在事业上难以取得成功，在解决问题能力方面，也往往束手无策。同时也提到中年危机。这些中年人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往往不知向何处发展。他们或因离婚而导致家庭破裂，动摇了自认为牢固的生活基础，或因两代人的矛盾而导致父与子分道扬镳。从前认为不可动摇的生活价值观已失去效力，宗教再也不能左右人们的道德信念。发展民族事业的理想，或为祖国而献身的打算更不能指导人们当今的实际行动了。

在芬兰文学中，战前反映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的作品往往占据了中心地位。可是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都普遍认为，农村题材过时了。然而至七八十年代，生活在赫尔辛基和坦伯累两大城市以外的作家们主张文化服务要分散，随之农村题材的作品又兴旺起来。一些作家把目光集中到国家对农村政策的失误上，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重又开始反映当今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了。

H. 麦基莱

哈努·麦基莱（1943— ）诗人。他出身于赫尔辛基一职员家庭，父亲为中小学校教师。他本人大学文科毕业后也当过语文教师和出版社编辑。他至今已发表 9 部诗集。

麦基莱在诗歌中主要是描写自我，也探讨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人的价值。他在诗歌中经常表露出对人生感到厌倦和失望的消极情绪。他从周围环境中撷取创作题材，从描绘日常生活琐事，如家庭生活、就餐、睡眠及野鸭从屋顶飞过等入手。大自然、儿童和童年时代成为他经常写作的题材。他特别善于捕捉对事物瞬间的感觉和印象。麦基莱通过对大自然景色变幻的描绘，来反映自己感情的变化，他尤其喜欢描写夜景，只有静谧的夜晚才能使诗人得到某种精神的解脱。

麦基莱最初发表的两部诗集《蓝天，灰冰》（1966）、《告诉我你的名字》（1969）总的基调虽然是乐观的，但也透出诗人对人生感到茫然的心情。他在诗集中对当代社会存在的诸多不良现象和中产阶级毫无生气的生活进行了批评。他在第三部诗集《乌云密布山岗》（1972） 中对城市人民及自我进行了审视，悲观情绪有所增长。同时对童年时代的纯真世界表示向往。诗集《古老的住宅》（1973）、《秋天不期而至》（1974）和《假若生活骗了你》（1975）基调异常低沉，反映人们的孤独感和陌生感，以及对爱情的绝望心情。诗人认为当代社会是造成人们苦难的根源所在。麦基莱在诗集《黑暗无边，我的幸福和快乐同样无处可寻》（1976）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忧伤和暴力的世界，然而人们又必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这部诗集的体裁形式类似散文诗，诗句均较长。麦基莱后来发表的两部诗集《夜影》（1979）和《如同人一样》（1980）是写景的，反映自然界中的生物具有人性，它们也感到孤独和冷漠。

J. 拉依奈

亚尔科·拉依奈（1947— ）诗人。他出身于上尔库一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工人。他大学毕业后即搞文学专业，当过文学刊物《帕尔纳斯》的秘书，后任该刊主编和芬兰作协主席。他头脑灵敏，写作勤奋，至今已发表 9 部诗集和 7 部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创作剧作和杂文，翻译马可·吐温等名家作品。但是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拉依奈是 60 年代芬兰先锋派文艺的代表人物。他早期创作的诗歌受美国诗人惠特曼和当代垮掉派诗人金斯堡的影响，以声嘶力竭的愤怒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他的小说反对政治教条主义和强权政治。他是西方当代社会的叛逆者。

拉依奈第一部诗集《塑料佛像》（1969）发表于先锋派时期。它反映城市青年的现状，城市是生活的中心，是永不枯萎的花园，

但在这花园里盛开着没有爱情的花朵。第二部诗集《火与冰的杂技场》（1970）反映青年人对生活的眷恋和忧虑。第三部诗集《如此行事》（1971）颇似黑色幽默，诗人以讥诮的笔触渲染毁灭和无望。第四部诗集《笨鸟起飞》（1973）反映诗人对周围世界有了新的认识："这个世界异彩纷呈"，诗句趋于简短和通俗化。第五部诗集《五个先令的哈姆雷特》（1976）的主题是探索，诗人成为无止境的探索者。第六部诗集《天堂》（1978）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世界的顺从和接受"反抗会使人衰老"。第七部诗集《生活是旅店》（1980）抒写了大自然的风光："一年四季的变化，鸟群、树木和微风"；"鸟飞向异地／从树枝上掉下雪屑／生活不过如此"，重又反映出诗人对生活的厌倦之情。第八部诗集《美国牧童》（1981）反映出诗人对美国化的反感。诗的格调沉重而哀婉。第九部诗集《野树》（1984）充满空虚和死气沉沉的气氛："大地冰封／太阳黯然失色。"

N. 拉乌哈拉

尼洛·拉乌哈拉（1936—　）诗人。他出身于基蒂莱一劳动人民家庭，父亲为农民。他于1963年大学神学系毕业后在开密省当牧师，1977年成为芬兰赞美诗委员会成员。

拉乌哈拉于1969年发表第一部诗集《夏季至此结束》时已经31岁，但自此勤于笔耕，又连续发表了《河水现在不再流动》（1969）、《我倾听心声》（1971）、《在雪与太阳之间》（1973）、《近海》（1975）和《夜思》（1977）等多部诗集。拉乌哈拉认为，现代文明呈现病态，世界宛如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因此他自己乐意逃遁到大自然中，以求在精神上得到少许安慰。他善于写景，在他的诗歌里，风、雨、雪、海、雾是经常出现的词汇。同时活泼天真的儿童也成为他经常在诗歌中描写的对象：

“孩子的脸贴在冰冻的窗子上，
温暖的呼吸融化成一条缝隙，
从缝隙中可望到院子、森林和天空。
可是当孩子离开这窗口，
缝隙依然被冰花封冻。”

拉乌哈拉后期创作的诗歌触及到当今世界现实，他既写非洲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又写西方世界精神生活的严重空虚。面对这复杂的世界，拉乌哈拉经常是有感而发的。他在创作中采用自由体，诗歌语言朴实流畅，通俗易懂。

R. 拉萨

里斯托·拉萨（1954— ）女诗人。她出身于赫尔辛基一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高级工程师。她大学毕业后任图书馆理员，70年代开始创作诗歌。她的第一本诗集《森林的墙是绿色的门》（1971）发表时只有16岁，仍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拉萨的诗歌质朴自然，清新可爱。她从大自然中捕捉瞬间的灵感，跃然纸上。拉萨认为大自然是一个有机体，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整个世界对诗人来说是坦露着的，一些微小的事物都充满着意义。她写的爱情诗柔情似水，假若在青年男女之间出现矛盾或争吵，也会在女诗人的款款细语中得到平息。

拉萨的诗集《飞翔的麻雀》（1973）反映平静的日常琐事，不涉及什么社会问题。她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

“从波平似镜的水中，
我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这短短的两行诗句，像画家勾勒出的一幅透明的水彩画。诗

集《请安静,他在歌唱》（1974）更接近社会生活，这时诗人把人和大自然分离开，人成为诗歌的主体。诗集《两个工匠》（1976）宛如一幅油画，诗人把森林中微小的植物和动物人格化，赋予它们一种新的含义。诗人拉萨在诗集《在河边路上》（1980）中，把大自然、家庭和孩子当做歌咏的对象，向读者展示出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这正是女诗人一生始终追求的理想世界。

s. 图尔卡

希尔卡·图尔卡（1939— ）女诗人。她出身于赫尔辛基一军人家庭，父亲是陆军少校。她大学毕业后从事农业经济工作，70年代才开始创作诗歌。

图尔卡被戏称为芬兰诗歌界的"女光棍"，由此可知她创作的诗歌独具一格。一般说来，典型的情意缠绵的爱情诗与她绝缘。图尔卡经常在诗歌中嘲讽这个世界。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的人还比不上树木和马、狗等动物，她悲痛地"与马开玩笑"。图尔卡的内心世界是忧郁的，然而经常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显示出来。她创作的诗歌朴实无华，充满智慧，她有时采用自由联想和意识流的表达手法，这尤其表现在她的散文诗中。

图尔卡发表的第一部诗集《宇宙中的屋子》（1973）描绘秋天的萧瑟景象，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的忧郁心境，诗歌格调低沉。图尔卡的散文诗集《夜像秋禾那样敞开胸襟》（1978）篇幅较长，内容包罗万象，既有给朋友的长信，又有抒写哈姆雷特童年的诗，还有献给祖父的即席之作。图尔卡的诗歌中，描写动物的诗仍占一定的比重。例如，她在一首熊的散文诗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写一篇关于熊的童话。它有一颗善良的心，想把这个世界托起，并用呼吸融化掉凝结在上面的冰层。"

K. 苏奥萨尔米

凯图·卡丽娜·苏奥萨尔米(1921—)女小说家。她出生于拉赫底一高级职员家庭，父亲是火车站站长。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教师多年，后成为专业作家。

作家苏奥萨尔米50年代初以写作诗歌走上创作生涯，而60年代发表长篇小说《处女》（1964）后才引起芬兰文坛的注目。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位坚强、孤独的女教师形象。另一部长篇小说《小康人家》（1969）的发表，标志着她的写作风格趋向成熟。苏奥萨尔米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包括语文教师、家庭主妇、牧师夫人和女剧作家等一群中产阶级人物形象，反映她们在生活和事业中的苦与乐、失败与成功。长篇小说《耶稣的小战士》（1976）反映一个鄙视精神价值的小企业主，由于利欲熏心导致精神空虚和家庭解体。苏奥萨尔米在长篇小说《航行》（1974）中，通过描写一个小职员的遭遇，告诫人们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将会导致精神崩溃，这部作品哲理性很强。此外，作家苏奥萨尔米还擅长写中短篇小说。她发表的中篇小说集《亲爱的夫人》（1979）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小城市的生活。苏奥萨尔米编织的故事饶有风趣，其文笔细腻，语言流畅，也不乏幽默和讥讽。她基本上是写实的，但时有意识流等表现手法融于其中。

A. 卡依巴依宁

阿努·卡依巴依宁（1933— ）女小说家。她出身于姆奥拉一职员家庭，父亲为中小学教师。她1955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语文教师多年。

卡依巴依宁在文学创作中往往融古今为一体，“把当代事物移入历史或某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中，有时也把神话佳话中的人和事搬到现代故事中”。其作品的主调是追求自由和平等。卡依

巴依宁早期创作的小说主要反映农村或城镇中知识分子的生活，如长篇小说《混沌的指针》（1960）描绘乡村医生的家庭境遇，《两个学期》（1965）反映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矛盾。

卡依巴依宁的长篇小说《奥鲁城的平凡天使》（1967）标志着她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她采用神话的艺术形式，表现历史上1808—1809年的瑞俄战争。而《玛格达列娜和天下的孩子们》（1969）却借助圣经故事反映当代种族、民主教育和婚姻等问题。在《穿丧服的女人》（1971）中，卡依巴依宁仿效莎士比亚的剧作《仲夏夜之梦》，描写芬兰城市艺术节，探讨艺术家通过艺术形式能否改变这个世界的问题。《披红纱巾的姑娘》（1973）取材于中世纪的骑士诗，反映当前国内经济和政治状况。

借古喻今是女作家卡依巴依宁在小说创作中的最大特点，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把民族传统、古老的语言、神话中的人物及当今报纸、广告上的时髦语言统统搬到虚构的故事中……把古老的圣经故事移到当代农村。目的是让读者思索人是否在发生变化，如何变化，历史能否自动形成。同时我还希望让读者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做。”

C. 基赫曼

柯里斯特·基赫曼（1930— ）瑞典语小说家。他出身于赫尔辛基一书香门第，父亲是作家。他大学毕业后当过文学编辑和评论员。50年代便开始创作生涯。

瑞典语作家基赫曼以善于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见长。他敏锐地观察和分析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并细腻地加以描绘。基赫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心，别迷醉》（1960），通过主人公——芬兰一城市报纸主编对自己过去虚伪的资产阶级生存环境的审视，尖锐地批评了瑞典族居住地区知识界的闭关自守和乡土观念，从而引起读者的广泛注目。第二部长篇

小说《蓝色的母亲》（1963），通过描写两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揭示了资产阶级衰败的家庭生活。第三部长篇小说《垮下去的人》（1971）则直率揭露当代芬兰存在的酗酒、同性恋和婚姻危机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长篇小说《高贵的王子》（1975）,通过描写芬兰瑞典族一商人的个人生活和经济发展史，展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芬兰社会的变迁。作家基赫曼长期侨居阿根廷，固而他在写作手法上受拉丁美洲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流派的影响很深。基赫曼在其作品中多采用夸张和近乎荒诞的艺术手段，但有别于现代派文学，基本上是立足于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

K.帕达洛

卡莱·帕达洛（1919—　　）小说家。他生于达依瓦科斯基一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森林工人。他本人没有专门受过高深的教育，从小做工，当过森林工人和建筑工人，完全靠自学成才，60年代才成为专业作家。

帕达洛是目前芬兰最受欢迎的纪实作家。他善于写长篇系列小说。他在作品中平静地追忆往事，留恋芬兰偏僻地区业已失去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不是揭露问题的能手，尽管在他的作品中也回荡着时代的风云。但是他是编织故事的巧匠，他用幽默、风趣、通俗的语言叙述自己经历的事情，娓娓动听，令读者着迷。帕达洛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脚手架上的人们》（1958）反映建筑工人的生活。之后他开始编织农民的故事。他于60年代发表了5部长篇系列小说，即《东北大地》（1960）、《纯洁的人们》（1962）、《东北地区的风暴》（1963）、《风暴之后》（1965）和《黑雪的冬天》（1969）,反映自20世纪初至60年代末作家“虚构地区”的农民生活史，其作品格调深沉、凝重。

自70年代以来，作家帕达洛又发表了9部长篇小说。它们是《主人的儿子》（1971）、《静止的小溪》（1972）、《地区的面粉》

（1973）、《完全是记时工资》（1974）、《新开辟的森林地》（1975）、《燃烧的时刻》（1976）、《受压抑的大地》（1977）、《埋下地雷的和平》（1978）和《雷声》（1979）。这是多部自传体小说，作家帕达洛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反映自童年至 40 年代末自己经历的人和事。他完全采用写实的手法。作品读来真实感人。这些小说成为芬兰当代读者喜欢阅读的畅销书。

E. 塞依塞

埃依诺·塞依塞（1935—1988）小说家。他出身于里萨尔米农区一农民家庭，父亲务农。他中学毕业后任乡村教师多年，60 年代后期才专职从事写作。

作家塞依塞创作的小说多取材于农村家庭，反映农民的苦和乐。其前期小说的基调是悲观的，正如他通过《我们是些什么人？》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所述的：“我们失去了精神自由和自我的价值，不可能相信我们会成为地球上比较受尊重的人。”塞依塞同情当代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为他们的不幸遭遇伸张正义和鸣冤叫屈。他一生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当属 60 年代发表的《来自黑夜》（1964）、《最后的夏天》（1967）和《我们是些什么人？》（1968）以及 70 年代发表的史诗性系列自传体作品《冰冻的土地开了花》（1971—1979）。

《冰冻的土地开了花》是塞依塞的代表作。它包括 5 部长篇小说，即《乡村的觉醒》（1971）、《乡村的沸腾》（1972）、《父与子》（1974）、《告别青春》（1976）和《鹤之舞》（1979）。它反映从 1944 年到 1963 年期间芬兰农村生活发生的变化。第一、二部描绘萨沃农村有了学校和火车站；第三、四部叙述农村社会政治形势稳步发展；第五部写作家个人的成长过程。与作家帕达洛一样，塞依塞也采用纪实的手法，绘声绘色地向读者勾勒出一幅幅

农村社会发展的生活画卷。据该书的责任编辑介绍，作家本打算一直写至故乡 70 年代发生的巨变。可惜塞依塞英年早逝，使他一生的宏愿未能完全付诸实现。

E. 巴锡林纳

埃尔诺 · 巴锡林纳 （1935— ）评论家。他出身于伯萨莫一职员家庭，父亲为代理商。他本人受过中等教育，当过报刊编辑，他是 60 年代芬兰激进青年组织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家巴锡林纳富有才华，思路敏捷，擅长写讽刺性的政论文章，是芬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英雄”。他针砭时弊，大胆泼辣，往往不留情面。他主办的杂志《北方》是专门针对当局的。他写的杂文讽刺面很广，既包括官僚政治、军国主义、民粹思想、牧师和警察，也包括公司经理、企业老板等，特别是对文学、报刊和广播电台中出现的弊病更是刺以匕首，投以标枪。巴锡林纳要求民主，主张政府当局制定任何重大决策前必须经过民众公开讨论方可付诸实施。这样既避免产生错误，又体现了民主权利。巴锡林纳发表的主要论文集有《体面的革命》（1972）、《祖国的纪念》（1973）、《致全体书》（1975）和《西伯利亚的美学》（1978）等。他写的政论文章文词尖刻，富有攻击性和煽动性，他写的文艺评论文章简洁扼要，说服力强，具有指导意义，巴锡林纳是当代芬兰批评界的佼佼者。

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

1. Rafael Koskimies, Elävä Kansalliskirjallisuus（1—Ⅲ）, OTAVA, Helsinki, 1944—1949.

2. Kai Laitinen, Suomen kirjallisuuden historia, OTAVA, Helsinki, 1981.

3. Pekka Tarkka, Suomalaisia nykykirjailijoita, Tammi, Helsinki, 1980.

4. Haila-Heikkilä, 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historia, OTAVA, Helsinki, 1958.

5. Suomen Kirjailijat（1945—1980）, SKS, Helsinki, 1985.

6. O. Mantere—G. Sarva, Suomen historia, WSO, Helsinki, 1961.

附录二　芬兰主要作家中文译名外文对照表

M. 阿格里科拉	M. Agricola
H. 玛斯库拉宁	H. Maskulainen
E. 索洛拉宁	E. Sorolainen
S. 弗尔西乌斯	S. Forsius
D. 尤斯莱尼乌斯	D. Juslenius
J. 弗赖斯	J. Frese
F. 弗朗兹	F. Franzen
H. 波　萨	H. Porthan
A. 阿尔维德逊	A. Arwidsson
J. 尤太尼	J. Juteni
K. 科伦德	K. Gottlu[illegible]
J. 鲁内贝格	J. Runeberg

J. 斯奈尔曼	J. Snellman
E. 伦洛特	E. Lönnröt
S. 托佩利乌斯	S. Topelius
A. 奥克萨宁	A. Oksanen
A. 基维	A. Kivi
J. 克伦	J. Krohn
M. 康特	M. Canth
J. 阿霍	J. Aho
T. 帕卡拉	T. Pakkala
A. 耶尔内费尔特	A. Järnefelt
E. 雷诺	E. Leino
V. 科斯根涅米	V. Koskenniemi
O. 玛尼宁	O. Manninen
L. 库斯蒂	L. kyösti
L. 奥奈尔娃	L. Onerva
J. 西尔约	J. siljo
J. 莱托宁	J. Lehtonen
I. 基安托	I. Kianto
M. 约杜妮	M. Jotuni
A. 卡拉斯	A. Kallas
M. 拉西拉	M. Lassila
J. 林南科斯基	J. Linnankoski
F. 西伦佩	F. Sillanpää
V. 基尔皮	V. Kilpi
M. 塔尔维奥	M. Talvio
K. 塔瓦斯舍尔纳	K. Tavaststjerna
A. 姆尔奈	A. Mörne
E. 索德格朗	E. Sädergran
H. 奥尔逊	H. Olsson
E. 迪克托尼乌斯	E. Diktonius
K. 瓦拉	K. Vala

U. 卡依拉斯	U. Kailas
A. 海拉科斯基	A. Hellaakoski
P. 穆斯塔珀	P. Mustapää
Y. 尤翰	Y. Jylhä
K. 萨尔基亚	K. Sarkia
T. 帕卡宁	T. Pekkanen
M. 瓦尔塔里	M. Waltari
O. 巴沃拉依宁	O. Paavolainen
P. 韩培	P. Haanpää
V. 卡亚瓦	V. Kajava
A. 土尔蒂阿依宁	A. Turtiainen
J. 奔纳宁	J. Pennanen
H. 沃里约基	H. Wuolijoki
E. 西内尔沃	E. Sinervo
I. 乌尔托	I. Uurto
H. 海麦莱宁	H. Hämäläinen
A. 居尼	A. Tynni
E. 奔纳宁	E. Pennanen
T. 杨松	T. Jansson
L. 维达	L. Viita
J. 科尔柏拉	J. Korpela
J. 玛奈科尔皮	J. Mannerkorpi
H. 尤沃宁	H. Juvonen
E. 曼奈尔	E. Manner
P. 尼耶米宁	P. Nieminen
P. 哈维科	P. Haavikko
B. 卡尔佩兰	B. Carpelan
E. 基维卡霍	E. Kivikkaho
A. 麦里卢奥托	A. Meriluoto
A. 娃梅尔伏奥	A. Vammelvuo
L. 努米	L. Nummi

T. 安哈瓦
V. 霍维宁
V. 林纳
E. 约恩伯尔托
V. 曼瑞
A. 许吕
P. 林达拉
M. 瓦尔迪奥
P. 霍拉巴
P. 萨里科斯基
V. 基尔斯蒂奈
M. 洛西
P. 萨里查
L. 胡尔登
C. 安德逊
H. 萨拉玛
A. 卢特
L. 辛科宁
S. 巴洛宁
H. 麦基莱
J. 拉依奈
N. 拉乌哈拉
R. 拉萨
S. 图尔卡
K. 苏奥萨尔米
A. 卡依巴依宁
C. 基赫曼
K. 帕达洛
E. 塞依塞
J. 唐纳
E. 巴锡林纳

T. Anhava
V. Huovinen
V. Linna
E. Joenpelto
V. Meri
A. Hyry
P. Rintala
M. Vartio
P. Holappa
P. Saarikoski
V. Kirstinä
M. Rossi
P. Saaritsa
L. Hulden
C. Andersson
H. Salama
A. Ruuth
L. Sinkkonen
S. Paronen
H. Mäkelä
J. Lainen
N. Lauhala
R. Rasa
S. Turkka
K. Suosalmi
A. Kaipainen
C. Kihlman
K. Päätalo
E. Säisä
J. Donner
E. Paasilinna

后　　记

本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当时我还是一位青年学生，被派往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当学习员，主要任务是学习驻在国语言——芬兰语。那时我曾有机会就读于世界著名高等学府之一的赫尔辛基大学。在学习期间，我对芬兰的文学和历史产生了兴趣，希望将来能为促进中芬文化交流做些事情。但是 1962 年回国后，我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原因之一是我回国不久不幸身染重疾，长期处在治疗和休养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原因之二是我在国外期间节衣缩食省下外汇购买的一套文学图书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付之一炬，化为灰烬。因此，我长期处在“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的困境。直到 80 年代初，我转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一理想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当时我白手起家，依靠组织，从国内外搜集并选购了必要的图书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开始做起了“芬兰文学梦”。前后花费了好几年时间，我才撰写出这部《芬兰文学简史》。据我了解，目前在海内外尚无一本用中文出版的专门介绍芬兰文学的书籍，此书的出版发行可以填补这一空缺。它既能为海内外华语读者提供一本系统了解芬兰文学的参考读物，又能为后代人继续从事芬兰文学研究奠定初步基础。我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外国文学所（室）领导的热情支持，暨南大学刘康先生也曾向我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委员会和经济管理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

张华文

1996 年 5 月于石景山永乐小区寓所